

学校代码： 10246

学 号： 12110110050

復旦大學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严歌苓流散写作研究

The Study of Yan Geling's Works about Diaspora

院 系：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专 业： 现当代文学

姓 名： 毕文秀

指 导 教 师： 张新颖 教授

完 成 日 期： 2016 年 3 月 30 日

指导小组成员名单

张新颖老师

李振声老师

刘志荣老师

王光东老师

中文摘要

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其作品备受中国研究界瞩目。她经历了流散的事实后，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由于她自身有着深切的流散体验，其流散之后的作品中有很多作品是书写流散者的故事，以此表达了她对流散的思考及对流散群体的人文关怀。本人作为一个留学生，有着跨国的双重文化经历，因此在严歌苓本人以及她小说人物身上，发现当中的流散特征，很多时候是自身经历的特点。这引起了我在情感上的共鸣，她的小说因而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开始探讨这些人物的心理。在严歌苓流散之后回望故国的作品中，其主人公的思维意识又让我深感震撼。本人认为，从流散的角度研究严歌苓的作品及其作品中人物性格，对生命本质的思考，进一步提供了借鉴的意义。

我从自身的实感经验出发，通过文本细读，运用后殖民理论及心理分析等方法，研究严歌苓经历流散之后的作品。论文第一章概述流散的概念及流散写作的特征。本论文取流散广义定义，将凡是同时直接或间接经验两种文化的人都归入流散群体，因而严歌苓的创作也是流散写作，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指出既有研究的不足，提出我的论文基本思路。第二章将严歌苓笔下的流散者大体分为三类，我始终关注这些流散者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特征，探讨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处于那种生存状态之中。第三章探讨严歌苓及其笔下流散人物的(身份/文化)认同问题，希冀找到引起认同的矛盾根源，揭示生命存在的本质。第四章讨论严歌苓笔下人物别具一格魅力的特质，根据严歌苓本人流散之后对生命的深刻体验，探讨严歌苓流散作品中人物的思维意识。

关键词：严歌苓；流散；认同；自由；敬畏生命意识；

Abstract

The works of Chinese-American writer Yan Geling draw attention from the literary study in China. After the real diasporic experience, she created numerous fantastic works of diaspora writing. Due to her own profound experience of diaspora, the content of her works after this experience were always about “The Stories of Diasporas”. She expressed her reflection to diaspora and her humanistic care to the group of diaspora existence through her fictions. As a Chinese foreign student, and also experiencing two different cultures from two different countries as well, the features of diaspora on Yan Geling herself and the character in her fictions are always reflected on my life experience. Therefore, Yan Geling’s fictions arouse my interest. I started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ction characters. I was impressed by thinking of the protagonist in Yan Geling’s fiction which had been written when Yan looked back to her home country after the diaspora. According to my opinion, studying Yan Gelling’s works and the characters in her fi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spora,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ference to the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life.

Based on my own experiences and the relevant text reading, I applied the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psychoanalysis analytical methods to study on Yan Geling’s diaspora writing. Chapter One included the overview of diaspora concept and the features of diasporic writing. This paper takes a broad definition of diaspora. The people who directly or indirectly experience two different cultures are classified into the diaspora group. Therefore, Yan Geling’s works are diasporic writing. With the conclusions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I pointed out the gap and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presented the basic thoughts of my research. In Chapter two, the diasporaers in Yan Geling’s work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I am always concerned with the living condition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diasporaers and I tried to explore the reasons which put them under the certain living condition. Chapter three described the sense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diasporaers in Yan

Geling' s works, hoping to find the cause and the solution of the identity crisis. Chapter four presents the characters' particular attractive personalities in Yan Geling' s fiction. According to Yan Geling' s profound experience, I discussed the thinking of the characters in her works.

Keywords: Yan Geling; Diaspora; Identity; Freedom; Reverence toward Life

目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
目录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流散与流散写作	2
第二节 严歌苓作品研究现状	7
第三节 论文基本思路	12
第二章 严歌苓作品中流散者的内心状况	14
第一节 生活在华人圈中的流散者	15
第二节 同主流社会成员接触的华人流散者	26
第三节 中国境域内的外籍人士	35
第三章 严歌苓及其笔下流散人物的认同问题	40
第一节 心态与认同	41
第二节 混种、自我与认同	53
第四章 严歌苓流散作品中人物的思维意识	58
第一节 开放的性意识	63
第二节 自由意识	71
第三节 敬畏生命意识	82
第五章 结语	91
参考文献	95
后记	101

第一章 绪论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由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各个国家与地区间的交流与往来，更加频繁，因之出现了一种流散现象，新的群体流散群体也因而出现。流散者大多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选择去国离家，同时经验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而流散是外来语，即 diaspora。论文首先对这一概念做了梳理，并且提出了我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我认为，不管流散概念的历史如何，先阶段处于流散状态的人大多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选择主动流散，因而凡是具有同时经验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人，我认为都可归为流散群体。

目前华文文学研究这一领域，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中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命名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以地区特征命名，如港澳台暨海外华文文学，到以时间特征命名，如“新移民”文学等。因为华文文学的写作者基本上都有一个流散的背景，因而他们的写作可以归入“流散写作”。这样就避免了因为受时空的影响，而造成的对这一研究领域的片面关注，同时“流散写作”的命名也更能够显现出同时经验两种文化的这一群体的特征。

作家严歌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赴美留学，后变成了美籍华人，除了美国之外，还旅居世界多个国家，因此严歌苓的写作可归于我所界定的“流散写作”。在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严歌苓在中国学界备受瞩目，关于研究她作品的研究很多。在本章中的第二节将对现有的研究做一个综述，第三章提出本论文的基本思路。

第一节 流散与流散写作

关于对流散方面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研究成果。流散是外来语，在谈流散之前应该对流散这个概念有明确的理解。

（一）流散

丰云博士在其博士论文《论华人新移民作家的飞散写作》中对 diaspora 做了系统而详细的考察。据他考察，diaspora，是一个古老的词，是个历史性的概念，有其产生、发展和衍变的历史。由于它与犹太民族历史命运的密切相关性，使得很多人认为这一概念是起源于犹太民族的被迫流散世界各地。其实，这一概念是缘起于希腊的，英国学者罗宾·科恩在他的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中，就梳理了这一概念的流 diaspora 起源于希腊文动词 speiro 和前缀 dia，其中 dia 即 over，“跨越”，而 speiro 是 to sow，“播种”。古希腊人主要用这个词汇表述古风时期（也被称为殖民时期，公元前八世纪-公元前六世纪）在小亚细亚和地中海地区的殖民活动。当时古希腊人大量向小亚细亚地区迁移，这其中虽然也有贫穷、人口过多和国内战争等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殖民活动。通过劫掠、军事统治、殖民和移民进行扩张是希腊 diaspora 的主要特征。后来，这一词汇出现在希腊语《圣经》中，在《旧约·申命记》中，上帝对犹太人许诺，若他们听从耶和华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祝福就会降临到他们身上；而若是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不遵行律例，那么诅咒就会降临；在一系列诅咒中就包括让犹太人在天下万国中漂泊流散，散居在万民之中，如第 25 节和第 64 节等处。公元 70 年，罗马暴君哈德良扑灭了最后一次犹太起义，摧毁了耶路撒冷和第二圣殿，犹太人被迫离开圣城耶路撒冷，从此开始了背井离乡、浪迹天涯的流浪，这即是犹太人的大流散时期。在《圣经》使用这一词汇后，它就逐渐转化成一个专有名词，Diaspora，成为犹太人的印记与创伤，专门用于指犹太民族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地区、散居世界各地的流浪命运，“无家可归”是犹太文学、艺术中的主乐调。由此，犹太 diaspora 所具有的悲情、漂泊、孤寂、疏离等色彩成为 diaspora 的核心元素，以至于离开犹太 diaspora 经验就很难理解和讨论 diaspora 这一概念本身。所以，diaspora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在英美主要的英语词典中都是大写的 Diaspora，在学术研究中，它也只在犹太和基督教研究领域中出现。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非洲研究领域。这一概念由小写、大写再至大写、小写并存的衍变，应该说并不是应用范围的变化，而是这一概念在意义上的不断重构，今天的 diaspora 一方面是部分地保留了它的本原涵义，即有关迁移、移民的状况和对故土、家园的复杂情感；

同时也拓展、衍生出很多新的涵义，包括文化跨民族性、文化翻译、文化旅游、文化混合等涵义。¹

丰云在其博士论文《论华人新移民作家的飞散写作》中对“diaspora”这一术语进入汉语学术界的研究视阈进行了考察，认为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由台湾开始的，主要集中于文学、文化研究、社会学、人类学、传媒研究等领域。在文学研究领域，又多与文化认同、身份追寻、族群意识等概念相联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一术语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学术界，主要出现在历史研究、文学研究等领域。²

在韩国，关于 diaspora 这一问题的研究，根据高慧琳博士考察“目前以 diaspora 为关键词搜索到的论文大概有 190 多篇，其中大多数是跟宗教和神学研究有关的，到 1990 年以后，随着少数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兴起，最近几年在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可以看到 diaspora 研究方兴未艾”。³

钱超英在《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兼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阐释空间的拓展》中指出，在处理“流散”的问题时需要注意两个倾向：一种是过度的、过于复杂的阐释，这样会使我们把精力花在某种微言大义的挖掘上，从而日益陷入一种也许不幸正在生成的“西学”传统—日益变成西方流行词汇的追随性注释。另一种倾向是出于对西方学术话语的简单拒斥，而对流散问题疏隔、忽视，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虽然出自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但通过全球化，它也向我们揭示着一个自己正越来越深地被拖入其中的时代过程。⁴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流散群体中的一员。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人们除了仍以 Diaspora 专门指涉犹太民族的 diaspora 外，开始更多地使用 diaspora 这个小写的词汇指称那些被迫或主动离开家园故土，生活于异地的人群。在今天，这一人群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广，diaspora “不但指犹太人的经历，也包括别的民族的国际移居、亡命、难民、移居劳动者、民族共同体、文化差异、认同等广义的范围”，“抛弃回归祖国的希望，又或者指最初就没有回归祖国的念头的移民也属于 diaspora”，“diaspora 指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无法也不想同化于所居国的社会，但是又无法回归到自己想象的理想的群体的”，“diaspora 是指与自身的意志相但自身又不得不向外部原因妥协的状态”⁵。在本论文中，我采取 diaspora 的广义定义，

¹ 以上参考丰云，《论华人新移民作家的飞散写作》，（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第1-3页。

² 参考丰云，《论华人新移民作家的飞散写作》，（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第4-5页。

³ 韩国国立釜山大学高慧琳博士论文《北美华人华文文学中出现的流散文学特征—以白先勇、於梨华、张系国、聂华苓为例》（2013），고혜림,<북미 화인화문문학에 나타난 디아스포라문학적 특징—白先勇、於梨华、张系国、聂华苓을 중심으로-->(부산대학교 대학원,2013.2), 第3页。

⁴ 钱超英，《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兼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阐释空间的拓展》，《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总第63期），第78~79页。

⁵ 윤인진,<코리아 디아스포라>,(고려대학교 출판부, 2004.3.10),PP.5~6。

将凡是同时直接或间接体验两种文化的人，都界定在流散群体之内。

关于对 diaspora 这个词的翻译，目前中国学者之间并没有达成共同协议，但大概分为三种：“流散（离散、流离失所）”、“散居（散居者、族裔散居）”、“飞散”等译法⁶，在这三种译法中，我倾向于“流散”这一译词。正如庄伟杰在《流散写作、华人散居和华文文学》中所说，“‘流’与流浪、流放、流亡、流动等词相关，‘散’与离散、散居、分散、飘散等词关联，如是涵盖面甚广，既能反映了分散各地的共同体的集体性分散状况，又能超越单一性思维层面而生成文化的意识；既能保留最初的含义或寓意，又具有当代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内质，而不局囿单一的理解。况且，‘流散’是一个相当中性的且富有动态的词，其内涵和外延都具备形成巨大的张力空间的多种可能性。”⁷我同意庄伟杰的观点，而且我认为，在今天，个体多是为了追求自己更大的幸福，选择去国离家的，虽然身处异国，难免会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矛盾，包括生活和文化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异国的生活一定是悲情的，相反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另外一种发展机遇，提供另外一种看待人世的视角。

（二）流散写作

在中国大陆，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了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最初是从台湾文学开始的，继而涉及到香港、澳门，最后发展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其命名也经历了台港澳暨世界华文文学的变迁。最近，中国学术界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如“新移民文学”、“新海外文学”、“新华人文学”等。关于“新移民文学”这一概念，黄万华在《20 世纪美华文学的历史轮廓》一文中这样界定新移民作家群：主要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中国大陆赴美，主要以留学方式开始其旅美生涯，继而定居美国的年轻作家组成。⁸陈贤茂在其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第四卷中说新移民文学“特指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出于各种各样目的（如留学、打工、经商、投资等），由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士，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反映其移居国外期间生活境遇、心态等诸方面状况的文学作品。”⁹可以看出，陈贤茂的新移民是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移居国外的人士。¹⁰

“新海外文学”这一概念由赵毅衡教授提出，他在 1998 年 11 月 20 日的《羊城晚

⁶ 这方面参考庄伟杰，《流散写作、华人散居和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3），第47到52页。

⁷ 庄伟杰，《流散写作、华人散居和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0.3），第49页。

⁸ 黄万华，《20世纪美华文学的历史轮廓》，《华文文学》，2000（4）。

⁹ 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史》（第四卷），（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第638~639页。

¹⁰ 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史》（第四卷），（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第638页，脚注。

报》“花地”版发表《新海外文学》一文，文中说“所谓‘新海外文学’，指的是海外大陆作家的文学创作。我所说的海外作家并不包括用所在国语言写作的作者。”“新海外文学也不包括‘中国人在纽约’，‘流浪澳洲’，‘落脚英伦’这类可称为‘经历报道’的作品--这些原本就没有当作艺术作品来写。”“新海外文学，是一种以无目的为目的性的文学。”¹¹倪立秋在《新移民小说研究》中从“作家的来源地”、“创作语言”、“作品内容”、“写作目的”等四个方面对赵毅衡的“新海外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做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自己对“新移民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新移民文学应该是指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由中国新移民（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移居国外的人士）在海外创作的文学作品，其创作媒介可以是中文，也可以是英文或其他语言文字。其作品的题材可以是这些作家在国外的生活经历或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可以是其出国后回首原有的国内经历而创作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对其出国前的个体经验、对母国或祖籍国的生活文化、人文历史、政治经济等从不同的角度和距离进行思考或反思。”¹²

可以说，倪立秋对“新移民”及“新移民”文学概念的界定，相对于已有研究来说，从创作语言和创作题材方面，其涉及的范围要广一些，这还是比较客观的。就创作语言来说，同一个作家，可能用母语进行创作，也可能用所居国语言进行创作，将其用母语进行的创作归为一类，用所居国语言进行的创作归为另一类，如“所居国少数民族文学”，用所居国语言进行的创作同其所居国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但是同一个作家的创作，从其创作主体来看，这两种文学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我还是同意倪立秋这样将他们的创作归入同一个范畴进行研究。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移居国外的中国人（从广义的范围来说，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移居国外的人士）称为“新移民”，我认为这个称谓并不是很恰当。当然，这里的“新”是要区别于“老”，也就是说，这样界定的原因是要同这个年代之前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加以区分，如五六十年代留学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之前更早的中国移民等等¹³，然而时间是不断向前的，之前的种种历史背景导致了移民们的不同心境，之后的历史背景也会有着同样的影响，目前的华人文学研究至今有着不过三十多年的历史，我们研究的也不过是现阶段和之前的文学，从长远来看，“新”这个词不能够拥有较强的说服力，目前的这个“新”移民的状况，并不能代表着日后的“新”，相对于日后来说，“新”必将成为“旧”。然而，这一时期移民文学的文学特色却可能是永恒持久的。对此，韩国学者金惠俊教授提出了“华人华文文学”这一观点，他在其论文《华人华文文学研究试论》中对现

¹¹ 赵毅衡，《新海外文学》，《羊城晚报》，1998.11.20，“花地”版。

¹² 倪立秋，《新移民小说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P.4。

¹³ 这一点具体参考倪立秋的《新移民小说研究》。

有的华人华文文学的研究主张做了详细的整理与批评，指出现有的华人华文文学研究主张的不足之处，他认为现在的华人，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华人，他们的经历同之前的华人有着很大的区别，在情感上对中国的依赖也不如老华侨强烈，他们身上有着明显的混种文化特征，因此他提出了“华人华文文学”这一说法。¹⁴而本人认为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这些去国离家的作家同时经验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鉴于在上文我已经对流散作了界定，认为流散是一种经历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经验的状态，无论流散者的国籍如何，都将归入流散这一群体。因而在本文中，我提倡用“流散写作研究”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移居海外的华人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他们的创作属于“流散写作”。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同时体验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她本人就属于我所界定的流散群体中的一员，因而她的创作也是属于“流散写作”。

¹⁴ 김혜준, <화인화문문학 연구를 위한 시론>,《중국어문논총》Vol.50, (서울:중국어문연구회,2011),第77到116页。

第二节 严歌苓作品研究现状

严歌苓是目前备受瞩目的美籍华人作家，她的作品数量甚丰，并且其作品屡次获得国内外大奖。严歌苓不仅会讲故事，讲得好听，而且在艺术上给人以震撼力。陈思和先生曾评论她的《第九个寡妇》说“严歌苓的创作里总有浪漫主义的美好情愫，那些让人难忘的场景总在拓展民间的审美内涵，如老人与幼豹相濡以沫的感情交流，又如那群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侏儒，仿佛从大地深处钻出来的土行孙，受了天命来保护善良的人们。葡萄把私生的儿子托付给侏儒族和老人最后在矮庙里独居的故事，或可以视为民间传说，它们不仅仅以此来缓解现实的严酷性，更主要的是拓展了艺术想象的空间，这也是当代作家创作中最缺少的艺术想象的能力。”¹⁵陈瑞林《冷静的忧伤》中评价流散对严歌苓创作的影响，“对某些人来说，生命的‘移植’也许要面对某种折损，但对迷恋写作的严歌苓来说，‘移植海外’却如同是深根的枝嫁接在饱满新奇的土壤，蓦然间开放出再生的奇葩。她的作品在海外一经问世，就立刻散发着与她前期作品迥然不同的奇异芳泽，闪烁着‘移民文学’所独有的精神特质。与此同时，她以自己小说中无与伦比的敏锐和细腻被评论界誉为是当今北美华文创作最具实力的小说家，尤其是被称为北美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¹⁶

目前对严歌苓作品的研究大体都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人性、关注作家身份和文化意蕴、反思历史及女性形象等。本论文重点研究的是严歌苓出国后作品中出现的流散者形象及严歌苓流散后作品中的人物思维意识问题，单从这两大方面对既有研究进行总体上的综述。

目前中国学界关于对严歌苓出国后小说的研究大体分为两方面，一是移民后“异国题材”小说的研究，一是在异域“回望故国”题材的研究，从人性、认同、反思历史等主题方面的研究论文各有侧重。乔以钢、刘莹的《论北美华文女作家创作中“离散”内涵的演变》从“离散”角度对北美华文女作家创作中认同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严歌苓一代的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新移民”们“伴随着‘文革’的记忆长大，以高考恢复后第一批大学生的身份接受了高等教育并接触到西方文化，他们身上积聚着十年空白之后的巨大文化潜能和对西方文明重新想象与亲近的激情。在出国之前，他们在文化认同上已经发生了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的‘涵化’。他们怀揣着从金钱到民主的各式各样的‘美国梦’来到美国，却在一切需要真实把握的层面上无所适从。正如严歌苓所说：‘我们口头上嚷到这里来寻找自由、学问、财富，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想找什么。’要追求的价值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深

¹⁵ 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名作欣赏》，2008.03，第104页。

¹⁶ 陈瑞林，《冷静的忧伤》，《华文文学》，2003年第5期。

壑里坠落，以主动追求的姿态出现的文化主体，也在‘移民’的身份困境中遭到沉重打击。在这种境遇中，以严歌苓和张翎为代表的‘新移民’女作家，分别以自己的方式试图摆脱身份困境，并为世纪末的‘离散’文学内增添了新的质素。”¹⁷葛亮（香港）的《从“土生族”到“新移民”——由严歌苓的作品看在美华人的文化认同》研究严歌苓作品中在美国出生或者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华人或华人后裔他们的认同问题，认为“‘土生族’身上，体现着两种文化的对流和冲突，他们不断在现实里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企图在文化的变迁与时代的推进中担当一个调和者，并希望最终受到社会主体的接纳。”¹⁸在新移民的认同上，他认为他们依然认同自己的母国文化，“在旅美华裔学生的心中，渗透着浓厚的家国意识。这种意识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内容成为留学生与祖国之间一根息息相通的脐带。”¹⁹李燕的《异质文化中的身份建构——从叙述者‘我’的出场与缺席看严歌苓小说的创作》认为“身为新移民作家的严歌苓，异质文化的冲击与生活经历的改版使她看待自我和审视世界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其创作也因此呈现出动态的发展历程。在近20年的创作历程中，严歌苓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叙述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叙述者‘我’的出场与缺席经历了几次循环往复，从这种叙述策略的变化中可以看到，作为新移民作家的严歌苓始终在创作中追问和寻找‘我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并经历了‘原本的我’-‘失去自我’-‘找寻自我’-‘我就是我’的漫长旅程。由此可见，严歌苓的创作历程从本质上来看其实是一个身份建构的过程，期间伴随的正是作者交错盘结的重重焦虑以及摆脱焦虑意识的渴望。”²⁰指出严歌苓在异质文化中进行身份建构的焦虑和艰难，并认为其在漫长旅程后获得了自我身份的确认和主体视野的超越，其文本创作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

严歌苓移民后，其创作作品中还有一部分作品写故国的故事。对这方面的研究多从严歌苓的跨文化视角对其进行研究，提出严歌苓作品思想方面的深刻性。如周春云、李侠云合作的副题为《美国华文女作家严歌苓的“中国记忆”小说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流散语境中的回望》称“本课题所谓‘中国记忆’小说，就是指她在跨文化的流散语境中以交融中西文化的独特视角回望故土母国创作的小说，如《人寰》、《穗子物语》、《金陵十三钗》、《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在这些作品中，严歌苓以跨文化视角审视故土，深情地书写了回望母国时所关注

¹⁷ 乔以钢、刘莹，《论北美华文女作家创作中“离散”内涵的演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3月第1期，第93页。

¹⁸ 葛亮（香港），从“土生族”到“新移民”——由严歌苓的作品看在美华人的文化认同》，《华文文学》，2004年2月，（总第61期），第49页。

¹⁹ 葛亮（香港），从“土生族”到“新移民”——由严歌苓的作品看在美华人的文化认同》，《华文文学》，2004年2月，（总第61期），第50页。

²⁰ 李燕，《异质文化中的身份建构——从叙述者“我”的出场与缺席看严歌苓小说的创作》，《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总第153期），第157页。

的历史和生活于其间的人，集中体现了作者在两种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独特观点，密集抒发了作者的回望心态。作者生活在异质文化语境之中，却勇于冲破异文化的强势挤压，坚持用母语中文来讲述去国时抛开的那一方土地上的故事，从而使渗入血脉的文化印记有了展露的平台；而流散作家的身份又使她具有跳出民族政治圈子的理智与清醒，能够以中西双重文化的视角完成对母国的回望。”²¹认为像严歌苓这样有着流散身份的作家他们处于两种文化的夹缝里，而双重的文化背景赋予了他们从外部观察本民族文化的独特视角，同时，对关系着日后人生道路选择与主体意识建构的自身文化身份的确认。而文化认同的焦虑情结却不是严歌苓关注的焦点。她乐于做一名处于流散语境中的“游牧者”，游走在中西文化的边缘，以“局外人”的文化身份从外部世界重新审视故土，同时从少数族裔的角度透视西方文化。在《回望母国的独特意蕴》中，讲“严歌苓的‘局外人’的文化身份，使她在叙述关于中国的故事时，总是能够挖掘出其他华文作家不曾关注到的审美内涵；西方文化中的‘人学’思想与自身‘血缘’红某些文化印记的相互交融，使她在书写母国的历史时，善于发现人性中感动人心的真善美元素。因此，在她的‘中国记忆’小说中，无论是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书写，还是对一个个女性生命的塑造，都体现了她回归生命本真和追寻真善美的理想情怀。这正是她的‘中国记忆’小说所独具的意蕴，也是她跨文化选择的意义所在。”²²指出将严歌苓融合中西文化视阈的“中国记忆”小说置于比较文学领域进行跨文化解读，发现作者严歌苓在流散语境中以双重文化视角回望母国的态度具有多种内涵，其作品蕴含独特意蕴。流散作家的身份使严歌苓在中西两种文化的选择与运用上格外自如，她在作品中努力实现中西文化的沟通和融合，即以西方文化中的人性观念反观中国历史，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建构对应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女性想象，以中西互渗的生态意识来构筑理想的生态家园，合一跨文化选择不仅为作者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对象视阈，同时极大深化了作品的内涵意蕴。

论文《回望母国的文化守望》中指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便极力提倡对个体价值的发现与尊重，把个体看做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出发点。因而，崇尚个性、尊重个体的权利和尊严，便成为近代以来西方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这一文化土壤中所生成的人性观正契合严歌苓的人格理想和创作意向，构成其创作一系列‘中国记忆’小说的特殊眼光，即一种更符合人之本性、更富于生命意识和更能体现人的价值的文化视角。因此，在流散语境中回望母国时，严歌苓总是自觉地将西方人性观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以此来考察人的行为以及特定历史境遇中人性的复杂性与可变性。严歌苓的

²¹ 周春云、李侠云，《流散语境中的回望》，《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2期，2011年3月，第95页。

²² 周春云、李侠云，《回望母国的独特意蕴》，《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5期，2011年9月，第135页。

‘中国记忆’小说正是从这一文化视角来解读历史，因此它不再把重心放在历史大背景上，而是将目光聚焦于生活中最易被人忽视的平凡女性，以其世俗情感与人生经历来诠释历史，这就解构了英雄神话与史诗的那种宏大性。”²³认为严歌苓作为生活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流散作家，她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努力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以滋养自己的生命，从而获得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崭新的创作视角；同时，曾经的母国生活经历和传统文化修养又深深根植于她的生命之中，积淀为无意识的创作取向和价值诉求。因此，她的回望母国的文化守望，既有对西方文化的扬弃，又有源于血脉的母国情怀，二者的对话和相互交融，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跨文化意义。

汤拥华、张纯的《文化边缘的言说与抉择》认为严歌苓小说中的阐释者和严歌苓自身有着一定的联系，“严歌苓小说中的‘我’，对西方感性文化的态度基本上是认同的。她的性格结构中最重要两个方面，善于接受和富于激情，都和自由生命的概念联系起来，因此与感性文化天然地有一种亲和力，她反对将欲望等同于邪恶，她不认为禁欲即道德。她不相信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比人与人之间的爱更神圣，她拒绝让性过多地承担权利义务的沉重命题。这一切共同的出发点是，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应享受充分的自由。”²⁴

南翔在《心灵有负的证明—严歌苓小说的美感结构》中讲到“当代作家最感棘手的问题，不是结构，不是语言，甚至也不是主题，是怎样在保持作品‘社会性’的同时，阐扬一定的心理深度。社会性可比作小说的物质外壳，它强调小说与社会生活关联或交叉的那一部分，它需要通过读者熟悉或不熟悉的人物生活、思想、矛盾冲突与情节熔铸来展现，心理深度则更仰赖人类共通却未必共同的经验，它相关情感、记忆、悟性、认知、人性、非理性与非常态。”²⁵认为严歌苓的作品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近几年来严歌苓的作品也引起了韩国学术界的重视，2015年10月份在韩国外国语大学龙仁校园举办了“第八届中华名作家邀请国际文学论坛”，主题是“严歌苓文学与世界的对话”，邀请作家严歌苓做专题演讲，同时来自中国、韩国、香港、台湾、美国等众多知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发表论文多篇，就严歌苓的创作进行了专门的学术讨论。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严歌苓移民题材小说的研究，还是对其回望故国题材小说的研究重在从跨文化视角对其进行研究，在探讨包括严歌苓自身在内的流散者的认同问题，及严歌苓作品的思想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研究成果。但是既有研究成果固然很多，但是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如对流散者认同方面的研究，只研究了认同问题表象，

²³周春云、李侠云，《回望母国的文化守望》，《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2期，2012年3月，第80页。

²⁴汤拥华、张纯的《文化边缘的言说与抉择》，《华文文学》，2005.2（总第67期），第54页。

²⁵南翔，《心灵有负的证明—严歌苓小说的美感结构》，《华文文学》，2002.2（总第49期），第36页。

浅尝辄止，没有涉及到认同问题背后的本质东西。对严歌苓作品思想方面的研究，重在强调双重文化经验给她带来的影响，忽视了除此之外的严歌苓自身对生命本质的体验和觉悟给她的作品带来的影响。本文意从这两个角度对严歌苓的作品进行解读，透过现象看本质，看看有着流散经历的人群他们的内心状况如何，同时更进一步分析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处于该状态，流散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思考。通过解读严歌苓流散作品中的人物的精神状态，探讨流散这一现象给严歌苓及人类带来的对生命的思考。本论文的学术意义也在于此。

第三节 论文基本思路

严歌苓出国后写了很多移民题材的小说，后来又将其写作的题材转到了发生在中国本土内的事。尽管如此，由于她本人有着流散经历，哪怕回过头来再写国内的题材，也是有了不同的视角。回顾流散经历对她自己的影响时，她曾说“我觉得出来对我更好。因为它给了我一个新的角度，哪怕是写中国过去的故事，这种新的角度是非常难得的。站在中国之外看中国的故事，角度更加国际化。很多事情从国外看回去，常常还是挺新鲜的。这种 fresh eye 对一个作家特别重要。”²⁶这使得严歌苓的小说有别具一格的风味。

本论文集中对严歌苓流散之后的作品进行研究。由于我是留学生，有着双重文化经验，因此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将从我自己的实感经验出发，对作品进行分析研究。从“实感经验”出发由中国学者刘志荣和张新颖提出，他们认为，实际生活中的经验和感受无论对于写作人，还是对研究者来说，都尤其重要，“在具体实践中，我不但把‘实感经验’看作思想和艺术的正当起源，也把‘从实感经验出发’看作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正当途径。这也就产生了对‘实感经验’的第二个解释，即在批评实践中对作品本身亲切而独到的体会，以及研究过程中对于材料的实际考察和探讨形成的独特的见解。”²⁷他们之所以提出从“实感经验”出发这一说法，是因为“现代以来，学界热衷的是引进和建构各种整体性的理论，以至连自己切身的经验和感受，都要通过各种整体性的理论，才能获得合法性和表达的可能—由此造成的流弊数不胜数，在实践中屡屡造成各种脱离实际的恶果，在思维上更是使得自己落入固执僵化和不断被‘洗脑’的窘境。”²⁸我很赞同从“实感经验”出发这一说法。正如学者刘志荣所说的那样，唯有从自己的“实感经验”出发，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才不会人云亦云，才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如学者赵毅衡所说“文学是形式的构成物，因此文学批评不是为作品内容作道德评判，而是探究意义在什么条件下生成，在什么条件下被诠释。”²⁹华人华文文学这一研究领域是我所关注的研究领域。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跟我自身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本人也是流散群体中的一员，在实际生活中，我经常陷入我和丈夫及其家人间因为文化差异引起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等差异引发的众多矛盾里。在社会上，我又面对着身份认同问题及主流文化和我自身母体文化间的冲突碰撞等问题。正因如此，流散现象和流散这一群体才特别引起我的关注。流散引起的种种

²⁶ 雅非，《在海外写作：作家严歌苓访谈录》

²⁷ 刘志荣著，《从“实感经验”出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4，自序第3页。

²⁸ 刘志荣著，《从“实感经验”出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4，自序第2页。

²⁹ 赵毅衡，《孤独的事业-我的批评之路》，《文学自由谈》，1993（03），第68页。

困惑，使我希冀能够找到引起这些困惑的原因及改变这种状态的方法。

本论文以严歌苓出国流散后创作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实感经验出发，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通过解读严歌苓小说中描述的流散者的故事，发现他们身上的特征，并且进一步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探讨他们的内心状况。严歌苓流散之后创作出的作品人物形象很特别，尤其是作品中人物的思维意识给人以震撼力。除了双重文化经历之外，本论文将重点从严歌苓打坐入定的体验入手，这一经历让她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写作也可以把她带入潜意识世界里去，因而她笔下人物的思维意识特别值得注意。

本论文一共分为五章，第二章重点分析严歌苓流散作品中的流散者的内心状况。严歌苓有很多作品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不同层次的流散者的故事，在论文写作中把严歌苓笔下的流散者做细部分类，他们有的是生活在美国华人圈中的华人流散者，这些人同美国主流社会成员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性的接触，有的是同美国主流社会成员直接接触，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中去。除此之外，严歌苓将笔锋一转，把主流社会转换成了中国大陆，讲述了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外籍流散人士的故事。通过文本细读，分别分析他们的心理特征，并且透过现象看本质，看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处于那种生存状态。

第三章探讨严歌苓及其笔下流散人物的认同问题。严歌苓有认同危机，在这一影响下，她笔下的人物大都有认同危机感，但并不是都如此。一个人的心态和认同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探讨混种、自我与认同的关系，找出一切矛盾的根源，探讨生命本质。

第四章探讨严歌苓流散作品中人物的思维意识。严歌苓小说的魅力不仅在于她会讲故事，以及对各种叙述技巧的运用，更在于小说中人物的人格魅力。严歌苓流散之后，有过长期打坐的经历，这让她体内生命开始觉醒，对生命有了更深一层的觉悟。在本章中，通过文本细读，分别从开放的性意识、自由意识、敬畏生命等角度着手，分析严歌苓流散之后其作品中人物的思维意识特点。

第五章结论部分。严歌苓作为流散群体中的一员，同时又是一名优秀的作家，她的笔下描绘了不同层次流散者的生存状态，这其中又不乏她自己对流散的感受及思考。流散给她带来了心灵上的创伤，同时又让她对生命有了更深的体会和领悟，再加上她通过打坐对生命本质的体验和觉悟，使得她的作品有着别样的新鲜感和震撼力。通过对严歌苓作品的研究，得出世界一体化过程中，流散给人类带来的启示和意义。

第二章 严歌苓作品中流散者的内心状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张，很多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选择主动流散。中国大陆大概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一股出国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确定了自己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以及财富为世人瞩目，赴美成了众多人的首选。严歌苓就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年代初赴美留学的，为了生活，她在美国留学期间在餐馆打过工，也给别人做过保姆，后来写文章到台湾发表赚生活费，却出乎意料地屡次获奖，严歌苓也因此始终坚持着走文学创作这条路。

格非在谈到小说叙事研究中说“一个作家在写作某一部具体作品时，也许存在着某种‘中心意象’，但是，这种意象有时并不仅仅存在于某一部（篇）作品。如果我们将一个作家较长时间的创作作一个系统的分析，我们便可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某种‘意象’在其一部作品中出现之后，又在另一部作品中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再度出现。有时它在作家的某一创作阶段频繁出现，有时，它甚至贯穿了作家的一生。这就是说，作家讲述的所有故事从一个阶段的时间来看存在着共同的性质，或者说存在着一个作家关注的视线焦点，尽管在具体的每部作品里故事的所有形式有所不同。”

³⁰纵观严歌苓的作品，可以发现严歌苓作品中格非讲的这一“中心意象”非常明显，那就是流散者。

由于严歌苓自身就是流散群体中的一员，她的作品中有很多都渗透着她对流散者生存状态的关注及其对流散的思考。细读严歌苓作品中的流散者可以分为几大类，一类是出国后依然生活在华人圈中，包括结婚移民者和陪读及出国劳动者，他们同主流社会成员没有什么直接性的接触，但由于生活背景变成了异国，他们间接体验自己母国文化和所居国文化两种文化；另一类是同主流社会有直接性接触的流散者，直接体验两种文化。严歌苓把这两类流散者的生活背景主要放在了美国，即探讨美国主流社会背景下华人流散者的生存状态。还有一类很特别，严歌苓将笔锋一转，把背景换到了中国，即探讨中国主流社会背景下有着外籍身份的流散者的生存状态。本章着重探讨各种不同类型流散者的内在心灵状况。

³⁰ 格非，《小说叙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第54到55页。

第一节 生活在华人圈中的流散者

严歌苓赴美初期，主要写了一批生活在华人圈中的流散者的故事。他们有的是结婚移民，有的是出国劳动者，也有以陪读身份出去的。对严歌苓早期移民题材进行研究的论文比较多，多从失语及文化错位带来的对人性的冲击入手。我将重点放在探讨他们的内在心灵状况上，探讨是什么让他们处于那种生存状态。

结婚移民到美国的多是女性，她们大多为了自己孩子的前程或者为了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嫁了个比自己大几十岁的华人老移民，生活在异国。《红罗裙》里的海云“她常常想出国，出了国健将的没出息、不学无术就会不那么显眼——海云觉得，健将是让亲戚们的孩子给比得没出息了，只要他一出国，将来回来，那就是另一番高低。”³¹为了儿子，她嫁给了一个大自己三十多岁的老头，两人没有任何感情基础，他们的关系只是法律上的夫妻而已。《约会》中的五娟也是为了儿子的前途嫁到美国，丈夫也比自己大三十多岁。当儿子晓峰告诉五娟应该跟自己的丈夫更亲时，五娟说“我也没有不和他亲啊？我有法子吗？你来了，我这才开始活着！他该明白：要不为了你的前途，我会牺牲我自个儿，嫁他这么个人？”³²五娟内心的委屈由此可见一斑。

在异国，应该说她们在物质生活上都比在国内要好多了。《红罗裙》中海云嫁的周先生住的房子价值“一百五十万”，海云“做了这房的女主人两个月了，房子的好些地方她没到过。”³³海云在儿子健将的带领下，第一次乘周先生和他美国前妻生的儿子卡罗不在，偷偷地参观了卡罗的房间，卧室足有四百尺，“屋内一溜墙的镜子全被打开，里面齐齐地挂满衣裳。下面是鞋架，像小半个鞋店。屋中央是张大床，床有个镶镜子的顶棚。海云不懂那镜子是水晶的”³⁴，健将一句“看人家！”言辞中充满了羡慕，并且让自己的母亲也要像卡罗那样，买多多的衣裳。海云“往往在周先生上班后让健将领她乘公车，再换地铁，到一座大购物中心去。海云身上装有一本支票、两张信用卡，出没在各色衣裳的丛林里，见了实在惹她走不动的衣裙，就买下来。”³⁵可见，对于海云的消费，周先生是不太管的，物质上海云并不欠缺什么。

《约会》中的五娟也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她的丈夫“六十八岁，做过两年木匠，现在看去还像个木匠。他开很大的房屋装修公司。人人都做这生意时，他已做得上了路，人人都失败时他就做成了‘托拉斯’。”³⁶在物质上，他对五娟也比较好的，给她

³¹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45页。

³²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88页。

³³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42页。

³⁴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42页。

³⁵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45页。

³⁶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84页。

买车，买钻戒，知道五娟想去赌城，愿意给她钱去，甚至在遗嘱中给她留下了数额很大的一笔钱。《花儿与少年》中的晚江到了美国后，完全过上了中产阶层的生活，吃的、住的、用的，应有尽有。小说中曾描述过晚江想布置一个属于他们一家四口的房子，“院里栽郁金香和栀子花，门前一棵日本枫树，楼上一个按摩浴池，窗帘要奶白色……”³⁷由此可以看出晚江品味的高雅。

然而由于海云和五娟跟他们的丈夫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她们出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有出息，因而她们很容易因为自己的孩子同自己的丈夫产生情感上的隔阂。《红罗裙》中的海云，她跟周先生的争吵，几乎都是源于健将，因为海云拿健将跟卡罗比，健将十六岁，到了法定的开车的年龄了，她曾当着健将的面要求周先生给健将买一辆车，周先生说“他坐公车不好？”，海云马上说“你儿子十六岁就开上三万块的车了！”³⁸当周先生认为健将天天陪海云逛女人服装店是没出息时，海云反唇相讥，“你儿子有出息？二十大几了还赖在家里！”³⁹海云看到了健将和卡罗的差别，在内心里暗中拿健将和周先生的儿子卡罗相比，想通过自己的争取减少这一差别，可最终往往以自己同周先生的争吵为结束，事情不了了之，他们情感上的距离却因此而越来越远。

《约会》中的五娟认为自己的丈夫从一开始见到自己的儿子晓峰就对晓峰产生了敌意，从此她总是避着丈夫表达自己对儿子的亲热和爱意，她和晓峰尤其是五娟自己本人拒绝接纳丈夫进入到自己和晓峰的世界里来。这一心理，使得她和丈夫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她自己陷入了对儿子的变态的畸形的迷恋中。“他们从没干过任何亵渎母子之情的事。他们只是将母子最初期的关系——相依为命的关系延长了，或许是不适当、无限期地延长了。或许这是这异国的陌生，以及异族人的冷漠延长了它。因此他们总是在对于陌生和冷漠的轻微恐慌中贪恋彼此身上由血缘而生出的亲切。”⁴⁰因为有这一心理做祟，她更加觉得自己的丈夫在有意排挤晓峰，甚至让晓峰进寄宿学校。五娟觉得这是丈夫有意在不让她们母子见面，从此她就在星期四偷偷地去见儿子晓峰。“从何时起，每个星期四成了她活着的全部意义？是那么多虔诚的星期四，风里雨里，使她和晓峰再不可能完好地回到这房子中来。她和晓峰的感情经历了放逐的伤痛，也经历了放逐的自由自在和诚实。被驱赶出去的，你怎么可能把它完好如初地收拢回来？”⁴¹这一段听起来很悲情，但其实却是五娟自己酿成的。她陷在了以自己的感情为中心的情感陷阱里，忽略了丈夫对自己的情感，更忽略了晓峰的情感。最后丈夫眼里含着

³⁷ 严歌苓著，《花儿与少年》，--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1，第131页。

³⁸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44页。

³⁹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49页。

⁴⁰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93到94页。

⁴¹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87页。

泪，跟五娟讲和，承认是自己不好，不应该拆散她们母子，同意晓峰搬回来住。五娟却拒绝了丈夫的好意，告诉他自己已经决定离开他了。而儿子晓峰再也无法负担母亲对自己的这种已经超越了母爱的情感，选择了无言的逃离，这是晓峰无可奈何下的选择。

老师惊讶地问为什么。晓峰笑笑，反问：“你呢？你那时不想摆脱家——我是说，一个人快成年的时候都有一个他想摆脱的长辈……”

老师稀里糊涂地认为他有道理。他没注意到晓峰眼里有泪。他看不懂这个少年脸上一阵微妙的扭曲。那是交织着忠贞的背叛。⁴²

五娟因为迷恋儿子，选择了离开自己的丈夫，也因为迷恋儿子，使得她感受不到自己的丈夫对自己的好，相反，站在对立的立场上，猜忌丈夫对自己的儿子晓峰怀有敌意，孤立丈夫，最终却让自己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境地。任何一个丈夫，都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关怀体贴自己，不管他们在结婚之前有没有感情基础，五娟的丈夫也不例外。

《花儿与少年》中的晚江同海云和五娟又有些不一样，因为晚江厨艺高明，做一手好菜，赢得了老华侨瀚夫瑞的心，瀚夫瑞摸着晚江的手，绅士地在她手背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这个吻打动了晚江。

一股清凉触在晚江知觉上。晚江从未体验过这样的异性触碰。似乎不是吻，就是怜香惜玉这词本身。晚江突然呆了：她有限的见识中，金发的年轻王子才如此地一垂颈子，一俯脸，赐一个这样的吻给同样尊贵的女人。

晚江回家的一路，都在想那淡蓝月光里，在她手背上赐了一个淡蓝色的老王子。⁴³

瀚夫瑞的这个吻给了晚江无限的想象，同时激起了她内心深处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想想自己现在的生活，尽管有儿有女，丈夫洪敏也特别爱自己，但是他们的生活太清贫，一家四口人挤在一间宿舍里，洪敏的职业又不是很好。就拿分房子来说，他们希望有一个属于他们一家四口的房子，可等了好几年，每次这种机会都没有摊到他们头上。晚江在中国的生活，在当时的境况下，可以说是没有盼头的。正如洪敏自己说的那样，“我想给你好日子过，给你体面的房、衣裳、首饰，晚江，你值当这些

⁴²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101页。

⁴³ 严歌苓著，《花儿与少年》，--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1，第46页。

啊。可我卖了命，也给不了你什么。”⁴⁴这些即使洪敏不说出来，晚江心里也非常明白。如果选择了瀚夫瑞，这些自然都拥有了，不仅如此，瀚夫瑞在晚江心里是一个老王子，她的心已经动了。洪敏不过是顺手推舟，主动提出让晚江跟瀚夫瑞去美国过好日子。尽管晚江非常爱洪敏，心里有一百个不舍，“那屋多好啊，给她和他焐热了，喜怒哀乐也好，清贫简陋也好，都是热的。”⁴⁵可她还是狠下心，领着四岁的女儿仁仁跟瀚夫瑞走了。虽然晚江和瀚夫瑞间的关系不像海云和五娟那样毫无感情基础，但因为晚江有自己深爱着的丈夫和孩子，只是因为想享受物质上的生活，才选择离开自己深爱着的丈夫洪敏和儿子九华。

他们在异国的生活，物质上是富有的，情感上却是孤寂的。《红罗裙》中的海云，在异国自己能够做的事很少，“电视她是看不懂的，音乐她也是听不懂的。带来的两盘家乡音乐—河北民歌，她却不会用那个比飞机驾驶仪还复杂的音响组合，她也从来不算学，这世上绝大部分事她自认是学不会的”，她第一次去独自去商场，在商场迷了途，“从没一个人出过门，总是健将领路。不知怎的，她感到一种可怖的迷乱”⁴⁶，“可怖的迷乱”充分表达出了海云儿子不在身边时内心处于极度不安状态。

当年当海云得知自己的前夫中校殉职时，“她突然感到无限安全；五岁的赤条条的儿子就围在她蜷起的怀中，像再次将他装回了子宫。她和他之间不再有那第三者。她看见自己的乳房、腹、腿形成的弧度，正那么恰恰巧巧契合儿子柔弱幼小的身体；母与子的两具肉体如一种完美对称的镶嵌。她流下泪，是幸运的，终于得逞而松下一口气的泪。”⁴⁷海云从未爱过自己的前夫，她同他结婚，只是因为想要个儿子。儿子就是她活下去的心理依靠和精神支柱，在中国的时候，哪怕生活再苦，她也从未想到过再嫁。因为有健将在，她们母子两个相依为命，尽管清寒，却也快乐。

海云非常清楚健将不可能永远陪在自己身边，为此，找到的另一个精神支柱就是试穿她买来的衣裳。“她身子一进入那滑溜的、柔软的衣裙，往客厅大镜前一立，神便定下来，一种愉悦出现了。”⁴⁸对她来说，衣服已经不单单是物质了，通过试穿衣服，间接地享受自己同健将、卡罗间的亲密。海云在自己的前夫去世时，把健将完全搂在怀里，就像把他重新放入了自己的子宫里一样，感到完全拥有了健将以及因这种拥有而带来的无限的安全感。同样衣服跟肉体接触之后，就会成为一体，那是真正的完全拥有。因此，海云通过自己的肉体同衣服接触的这一过程，感受自己曾经因独自拥有儿子而带来的那种安全感。衣服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物质了，它成了儿子的化身，

⁴⁴ 严歌苓著，《花儿与少年》，--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1，第49页。

⁴⁵ 严歌苓著，《花儿与少年》，--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1，第49页。

⁴⁶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49页。

⁴⁷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45页。

⁴⁸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50页。

成了自己在异国生存下去的精神上的支柱，带给她安全感。

《约会》中的五娟曾平静家常地对晓峰说“晓峰，没你我可不来这鬼地方。怎么就过不熟，过不熟呢？连狗都长得那么奇怪！树啊草啊全叫不上名儿！晓峰，没有你，我肯定死了。”⁴⁹ 五娟心灵的寂寞和孤独可想而知。她开始更加迷恋自己的儿子，企图从自己儿子身上找到跟自己相像的地方，以慰藉自己孤独的心灵。孤独的心境使得她自己越来越陷入孤独，最后连自己的儿子也选择了从情感上背叛她。《花儿与少年》中的晚江在美国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可她并不幸福，“在一个样样丰富，又事事不当家的家里，钱对晚江，有没有无所谓。这么多年来，荣华富贵耗去了晚江对于钱的所有热情。她的荣华富贵是被动的、无奈的，她被置于其中，一切建设、设计都不需要她的参与。”⁵⁰晚江认为这样的生活是一锅温吞吞的白水，从没开过锅。

瀚夫瑞在同晚江结婚之前就办好了退休手续，同她形影不离，长相厮守，但这在晚江看来自己失去了人身自由。身边虽然有儿有女，可是儿子九华却因为不能够适应瀚夫瑞式的美国上流社会式教育，最终离开了这个家，自己出去开卡车送盒饭单过。晚江每天有半个小时去跟他见面的机会，可见面了，晚江说的无非是让九华好好学习英语，不要看国产剧之类的话，并无情感上的沟通。女儿仁仁亲口对她说“人大概不能选择母亲，但能选择父亲，父亲是晚辈的榜样，是理想。最重要的，对父亲的认同，是人格的认同。”⁵¹仁仁是美国长大的“土生族”，“按照美国华人学者麦礼谦的定义，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为‘土生族’（American Born Chinese），它同时亦指一些在中国出生但自青少年时代起就赴美并长期接受美国教育与社会影响的华人”⁵²，对于“土生族”认同的问题，葛亮认为“西方价值体系所构建的社会大环境却越来越频繁地冲击着他们的思维，于是‘土生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纽带渐趋薄弱，却又因为种族的缘故而难以离弃。”⁵³显然仁仁已经在情感上认同瀚夫瑞这个有着美国式思维意识的父亲，对于母亲晚江，不过是她情不得已的选择罢了。

作为一个母亲听到自己的女儿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其内心的创伤感可想而知。情感上的寂寞让她同瀚夫瑞的儿子路易间产生了情感上微妙的关系，但晚江明白自己同路易有一万种的不可能。晚江的前夫洪敏来美国后，他告诉晚江要在美国买一个属于他们一家四口人的房子，这无疑激活了晚江十年来孤寂的情感，为了一家四口能够美满地一起生活在美国，她倾尽自己的所有，不仅如此，还把瀚夫瑞以晚江的名义为仁

⁴⁹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99页。

⁵⁰ 严歌苓著，《花儿与少年》，--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1，第131页。

⁵¹ 严歌苓著，《花儿与少年》，--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1，第85页。

⁵² 吴前进著，《美国华人华侨文化变迁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82页。

⁵³ 葛亮，《从“土生族”到“新移民”——由严歌苓的作品看在美华人的文化认同》，《华文文学》（2004.2总第61期），第48页。

仁买的教育债券都兑现了，而这教育债券将来送仁仁进法学院做的投资，结果洪敏被人骗了，不仅如此，还欠了一屁股的债等着晚江去还。余学玉认为是文化错位导致了人性的迷失⁵⁴，从而形成了这一悲剧。

通过分析上述严歌苓小说中的这些结婚移民到美国的人，可以发现，她们在异国的生活尽管物质上丰足，却并不如意，情感生活尤其孤寂。每一个人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他自己思维意识作用的结果，好也如此，坏也如此。或者说外部事物是自己内在心灵外在的显像，心灵决定一切。外在的一切都是自己内心的映像，是他内在心灵状况最真实的反映。荣格说“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冲突仅仅表明：精神生活在最深的根源上是不可理解的‘某物’。这无疑是我们唯一的直接经验，我所经验到的一切都只是心理的东西。甚至肉体的疼痛也只是我经验到的一种心象；我的感官印象加之于我的是一个占有空间的难以把握的对象世界，而感官印象本身则不过是一些心象，并且只是这些心象才构成了我的直接经验，因为只有它们才是我的意识的直接对象。”⁵⁵这些人之所以感受到了心灵情感上的孤寂，是因为他们都站在主客对立的观点看问题，把自己或把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跟自己新的家庭成员对立起来看，这种主客对立的二元思维让他们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从自己的立场上去评判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无视别人的情感反应，使得自己总是处于孤立状态，即使别人对自己好，也感受不到，深深陷在了自己给自己下的情感圈套之中。这又决定了他们对待周边的态度，引发了众多本不会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只要她们稍微改变自己的心态，把对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子女的关注和情感依赖稍微收敛一下，以开放的心态来面对自己新的家庭成员，会发现她们的丈夫还是很关心她们的。《红罗裙》中的周先生决定辞职在家陪海云，还要带她去旅行，并且愿意出昂贵的费用送健将去上寄宿男校。尽管海云内心并非真心爱周先生，但至少她觉得周先生肯付那么一笔钱供健将上学，健将应该不会亏，她还是愿意留下来陪同周先生一起生活。这应该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花儿与少年》中只要晚江稍微改变自己心态，就会发现瀚夫瑞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九华、仁仁都可以说做到了仁至义尽了，刚开始晚江也承认这一点，认为做一个继父，瀚夫瑞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瀚夫瑞从没有正面反对过晚江去看九华，对于他们之间的事，瀚夫瑞几乎从不过问。当晚江请求瀚夫瑞开车去看九华时，瀚夫瑞都尽力满足晚江的要求。有一次晚江冒雨跑步，由于雨越来越大，瀚夫瑞开始回家开车到晚江跑步的终点去接她，却发现晚江坐在九华的卡车里，两人相依睡着了。回家后，晚江撒谎骗瀚夫瑞说自己在炮楼里躲雨，瀚夫

⁵⁴ 参考余学玉，《文化错位与人性迷失——评严歌苓的最新长篇小说《花儿与少年》》，《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2）。

⁵⁵（瑞士）荣格（Jung,C.G.）著，冯川，苏克译，〈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假设〉，《心理学与文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9，第16页。

瑞明知道晚江撒谎，却没有点破她，反而直让她去洗澡，否则会感冒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关怀，只要稍微留心就可以感觉到。小说中关于瀚夫瑞的一切心理活动，要么是晚江的猜想，要么是叙述者的猜想，瀚夫瑞从未直接表达过自己的心理。可悲的是，晚江总是习惯于从相反的角度去看瀚夫瑞，非但感受不到关心，反而在心里猜忌瀚夫瑞，认为瀚夫瑞虚伪，自己拉开了自己跟瀚夫瑞情感上的距离。

以陪读身份到美国来的人，以男性为主。他们同结婚移民女性又稍有不同。小说《阿曼达》中杨志斌是以妻子的陪读身份来到美国的，“杨志斌偶尔想到‘陪读’二字的意思，觉得有趣。伴随或陪衬。一个女人要做状元，她的男人做书童，搭个伴，或者也有壮胆、解闷、哄慰等功用。有他，人们便觉得韩淼是个完整的女人而不是那类女光棍。总之陪读有它次要却不可缺的职责。陪读的本职之外，他顺便挣一份微薄薪水。”⁵⁶杨志斌在办公大楼上班当保安，扮演着一个主流社会视而不见的角色，而杨志斌在大学时代，是中文系的主角。面对杨志斌，他妻子韩淼只能心疼他，“他一表人才，正当年盛，曾在社会中在事业中在女人中处处找得到位置，此刻却在这个社会声势浩大地进入趋动程序的早晨，蜷睡在局外。”⁵⁷由于杨志斌不懂英文，生活在美国主流社会的边缘，经济上只能依靠妻子韩淼，母国和所居国自己所处地位的强烈反差让他产生了自卑心理，并且影响了他和妻子间正常的性生活，“韩淼张开羽翼护着暖着六尺男儿杨志斌的形象在他脑子里怎样也挥之不去。它成了他亲近、爱抚妻子很大的一个打扰。”⁵⁸可是对爱的渴望是人正常的情感需要和生理现象，况且杨志斌并不是不想同妻子亲近，而是心理障碍妨碍了他而已。当他见到认为同自己一样处于边缘的弱者地位的阿曼达，同阿曼达暗中做了情感交流之后，他孤寂的心一下子活了起来，起初是表现在对妻子的态度上的，“他忽然很想紧紧抱一下妻子。他抱了，很紧，同时有了下一步想法。他感到韩淼的消极、温顺就很好。”⁵⁹

杨志斌最终情感的释放还是在阿曼达那里，跟阿曼达在一起时，杨志斌找回了在自己妻子和主流社会前丧失掉的自尊，当杨志斌告诉阿曼达自己下个月要搬家时，阿曼达为此流泪了。可以想象在美国做了近两年的伴读，几乎两年的时间里，杨志斌一直感到自己处于边缘，极其自卑。这时有个身体已经发育成熟的女孩肯在乎自己的来去，那份感动和情感上的慰藉是他理性承受不住的。“在回家的路上，杨志斌不敢想象刚才和这十四岁女孩揉成一团的竟是自己”⁶⁰，他情不自禁地同少女阿曼达发生了性关系，其代价是杨志斌被阿曼达一家告上了法庭，被判处十五个月的徒刑。

⁵⁶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8：吴川是个黄女孩》，--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第159页。

⁵⁷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8：吴川是个黄女孩》，--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第155页。

⁵⁸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8：吴川是个黄女孩》，--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第168页。

⁵⁹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8：吴川是个黄女孩》，--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第164页。

⁶⁰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8：吴川是个黄女孩》，--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第172页。

《女房东》中的老柴也有一个类似陪读的身份，他老婆把他办到美国后，给了他两千块钱就走了。

连一觉也没跟他睡。他一直配不上这个老婆的，跟她过的十几年、睡的十几年觉，都该算他白赚，都不该是他名分下的，他名分下不该有这个能干，高头大马，不丑的经济学硕士老婆。

“最后一次……”他对老婆低声下气。

老婆差点把他踢下床：最后了，还想再赚一次？！老婆走得非常理粗：我又不是跟别的男人走的。

恰是这一点，最让他想不开：不跟别的男人，何苦要走？难道我比“没男人”还次？！

现在都好了，老柴也习惯了没女人。每天晚上五点到十一点，他在一家餐馆送外卖，白天他上三小时成人大学。学到哪算哪，老柴没野心，而且跟找女人相比，上学本身是次要的。

老柴认为自己在四十八的年龄上模样是不坏了，没有胖也没有秃，几颗老年斑，这样刨刨头发可以遮上，成人大学坚持上下去，总会找着个女人。⁶¹

性方面的需要本是人正常的生理需求。离了婚的老柴并没有抱怨妻子什么，只是想找个女人。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他偶然在浴室里看到了自己从未谋面的女房东的洗了尚且湿淋淋的半透明的睡裙，引发了自己对女房东一系列的臆想。不知不觉中他把这个睡裙带到了自己房间，后来发现睡裙竟不翼而飞了。他觉得大概是女房东取走的，自己觉得自己犯了伦理道德上的大错，无颜面再住下去，就要退房，想搬出去。在搬出去之前终于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那个从未谋面的女房东，女房东却在自己面前晕倒了。“老柴将她抱进她的卧室，搁在她的床上。他觉得自己心的轰鸣就要惊醒她了。他摸摸她的额、鼻子和嘴唇，又摸摸她的脸颊和脖颈，他觉得自己的手决不肯停在她的脖颈上。一股要做蠢事的冲动使他喉口也哽咽起来。他不会干得太蠢，像所有男人对他们渴望极了的女人那样。他舍不得对她那样干。只是挨着她躺下来，让她身体上每一个柔软的弧度都吻合到他身上，让他毛糙粗硬的手生平惟一次品味那些弧度的细腻，让他的手在这层薄绸上摩挲，就够了。”⁶²老柴无疑是带着膜拜女神的心理看女房东的，只因为女房东的种种极其女性的行为。这暗示他内心对性感的、温柔的女性的渴求。

小说《少女小渔》讲的是出国劳动者的故事。小渔和江伟刚到悉尼同居的时候，

⁶¹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181页。

⁶²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192页。

两人能够呆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一段晚饭时间。

“吃喝亲昵都有花样，谈却总谈一个话题：等有了身份，咱们干什么干什么，那么自然，话头就会指到身份上。江伟常笑得乖张，说：“你去嫁个老外吧！”

“在这儿你不就是个老外？”小渔说。后来知道不能这么说。

“怎么啦，嫌我老外？你意思没身份就是老外，对吧？”他烦恼地将她远远一扔。没空间，扔出了个心理距离。⁶³

流散者离开自己的祖国，寄居他国，身份问题是他必须直面的问题。有了身份就意味着生活有了法律上的保证。江伟后来为了让小渔得到身份，让小渔同一个糟蹋的意大利老头假结婚。然而，江伟却在这一过程中不停地暗中吃老头的醋，因为小渔是个心眼好的女人，对谁都真心，对老头也是如此。尽管老头在别人眼里或许连畜生都不如，但是在小渔眼中，老头也是一个人，小渔用自己的行动感动着老头，最后让老头改变成了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老人了，甚至小渔同老头之间的关系也由假结婚，变成了微妙的没有捅破的父女般的关系。江伟对此大为不满，并将所有的不满都变相发在了小渔身上。

“我们，他敢和你‘我们’？你俩‘我们’起来啦？”车上，江伟一脸恶心的说。“俩人还一块浇花，剪草坪，还坐一间屋，看电视的看电视，读书的读书，难怪他‘我们’……”小渔惊吓坏了：他竟对她和老头干起了跟踪监视！“看样子，老夫少妻日子过得有油有益！”

“瞎讲什么？”小渔头次用这么炸的声调和江伟说话。但她马上又缓下来：“人嘛，过过总会过和睦……”

“跟一个老王八蛋、老无赖，你也能往一快活？”他专门挑那种能把意思弄误差的字眼来引导他自己的思路。

“江伟！”她喊。她还想喊：你要冤死人的！但汹涌的眼泪堵了她的咽喉。车轰一声，她不哭了。生怕哭得江伟心更毛。他那劲会过去的，只要让他享受她全部的温存。⁶⁴

在小渔即将离开老头家时，江伟对小渔说“我他妈的受够了！好像他是这一年唯一的牺牲。”⁶⁵江伟的委屈并非只因为小渔，他出国之前，朋友们从三个月前就开始

⁶³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6页。

⁶⁴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17页。

⁶⁵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19页。

给他钱行，“都说：以后混出半个洋人来别忘了拉扯拉扯咱哥们儿。”⁶⁶都以为他出国后肯定会混出个人样来，过上有身份有地位的幸福无比的生活，可实际上，江伟过得并不好，出国后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儿。这大概跟他曾经憧憬的生活有着强烈的反差。小渔的事不过是他借以发泄自己对曾经憧憬的不满，即使有小渔的温存和她在情感上对江伟的关照，江伟在异国仍然倍感孤独。

《海那边》的李迈克是一个非法留在美国打工的中国人。他工作得非常出色，吃苦耐劳且善解人意，“长得瘦小，很干净，英语凡是该讲的，都讲得纯正。他懂眼色，摸感觉，往餐桌上添什么撤什么都不必客人召唤。李迈克也肯干，有时辞工辞得只剩他一人，他仍是方寸不乱地周旋在十来张桌子之间。王先生的妻子王太太这种时候会来帮一帮，她一来，李迈克还分些心照应她，前脚她上错菜，李迈克后脚悄悄给她纠正，代她向顾客道歉。这些王先生都看在眼里。王先生没给李迈克加过薪；不加薪李迈克也一样会干下去。”⁶⁷王先生其实在利用身份这一问题，有意将李迈克边缘化。工作上如此，情感上李迈克更加孤独，他老婆和女儿已经整整等了他七年，而他自己心里很明白，自己回不去大陆，或许永远回不去，照片成了自己思念妻儿的慰藉，“他自己早已停止发问——她可还在等？等我到几时？依稀而遥远的妻子早已变得犹如希望本身那样依稀而遥远，而相片是他捉住这希望的惟一凭据。”⁶⁸李迈克情感上的孤寂可想而知，除了以妻子女儿的照片慰藉自己之外，他还通过从捡来的女明星的照片上去想象完全不可能发生在妻子身上的种种场面来安慰自己孤独的心灵，他对性和温柔女性的渴望之情由此可知。李迈克通过照片来慰藉自己的情感和对性需要的满足，他也给了泡一张年轻女明星的照片，告诉泡这个女人愿意嫁给他，在大陆等着泡。“‘大陆就在海那边’，能够渡海便能找到幸福，李迈克这一欺骗泡，他知道这谎言是善意的，因为他也如此欺骗自己。”⁶⁹泡是个脑筋残疾但生理正常的人，是李迈克打工餐厅老板王先生的仆人，王先生处处照顾泡，唯独忽视了泡情感上的需要。李迈克给泡的那张照片慰藉了泡孤独寂寞的心灵，让泡的灵魂复活。可王先生却以为这是李迈克在耍泡，想要骗泡的钱，为了保护泡，王先生向移民局高密，把李迈克遣送回国了。而王先生却被泡关在了冷库里，被冻成了一个人体雕塑。《海那边》这篇小说可以说是上演了一场因情感孤寂而导致的人的悲剧。

以陪读身份留在美国的，如《阿曼达》中的杨志斌和《女房东》里的老柴，可以说他们的处境同结婚移民者又稍微有些不同。如果说，结婚移民者还能够保障自己在

⁶⁶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5页。

⁶⁷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25页。

⁶⁸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35页。

⁶⁹ 陈晓晖，《另一种海洋——略论美华女作家严歌苓的三篇小说》，《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二期，第85页。

物质生活上的拥有的话，他们在物质上只有微薄的收入。尽管通过分析可发现，杨志斌和老柴在情感上都是孤寂的，但是显然作者严歌苓在这两篇小说中要传达的信息各不相同。杨志斌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是中文系的主角，到了美国却过着一个别人视而不见的，存在于别人生活之外的日子。尽管他的妻子是心疼他的，并且也想同他亲近，但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妻子是主流社会中的人物，自己则处于边缘，这一自卑心理妨碍了他同妻子的亲近。而在十四岁开起来稍微有些弱智的少女阿曼达那里，他找到了一个作为人的自尊，情感得到了释放。如果他能够放下一切心理上的包袱，或许就会是另一种结局。严歌苓在访谈中提到自己创作《女房东》的本意，“90年代初，在美国旧金山模模糊糊的雾气与阳光中，刚到美国不久的严歌苓默默地看着一条正在晾晒的睡裙。有一点点蕾丝，还带着水滴，很透明。她想，要是有一个男性看到这条睡裙，他会怎样地浮想联翩啊。”⁷⁰严歌苓通过他的小说，表达了在异国的男性情感上的孤寂和他们对善解人意的温柔的女性的渴望，也寄予了严歌苓对这些生活在异国的孤独的男性情感上的关怀。

中国大陆从八十年代开始，不断地有人出国，或留学，或移民，或出国劳工，在国内人看来，他们无疑有了更好的前途，成为很多人羡慕的对象。但事实并非如此，异国有异国的艰辛。生活在华人圈中的华人流散者，他们大多同所居国主流社会没有太多的直接性的接触，间接地体验着两种文化。但由于去国离家，他们情感上尤其孤寂，性爱本是正常的生理需求，可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满足他们的这种需要，同时人与人之间又缺乏心灵上的沟通，悲剧因而形成。语言丧失了表情达意的深层的沟通功能，有的只是表面上的无关痛痒的日常表达。严歌苓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在《花儿与少年》中通过苏表达了自己对这种状况的思考，“她想到世间的所有人，都一样要无话找话地交谈，要无动于衷地微笑，要毫无道理地拥抱、握手，说‘我很好。谢谢。你呢？’‘我也很好。’甭管她和他如何的满心地狱。苏同情他们。苏从不累自己。”⁷¹人类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思维，使得人永远不可能放下一切顾虑，同对方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⁷⁰ 《严歌苓：“寄居”在文学深处》，2009年04月09日，中国新闻网

⁷¹ 严歌苓著，《花儿与少年》，--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1，第159页。

第二节 同主流社会成员接触的华人流散者

严歌苓赴美初期的移民题材作品中的流散者，他们接触的大多是中国人，故事讲的大多是同自己家人间的矛盾，只是由于生活环境换到了异国他乡，那种倍感孤寂的情绪更加强烈而已，他们同美国的主流社会成员直接的碰撞比较少，相对来说，作品不是那么复杂，人物心理也不是很复杂。之后的作品又有些不同，这跟严歌苓自身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严歌苓去美国之后，跟美国的一个外交官劳伦斯相恋，而“美国在50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⁷²诚实的劳伦斯在一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如实地报告了他和严歌苓之间的关系是“趋向结婚”。此后，严歌苓开始受到美国FBI的调查，影响了她正常的生活。严歌苓在谈到这段往事时说，“我不敢肯定我的每个电话、每次外出是否处于某种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懂得了‘人权’这字眼，而懂得之后，又必须对这个神圣的权力一再割让。亦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地践踏过来。……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分量质量都不足。”⁷³严歌苓的这一经历对她影响很大，她的作品中开始出现了同洋人及美国主流社会成员接触的华人了。她笔下同主流社会成员正面接触的华人流散者的内在心灵状况又是如何的呢？

同主流社会成员接触时，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两种文化间的差异。言语是文化的承载工具，文化不同，表达方式也很不一样。文化的差异性首先具体体现在语言表达上的错位对话。小说《扶桑》采用“复调叙述”，一条线讲第一代华人移民的故事，一条线讲第五代华人移民的故事。叙述者是第五代华人移民，是个写书匠，她的丈夫是白种人，小说中就提到这种错位对话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叙述者告诉扶桑说：

我对白种人的猜测常有误会，慢说是你那时代的白种少年，就是和这位做了我丈夫的白种人，我也常常因为对他心理判断错误而引起令人啼笑皆非的错位对话。比如我说：“这种日本豆腐不好，下次别买了。”

他说(不太高兴，却十分礼貌)：“抱歉，没有买到你中意的。”

我说：“我只是怪日本豆腐，并没有怪你……”

他说：“我说我抱歉了。”

我说：“我没有怪你，就是豆腐不好……”

⁷² 严歌苓著，《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第53-54页。

⁷³ 严歌苓著，《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第56-57页。

他说：“我不是说了几次抱歉了吗？”

我不知我俩谁更错误。

你可想而知，我对克里斯的内心感受的理解可以差错到多远，或许会错的连边际都不着。

正如我丈夫在我的“yes”里从来听不出那个实实在在的“no”。⁷⁴

中国有句古话叫“越描越黑”，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两个人都不过想把话说得更明白，不想引起对方的误会，结果反而弄得更僵。语言表达上的差异问题，造成了两人心理上的距离，“我记不清有多少个瞬间，我和丈夫深陷的灰眼睛相遇，我们战栗了，对于彼此差异的迷恋，以及对于彼此企图懂得的渴望使我俩间无论多亲密无间的相处不作数了，战栗中我们陷在陌生和新鲜中，陷在一种感觉的僵局中。”

75

语言不过是一种载体，是表达的工具，太过计较语言表达上的问题，就会陷入言辞的陷阱。《心理医生在吗》里，舒茨本已经决定给叙述者推荐工作，推荐信都写好了，却因为舒茨执意认为叙述者撒谎骗自己，当着叙述者的面咆哮着把写好的推荐信打印出来，撕成了碎片。但是在叙述者看来，问题远不是舒茨想象的那样严重。“仅是一个托词或者搪塞，他喜欢称它谎言就称它谎言。你看，这是一种沉默的尊重，它让你明白你该停在哪里。当我听到‘你昨晚出去做什么了’这样的提问时，我回答‘出去走走’或‘去和约克碰面’是一回事。仅是个方便。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呢？对舒茨来说，实质只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从他可治可控范围的短暂消失。因此我回答‘出去走走’不光方便，而且更实质。就是为他怀疑和指控的短暂消失提供了证据。”⁷⁶面对同样的事件，两个人采取的态度却完全不同。舒茨大发雷霆，叙述者则完全以一种旁观的态度对待舒茨的这一反应。好在叙述者没有因为舒茨不理解自己的意思而为自己辩解、同舒茨争执，否则只会越闹越僵。

《太平洋探戈》中罗杰小时候见过一个驯虎女郎，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亚洲人，从此产生了亚洲人情结。成人后的罗杰，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雪梨的唐人街碰到了阿翠，三个月后他们订婚了。结婚后的一天，罗杰邂逅到和女友们逛街的阿翠，此时正好是午餐时间，罗杰便同她们一起吃饭。而这天晚上，他们发生了婚后的第一次冲突。

他说：“大家聚在一起吃午餐，为什么要我付账？”

阿翠说：“是啊，所以我就替你付账啦。”

⁷⁴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52页。

⁷⁵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33页。

⁷⁶ 严歌苓著，《心理医生在吗》，--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6，第20页。

他还是很无辜很懵懂地看着她。

“人家还要请我们客，到旅馆开房间呢！”

他说他以为那是玩笑。

她说“中国人开得起玩笑的都花得起钱；今天谁若较了真，她们请总统套房的客都不带眨眼。”

他想了一会，说：“可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我得付账。”

“阿莹的老公在场，他总是给我们所有女人买单的。阿萍的老公也是。你真给我面子啊！”

“你事先并没有告诉我，这是我该请客的午餐啊！”

“噢，还用事先告诉？！第一次在首饰店碰到你，我就对你的小气有数了！换了个中国男人，怎么也会意思意思，买点什么小东西给他正在追求的女人……”

他听到这里，突然感到“追求”二字非常刺耳，或者是她语调带些中伤的意思，总之他认为她在歪曲事实。他说他没有追求她。她说她又不是没注意到他跟踪了她两三里路。他说从那广场到唐人街最多一里路。

她说：“连多少路都算清楚了，还说没追我？”

“我常去唐人街……”

“画画去？别胡扯了，我又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又不是没给男人追过。街上二流子背上画夹子就有正当理由追女孩子了……”

他露在浴巾外的身体乍起一层鸡皮疙瘩，她哪来的这股恶意？她怎么对他辛勤尽职地养家如此麻木？⁷⁷

仔细阅读他们之间的对话，会发现，阿翠站在自己母国文化的立场上，用“中国人”这样一个群体性称谓给自己撑腰，数落罗杰。罗杰也站在自己母国文化立场上，想要弄懂为什么和阿翠的朋友吃饭得自己来付账这一点。罗杰说“大概他不懂中国人的文化，其中包括待人接物，以及交友的规矩。以后他会更留心去学。他还说两个种族的恋人总要磨合。”⁷⁸

对于同时有着两种文化经验的流散者来说，文化上的差异是以对比的形式出现的。《扶桑》中叙述者讲到“我们都会这样玩世不恭地笑（你看你永远不会），笑自己的辛勤，笑洋人的懒惰；笑自己的圆滑，笑洋人的虚伪；笑自己的节俭，笑洋人的‘不会过’。”⁷⁹这里“自己”和“洋人”明显地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关系，对比关系的背后是站在自己文化立场上，去评价另一种文化或群体，无形中更加拉大了两者间的

⁷⁷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8：吴川是个黄女孩》，--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第102到103页。

⁷⁸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8：吴川是个黄女孩》，--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第104页。

⁷⁹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125-126页。

差异。

阿翠的回答比较有启示，“什么文化差异？我从小来到雪梨，白种男朋友也不是没交过。别把自己的毛病往文化、种族上扯！”⁸⁰阿翠在攻击罗杰时，总是一口一个“中国人”如何如何，把罗杰看成一个个体，用“中国人”这个群体性名词跟罗杰这个个体对立起来，以此孤立罗杰，以便取得一种气势上的优势。且不说阿翠这种做法正确与否，但她无疑提醒了我们，一个人在是一个群体成员之前，他不过是一个个体而已，个体身上的特性怎么可能代表群体的共性呢？

实际上当一个人离开自己所属的国家或族群，他（或她）确实成了这个国家或族群的代表。《无出路咖啡馆》里叙述者和安德烈曾在餐厅里邂逅到一个黑姑娘，这个黑姑娘知道叙述者来自中国后，“她脸上有怜惜的神情。她心目中，中国意味着永久性的缺吃缺喝。于是我的苗条不是苗条，是骨瘦如柴，一个地道的灾民形象。”⁸¹显然这里叙述者成了中国代表。人对外族文化或者说异质文化的理解建立在个体的想象之上，同该实体或者该文化的真实性无关，是他们把通过各种渠道得来的片面消息综合起来之后，想象出来的结果，而后再通过具体的某个个体，或者某个具体的情景来证实自己的想象是对的。黑姑娘之所以会有一种“怜惜”的神情，大概是因为叙述者的形象证明了她对中国的想象是正确的，才会有如此的一瞥。

当牧师夫妇知道了叙述者由于 FBI 干扰了她正常的生活，使之陷入了困境之后，主动在教会办募捐会，让叙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请教友捐款援助叙述者。“整个晚上我都在讲述我童年的故事，有关粮票、油票、肉票的故事，有关我和一群孩子早晨五点去抢购八分钱一斤的猪骨头的故事。”⁸²虽然在小说研究中，我们不能把作者同叙述者等同起来，但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同叙述者的。中国确实有过用粮票、油票、肉票等换取物质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至85年代中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那时候，必须凭粮票才能购买粮食。中国最早实行的票证种类是粮票、食用油票、布票等。其实凭票供应不是我国最早采用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当时国内不稳定，内战不断，商品缺乏，就采取商品有计划的分配，发放各种商品票证，苏联最早的票证是1916年的鞋票。美国也在二战时期商品紧张时，发放了各种商品票证，其种类也不少，这其中就含有粮票性质的票证。”⁸³

叙述者讲自己童年时用粮票等的事，可以说是真实的叙述，但是在听者听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叙述者讲的是童年的往事，听者把其当成了现在仍在进行的事情。叙

⁸⁰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8：吴川是个黄女孩》，--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第104页。

⁸¹ 严歌苓著，《无出路咖啡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第67页。

⁸² 严歌苓著，《无出路咖啡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第247页。

⁸³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GFOjxa5PeeZDzBeyG6jbki73v4dwaXy5GzurWq8yDjJDdSCYwteE-QdtHxNC8yrVMNM6Hr9Ec2O5wvLIZbPcaa>，2016年3月30号检索。

述者的讲述无疑证实了他们对中国人过着艰苦的生活这一想法。“等我把所有童年故事讲完时，百分之八十的女人们手里都出现了面巾纸。她们遥远地为—群中国孩子流泪，为他们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大包小包的圣诞礼物，没有芒果而掉泪。”⁸⁴无论是“生日蛋糕”还是“圣诞礼物”，这些都是西方人庆祝节日的习惯，她们显然在拿西方的文化同中国文化做比较，想象异族文化。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从政治、权力的角度察看现实的一种方式，其结构扩大了熟悉的东西（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结果，欧亚两个大陆、东西方两个地域被人为地强行分开：欧洲、西方是强大的，有自我表述能力的；亚洲、东方是战败的，遥远的。而行使这一分隔、表述特权的不是一个傀儡的主人，而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创造者，这一创造者所具有的生死予夺的权力表述、激活并建构了自己熟悉的边界之外的另一个地域。这一想象、表述和分隔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以这种方式构想出来的两个世界，而这种想象、表述和分隔的自由总是西方人的特权，由于他的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他可以窥探亚洲的巨大秘密，他可以无休无止地纠缠这一秘密，他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塑造和解释。”⁸⁵那些教友显然站在他们的文化强势地位，想象中国人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作者严歌苓在小说《无出路咖啡馆》的叙述中就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想象。比如说“芒果树的故事”，芒果树是热带植物，叙述者并不曾提到自己生长在热带地区，显然叙述者在通过因文化差异引起的想象来赚取洋人的同情，“我却想不起那个有关芒果树的故事是我听来的，还是亲身经历的，我只是感觉她们爱听这样的故事，我把故事尽量讲得称她们的心。在晚会之后的几天里，我每天都收到十来封信。信的内容是对我的‘芒果树故事’所发的感想。这些真切、质朴的感想是伴着一张五十元或三十元的支票寄来的。”⁸⁶

作者严歌苓在小说叙述中，通过叙述者讲述自己童年的故事满足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同时，通过叙述者讲自己美国经历这一叙述又满足了生活在中国的读者对美国、对美国文化，甚至是对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的遭遇的想象。小说中多处提到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种族偏见，甚至在叙述者等待打电话时，也能遇到等着打电话的老太太对自己的侮辱，让自己“滚回亚洲”。这分明是在满足中国读者对种族歧视的想象。小说《无出路咖啡馆》里，本来是便衣福茨负责审查叙述者，可是后来中间换了一个“大块头”。作者严歌苓在小说中通过叙述者着实把这个人戏弄了一番。

⁸⁴ 严歌苓著，《无出路咖啡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第247页。

⁸⁵ 转引自《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东方社会》，张其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6，第88页。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51-452页

⁸⁶ 严歌苓著，《无出路咖啡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第247页。

他的大脸蛋因感恩节的肥大火鸡和圣诞节将再次出现的肥大火鸡而更加红亮。像他这样正常健全的美国家庭，一只节日火鸡可以吃许多天：节日当天是主菜，鸡胸脯和大腿外围的白肉红肉被消耗掉约百分之二十，余下的鸡胸和鸡腿肉可以做成一个礼拜至十天的午餐三明治，再余下的不成形状的碎肉可以做成晚餐的芹菜鸡肉沙拉，再余下的空骨架和火鸡头颅、脖颈、翅膀熬出够七至十天喝的汤，里面不断添进新鲜蔬菜。然后就是食品超市的火鸡大减价：冰冻货架上堆满肥硕庞大的火鸡尸体，标价签是金黄或橘红色，上面写着，三角五一磅。

坐在我对面的大脸蛋不会放过三角五一磅的火鸡，他将它照上一只火鸡的殡葬法再来一次，光烤好三明治再熬汤，完成另一个以人类消化系统为流水线的殡葬流程，使人、火鸡、自然、宇宙形成一环扣一环的生态轮回。

大脸蛋的呼吸在这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审讯室里显得气味浓重。没有窗子，我怀疑他是否嗅得到他自己的口腔气味，那是火鸡罐头的气味。若是打开一盒火鸡罐头狗食，跟这气味会比较接近。⁸⁷

短短的几段文字，通过饮食把中国和美国间文化的差异勾勒出来了。中国人不过感恩节和圣诞节，可西方人过这两个节日。按照叙述者的叙述一只火鸡算起来要吃上一个月，不把人吃腻了才怪，不仅如此，每顿吃的都是上顿吃剩下来的，就连空骨架也不放过，还要拿来熬出够喝十天的汤，里面还不断地加新鲜蔬菜。中国是一个讲究吃的国家，看了这段文字之后，别说吃，就是不吃也饱了，甚至还有种想吐的感觉，最后熬出来的汤恐怕只有狗才肯吃，果不其然，叙述者最后说这个大脸蛋的口腔气味跟火鸡罐头狗食差不多，其实是在转着圈地骂这个审讯员是狗。两种文化间的差异，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而这想象更加拉大了两种文化间的差异。

同主流社会成员接触的过程中，不仅会体验到两种文化间的差异，更能够感受到所居国强势文化的压力。《无出路咖啡馆》中叙述者“我”是个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后，一直为生活所困，不仅如此，因为同外交官安德烈的关系而被美国 FBI 审查，让原本就已经赤贫的我生活更乱了。如此忙乱的生活，叙述者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心情。她和里昂初次相遇，被里昂带到了海青和王阿花那里，在那里看见了王阿花的画，给她的心灵带来了震惊。“我突然感到我喜欢这些毫无道理的画面。我围着这些画面转了一圈，觉得那些细小残破的生命或生命标本在这样不切题的背景中显得脆弱；广漠无情的色彩洪荒中，渺小的生命被离间得那样彻底。小而脆弱的主体在大而强暴的客观中，像是最后的伤处，最终极的不愈，大片的麻木中，它们是残剩的最后知觉。它

⁸⁷ 严歌苓著，《无出路咖啡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第194页到195页。

们似乎触到了我某个隐秘的痛点，抑或快感点。”⁸⁸王阿花画里的内容之所以能够刺痛叙述者，让她的灵魂震惊，大概就是因为画在间接地传达着自己的心境。惟其如此，才能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王阿花画了些什么刺痛了她的灵魂呢？“那些画风格一致，都是浓烈的颜料、重大的笔触，颜料和笔触都发着很大的脾气；而细看进去，又发现色彩的泥泞中有朵精细的玫瑰，一只半透明的贝壳，或一片被沤烂得只剩纱网般筋络的白杨叶或枫树叶，或者，一只残缺的蜻蜓，一只垂死的蝴蝶，一枚鲜红欲滴的羊角辣椒。”⁸⁹“浓烈的颜料”、“重大的笔触”在画中都是背景，而画中的“精细的玫瑰”、“半透明的贝壳”、“只剩纱网般筋络的白杨叶或枫树叶”、“残缺的蜻蜓”、“垂死的蝴蝶”、“鲜红欲滴的羊角辣椒”等都是生命。浓重的背景之下，生命所占的比例却何其狭小，这不正象征着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吗？流散者独自一人生活在异国他乡，自身的文化甚至生命被强势的异国文化离间得到了苟延喘息的地步。

作家严歌苓曾在访谈中谈到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救赎意识。在她有了一定名气之后，有一次到美国之音接受采访。电台的负责人是过去美国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他问了严歌苓的经历后，对别人说：“你看，这个摇篮里的孩子被水冲到了我们的岸上”，“这是一句很诗意的话，他说得很温情。但是我还是感到对方那种强势的眼光。”⁹⁰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作为一个在基督教文化下成长的群体，基督教救世思想的普世价值观可能是他们身上的一种显现的外在行为，也可能是一种潜在的思维意识活动，西方的建立在上帝与人之间关系的个人主义同中国建立在社会群体关系之上的主流儒家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异。

严歌苓非常反感这种救赎心理，这一点可通过她的小说看出来。《无出路咖啡馆》中安德烈为了保护叙述者，不让她接受测谎试验，放弃了自己喜爱的外交官工作，而叙述者却认为这是安德烈在以高贵的姿态做拯救她的事。在叙述者看来不仅是安德烈，牧师夫妇、便衣福茨·理查，甚至是在餐厅里邂逅的黑姑娘等其潜意识里都隐藏着一种要拯救自己的拯救意识。

小说中当安德烈知道了叙述者同里昂之间的暧昧关系后，安德烈对叙述者“我”说“你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国家，你总得有些人来帮你。即便这些帮助不是实质性的，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情愫，我为什么不能理解呢？我今天邀请里昂，就因为他给了你我不能给的--他的肤色、模样、他的中国气质。我没说错吧？他给你营造了一种中国气氛，是不是？”⁹¹安德烈说的“不是实质性的帮助”，可以理解成

⁸⁸ 严歌苓著，《无出路咖啡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第50页。

⁸⁹ 严歌苓著，《无出路咖啡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第50页。

⁹⁰ 《严歌苓：“寄居”在文学深处》，2009年04月09日，中国新闻网

⁹¹ 严歌苓著，《无出路咖啡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第270页。

是对叙述者精神上的安慰。尽管叙述者很不愿意承认安德烈的话，但实际上她在第一次接触里昂就有了类似的情感表白。“我们并肩走出站口。他见我冷得缩作一团，脖子都消失了，便将一条胳膊搂过来，让我的右肩贴着他瘦骨嶙峋的左胸。虽然这样没给我添多少热度，但却是个令人暖和的意念。抑或说，是种非物质的暖和。”⁹²安德烈是善解人意的，他说“假如你做了任何需要我谅解的事，我想你已经得到了我的谅解。”⁹³安德烈的谅解成了叙述者生命之中难以承受的情感负荷，她最后选择离开安德烈，到刘先生身边照顾刘先生。

叙述者毫不掩饰自己想过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小说中她没有选择安德烈，但也没有说同安德烈分手，“没有永别的字眼，只有永别的意境”⁹⁴。选择安德烈必然面对着两种文化的差异，如果叙述者不改变自己的心态，不能冲破自己给自己套牢的那一层文化对抗心理枷锁，即使她和安德烈结了婚，过上了自己向往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她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富足上，而是心灵的自由自在。小说最后，刘先生无疑已经认为叙述者就是自己爱恋着的菁妹，叙述者选择到刘先生身边同时可以满足自己的两种需求，一是物质上的，一是精神上得到某种程度安慰。说来也怪，安德烈和牧师夫妇等西方人对自己的帮助，叙述者都看成是对方出于拯救心态才帮助自己，但刘先生对自己的帮助，叙述者却认为是正常的接济，甚至愿意主动跟刘先生提出让他帮助自己。同样是接受帮助，但是接受时的心态截然不同，这背后是一种实质的文化抵触心态。自己的心态决定了自己对同种援助的态度。

华人流散者在同美国主流社会中，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不再那样怯，目光平视，一嘴背诵好的英文，一身仅有的西服。得到了这个职位。我们看着耸立蔽日的高楼，茫茫的马路，想：又他妈的怎样呢？玩世不恭的笑出现在我们的眼睛和体态里——这就是五代人要争夺的位置，又怎样？仍是孤独，像第一个踏上美国海岸的中国人一样孤独。”⁹⁵为什么呢？他们以为自己得到了那个本属于主流社会成员的职位，就融入了主流社会，结果却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源于文化差异上的一种无形的文化偏见和种族歧视一直存在着，他们不可能融入主流社会中去。“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要屈从于一种痛苦，这种痛苦被法农称为杂交裂缝中的存在，他们要试图同时经历两种不同的、互不兼容的人生。如果你想成为白人，改变你的种族和阶层，你就要吸纳主流文化，这种不同身份之间的妥协，不同价值体系层面之间的妥协（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对她们来说这些选择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否则，

⁹² 严歌苓著，《无出路咖啡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第39页。

⁹³ 严歌苓著，《无出路咖啡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第270页。

⁹⁴ 严歌苓著，《无出路咖啡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第283页。

⁹⁵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125页。

即使你接受了白人的价值观，你也不可能是一个十足的白人。”⁹⁶严歌苓“用了两个词来形容自己试图融入西方的过程：‘徒劳’和‘痛苦’。”⁹⁷

跟主流社会有直接性接触的华人流散者，其内心远比生活在华人圈中的流散者要复杂得多，也敏感得多。他们一方面要承受着客观存在着的文化上的差异带来的种种冲击，同时又因承认文化差异这一心理，更觉得客观上的文化偏见和种族歧视是一堵无形的不可逾越的墙，挡在了自己同主流社会之间。而实际上，他们总是站在文化的二元对立观点看待客观世界，这造成了他们无法融入主流，无法同主流社会的人融洽。同样，主流社会成员也是站在二元对立观点看待流散者。就好比各自为自己画了一个圆，而这两个圆是各自占地为圈的，都在警戒着对方的圈。客观环境不过是自己内心心灵的映射，哪怕自己内心再怎么希望融入主流，看到的客观主流社会，如果没有接纳自己，说明还是自己站在二元对立观点看问题。是自己没有把自己的心完全放开，外在的客观环境才会如此显现。

⁹⁶（英国）罗伯特·J.C.扬著，容新芳译，《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6），第23页。

⁹⁷《严歌苓：“寄居”在文学深处》，2009年04月09日，中国新闻网

第三节 中国境域内的外籍人士

严歌苓在其流散之初，写了一系列关注华人生活的移民题材作品，后来笔锋一转，将视角换到了中国本土题材上，可这些作品中却可以发现一些生活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他们的内心状况又如何呢？

《小姨多鹤》中的多鹤生活在中国多年，但她仍然保持着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见人会鞠躬、进门脱鞋，把地擦得干干净净等。多鹤的心理又是如何的呢？“在和张俭相爱之前，她从来没有想过她要融入一个中国人的社会，要中国人把她作为同类来认识。她甚至没有觉得孤独过。她有她的孩子：她为自己生养出来的一个个亲骨肉——那些身上有一半竹内家血脉的亲骨肉。她曾经想，只要他们围绕着她，就是代浪村围绕着她。”⁹⁸可见多鹤她从没有想过要融入中国这个主流社会，没想过要得到中国人的认同。

多鹤她在中国的满洲国出生，从未到过日本，对她来说，日本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实体。“她记不清日本的任何事物，小火车运来的一包包摆放整齐、装帧考究的紫菜，一小捆一小捆仔细折叠包装的印花布，就是她的日本。”⁹⁹“多鹤相信东京、大阪一定美好，因为铃木医生就那么美好。全村的女孩子都这么看铃木医生：即便打仗打掉一条腿还是那么美好。”¹⁰⁰在多鹤的心中，日本是极其美好的，它是多鹤的精神支柱，让她能够克服艰难困境，顽强地活下去。

可日本对多鹤来说，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实体而已，于是她通过发现身边同代浪村相像的东西，通过自己生下来的孩子，维系着她的情感归属。“她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坐在很陡的小径石阶上，离一切都遥不可及。她从小长大的代浪村那么远，越过代浪村，往东，是她的祖国日本。祖国也有一个代浪村，埋葬着竹内家的祖祖辈辈。祖国的代浪村太远了，她原先在丫头、大孩、二孩身上还能找回那个代浪村，还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那些埋葬在祖国的代浪村祖辈们的一喜一怒。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沉默、宁静，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狂喜和狂怒。她每次摸着大孩二孩的头发——那头发仔细看是和眉毛连成一片的，就想她父亲、哥哥、弟弟借着她的孩子们还了魂，借他们小小的肉体暖着她，给她依靠。”¹⁰¹

这些想象把她同和自己生活在一个家里的中国人隔开，孤立自己，她对日本的感情都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些想象成了自己同自己母国间联系的纽带，靠这些想象维系自己同日本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心理驱使下，多鹤在日常中保持着自己代浪村人

⁹⁸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142页。

⁹⁹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53页。

¹⁰⁰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53页。

¹⁰¹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86页。

的生活习惯，服饰上的，饮食上的，以及语言上的，这让她哪怕生活在中国多年，也看起来和中国人不同。“多鹤和所有家属穿扮得一模一样，都是一顶草帽，草帽下一块毛巾。不同的是，她不像她们那样套两只套袖，而把一根松紧带结成圆形，交叉勒在胸口，两端的圈把袖子固定到大臂上，露出雪白的小臂。代浪村的女人们再冷，都是这样露着两条赤裸的臂膀耙田、搂草、磨面、喂牲口。”¹⁰²

然而“回到日本的多鹤成了半残废，连城里人现在的日本话都听不懂。不懂的事情很多：投钱币洗衣服的机器，清扫地面的机器，卖车票的机器，卖饭和饮料的机器……久美得一样一样教她，有时得教好几遍。常常是在这里教会了，换个地方，机器又不同前一种，学会的又白学了。没有久美她哪里也不去，商店也不敢进。”¹⁰³严歌苓曾说，“祖国在我缺席的二十年里，发展了语言，改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社会。总的来说，改变非常大。所以我也找不着位置的感觉。”¹⁰⁴多鹤的情况正是如此。多鹤从未到过日本，她对日本的了解不过是建立在满洲国的代浪村记忆上的想象。那时的代浪村还没有发展工业，而实体的日本几十年来发展了语言，改变了生活方式，社会也改变了，多鹤错过了日本的发展期，眼前的日本同她记忆中的代浪村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

在中国时，多鹤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就是代浪村人，而代浪村的另一半就在日本，即自己就是日本人。可到了日本，一直以来自己身上保留的日本人的语言和习俗跟真正的日本有很大的错位，她不仅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还成了被自己的国民歧视的对象，“从中国归国的人成了日本最穷、最受歧视的人。多鹤还说到一个从中国回国的代浪村乡亲，他的孩子在学校里天天挨揍，因为同学们叫他中国佬。就像这孩子归国前中国同学叫他日本鬼子一样。”¹⁰⁵

与此同时，她又非常思念自己在中国的生活，俗话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多鹤常常给小环写信。她总是讲到她的梦。她梦见自己又在这个家里。她梦见楼下的那条马路，那大下坡。她说她常去东京的中国街买菜，那里的菜便宜，那里的人都把她当中国人。”¹⁰⁶多鹤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虽然十六岁之前是在日本代浪村同代浪村村民一起过着日本人式的生活，可是之后的很多年，多鹤都跟中国人生活在一起，她必定受中国人的影响，尤其受同她一起生活的朱小环的影响，这一点在多鹤从日本来探望小环他们时说的话可以看出来，“她没什么需要买的，她的衣服、鞋子、用品都是捡久美的。捡不要钱的衣裳鞋子可美了。幸亏久美只比她高半头，衣服都能凑合穿，

¹⁰²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120页。

¹⁰³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308页。

¹⁰⁴ 穆肃，《我是一个乐观的寄居者》，2009年3月22日，《东莞日报（数字报纸）》。

¹⁰⁵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319页。

¹⁰⁶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318页。

要是比她高一个头，衣服改起来有多麻烦！更万幸的是，久美的脚比她大两号，鞋尖里塞上棉花凑合穿，挺好，要是久美的脚比她小，就该她遭老罪了。”¹⁰⁷这种语气一看就知道是朱小环式的。尽管多鹤在中国时从没有主动跟朱小环亲，甚至因为张俭的原因，她在心里怨恨过小环，可是小环真心把多鹤当成妹妹看，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从情感上都或暗中或明里照顾她，这是多年来潜移默化的结果。多鹤不仅受日本文化影响，同时又受中国文化影响，她身上文化的混杂性因而出现。她生活在中国的时候，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就是日本人，可是到了日本，发现在日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可同时她又无法完全成为中国人，这使得她有了认同危机。

《金陵十三钗》中的法比·阿多那多副神甫，生长在扬州乡下，是一对意大利裔的、美国传教士的孩子，六岁时，他的父母在传教途中染了瘟疫，几乎同时死去，法比跟着生下来就照顾自己的阿婆生活。“父母去世后，他的真阿婆来到中国。外祖母是个穿一身黑、又高又大、满头卷发的女人，他躲在他的中国阿婆身后，怎么也不敢跟他的亲阿婆行见面礼。外祖母是来带他回美国去的，乡镇上一个中学教员艰难地给双方做翻译，法比听了这个噩耗后偷偷逃跑了。”¹⁰⁸血缘上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拉近法比同他外祖母间的距离。他宁肯选择同自己生下来照顾自己的中国阿婆一起生活。从小生活在中国人中间，他的“思考都带扬州乡音”¹⁰⁹，但他是个“长着西人面孔的中国少爷”，哪怕他对中国的文化再精通，扬州话说得再字正腔圆，他都无法改变自己的相貌，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由于英格曼神甫的帮助，法比去美国进修三年。“法比找到了他在美国的一整个家族，有了长幼一大群亲戚。他在跟他们团圆时把头皮都抓破了；他一紧张不安头皮就会爬满蚂蚁般的痒。这时他发现自己也做不了美国人，他觉得跟美国亲戚们热络寒暄的是一个假法比，真法比瑟缩在内心，数着分秒盼望这场历史性血缘大会晤尽早结束。”¹¹⁰可见血缘并没有拉近法比同美国的距离，他不习惯西方文化。由于他从小就生活在中国，他已经相当程度被中国文化同化了。“英格曼不止一次地告诉法比，他希望法比克服‘消极进攻性’，争论要明着争，批驳也要直接爽快，像绝大部分真正的美国人。法比的‘消极攻击性’是中国式的，很不讨他喜欢。”¹¹¹就算法比有着西人的面孔和血统，就算去美国留学接受过教育，也不能抹掉他身上的中国文化因子。因此，赵玉墨“她第一眼就看出法比有多么孤独。谁都不认他，对生他的种族和养他的种族来说，他都是异己。”¹¹²

¹⁰⁷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308页。

¹⁰⁸ 严歌苓著，《金陵十三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9，第55页。

¹⁰⁹ 严歌苓著，《金陵十三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9，第42页。

¹¹⁰ 严歌苓著，《金陵十三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9，第57页。

¹¹¹ 严歌苓著，《金陵十三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9，第59页。

¹¹² 严歌苓著，《金陵十三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9，第42页。

《寄居者》中的叙述者玫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后裔，自小在美国受尽种族歧视，“我表哥有一次去犹太人住的豪华社区送洗干净的衣服，回来时脑瓜让犹太男孩儿们开了瓢。同一个表哥，有一次和几个唐人街的男孩儿开了一个黑人小伙子的瓢。美国是个好地方，各种人都能找着歧视的对象，形成一个歧视的大环链。”¹¹³种族歧视成了叙述者控诉的对象，同时它又造成了她执着身份的畸形心理，“告诉你们，我们这样受外族人欺辱的孩子自尊心是畸形的，病态的敏感，在能倚仗自己身份优越的时候一定不放过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包里放着美国护照。各种外族人在上海进行种族优越竞赛的时候，我决不放弃我美国身份的优越性。”¹¹⁴

她眼中的上海完全是一个身份等级竞技场，“告诉你的这个上海，有百分之八是白种人，这个上海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勉强把有英国国籍的塞法迪犹太阔佬看做人，犹太阔佬又把俄国流亡的犹太人勉强当人看，而所有这些人再把有钱的中国人勉强当人看，把没钱的中国人完全不当人。在来看看中国人，中国人在这里是指上海人。上海人把江北佬、安徽佬，所有外地佬勉强当人看，而把巡捕房的锡克人当‘红头阿三’，把欧洲来的犹太难民当‘犹太瘪三’。假如中国有个说法是‘三教九流’，那么上海就是‘九教二十七流’。”¹¹⁵

叙述者在上海为有一个美国身份而感到优越，而实际上在她看来，她的这种身份优越是缺乏实质的。“假如我是一个纯种白人，美国总领事会把我当个大事去办的。我的姓告诉他我是个华人，他想，无非是那些不知耍了什么勾当在美国赖下来的中国佬后代，就打发手下的华人雇员去交涉。为一个唐人街洗衣坊的女儿跟日本人过意不去，何苦？日本人攻打南京时，炸沉了美国军舰 Panay，都没让美国太较真。从沉了的 Panay 上撤到荒岛上的美国使节们让日军飞机扫射追杀，死伤一片，那么大一桩事情，都没让美国跟日本太过意不去。”¹¹⁶叙述者的意图很明显，要告诉读者，在美国人眼里，自己不过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华人而已，就算是纯种白人，当他们遇到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时，美国政府也没有尽心尽意去保护他们，何况是一个华人后裔呢？正因为叙述者玫太执着身份问题，这一心理让她遇到事情就往身份和种族方面想，叙事里夹杂的种族不满意识非常强烈。

玫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我是个在哪里都融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因此，我在哪里都住不定，到了美国想中国，到了中国也安分不下来。”¹¹⁷在美国，她的社会地位被认为是低下的唐人街华人后代，没了身份上的优势，自然

¹¹³ 严歌苓著，《寄居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8，第16页。

¹¹⁴ 严歌苓著，《寄居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8，第51页到52页。

¹¹⁵ 严歌苓著，《寄居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8，第2页。

¹¹⁶ 严歌苓著，《寄居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8，第62页。

¹¹⁷ 严歌苓著，《寄居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8，第160页。

会想回到中国。她在中国时不断地炫耀自己的美国身份，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认为自己同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不是一个等次的，甚至自己的身份要高于中国人。有这种心态，怎么可能融入到哪里去呢？玫的认同危机跟种族意识有很大的关联，这种种族意识有外在的客观原因，但跟她内在的心理因素又有很大的关系。

严歌苓笔下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远不止这几个人，还有《寄居者》中的犹太人，《第九个寡妇》中的朴同志等，他们的状况我将放入下章进行分析。就已经分析的这三个人而言，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认同危机。而这一认同危机是他们回到自己的母国之后才出现的，而实际上他们的状况又不尽相同。多鹤因为自己执着于她想象出来的日本情感归属，而使得她在中国时根本不曾想到要融入中国。中国人没有谁站在种族歧视的或者排外的立场上对她，只要她愿意，她早就可以融入中国人中去了。玫是因为种族歧视而让她执着于身份，从而产生了一种畸形心理，在美国由于美国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问题，可能让她有一种融入不了的感觉，而在中国，我认为不是别人尤其是中国人排斥她，而是她不愿意认同中国文化，所以才形成了她到哪里都融入不进去的状态。法比倒是比较愿意认同中国文化，这一点我将在下章具体分析，只是因为他有着一个西人的面孔，才使得他做不成中国人，但是没有中国人排斥他、歧视他。

通过生活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流散者和生活在中国主流社会的外籍人士流散者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呈一种包容状态，它不排斥任何人，不排斥任何东西。在中国，只要流散者愿意，她是不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歧视的。能不能融入中国的主流社会主要是由流散者个人心态取向决定。

第三章 严歌苓及其笔下流散人物的认同问题

对于流散者来说，身份问题大概是他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问题。身份一词在英文中是“identity”，也可以译为“认同”，基本含义是一致的，认同“它必须在生活中、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才能浮现出来，个体首先是在自己的内心中发现了某种认同于他人的感觉，内心中的自我通过融入到集体（比如国家、民族、社会阶层、政治组织或宗教组织）的认同感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属’”¹¹⁸。流散者同时经历体验两种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文化必然都会对流散者产生影响，使得流散者身上出现文化的混杂现象，不知道自己该归属于哪种文化，从而产生了认同焦虑，如严歌苓及其笔下的众多人物。然而认同同一个人的心态有着很大的关联。

¹¹⁸ 亚当·库珀著，石毅译，《文化、差异、认同》，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经典导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382-383页。

第一节 心态与认同

流散者同时经验两种文化，自己母国文化和所居国文化。当一个人处于这种生存状态时，他会自觉不自觉地拿自己的母国文化和所居国文化作比较，起初是站在自己母国文化上去判断所居国文化。严歌苓流散之后早期作品中的流散者形象可能是她根据自己周围的人，可能也包括自己的亲身经历，以这些故事为题材创造出来的，但是所有叙述者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带着文化偏见来看待自己所居国的主流文化，而故事中主流社会成员同样也带着文化偏见来看待别国成员。

美国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如此，“美国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或他的先人都是作为移民来到此地的，但是不包括美洲大陆的土著人。其次，美国大片段陆地是独立存在的，并不与别的大陆相连，而是分布于其他国家和大洋之间。美国与土地、历史、文化缺乏传统联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要从其自由政权的意识形态（民主、自由、自由经营的资本主义）中衍生出一个使其与众不同的身份，为什么美国不得不创造出一些被妖魔化的、据说对其生存构成威胁的敌人（这些被妖魔化的敌人相继是：巫师、中国移民、共产主义、拒绝说官方语言英语的西班牙裔美国人、说黑人英语的非裔美国人、非洲杀人蜂、伊斯兰教……）。这些敌人让不同的美国人感受到了集体的威胁，并使大家团结一致起来。”¹¹⁹文化的差异被当成排外的借口，使得美国人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共同体。

《扶桑》里叙述者开篇就说“我从来不知道使我跨过太平洋的缘由是什么。我们口头上嚷到这里来找自由、学问、财富，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想找什么。”¹²⁰原以为自己找到的东西是可以拥有的，结果发现即使拥有了，仍有一堵无形的墙搁在自己和主流社会之中。

严歌苓自称“自己有身份认同危机感，我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美国生活二十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就是那种边缘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主流的感觉。因为无论怎样，西方文化都是我半路出家学来的。我回到自己的祖国也是一个边缘人，祖国在我缺席的二十年里，发展了语言，改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社会。总的来说，改变非常大。所以我也找不着位置的感觉。”¹²¹多鹤的经历同严歌苓的感受不谋而合。严歌苓曾经在《花儿与少年》后记中谈了自己对“迁移”的看法，“在我看‘迁移’是不可能完成的。看看旧金山 30 路公共汽车上的老华侨们，他们那种特有的知趣、警觉、谦让和防备，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的假定。我和他们一样，是永远

¹¹⁹ 罗伯特·扬，《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第62页。

¹²⁰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3到4页。

¹²¹ 穆肃，《我是一个乐观的寄居者》，2009年3月22日，《东莞日报（数字报纸）》

的寄居者，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荒诞的是，我们也无法彻底归属祖国的文化，首先因为我们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其次因为我们已深深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离间。即使回到祖国，回到母体文化中，也是迁移之后的又一次迁移，也是形归神莫属了。于是，我私自给‘Displacement’添了一个汉语意译：‘无所归属’。”¹²²

在严歌苓看来，流散让一个人处于“无所归属”的状态，到哪里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她笔下的人物《寄居者》中的 May，《小姨多鹤》中的多鹤，《金陵十三钗》中的法比等等，他们这些人物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在所居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回到了自己的母国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仅如此，严歌苓还通过华人的寄居探讨犹太民族的流散状态，给他们的定位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严歌苓曾努力地想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刚到美国的严歌苓，拼命地想要融入西方社会。她很小心也很害羞，生怕听错别人的话，自己也生怕说错，只好尽量不开口。但她是那样一个有强烈表达欲望的人，不开口，就只好更加地把感觉内心化。她渐渐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差异和种族偏见。”¹²³严歌苓小说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同严歌苓自身的感受有很大的关系。她在《扶桑》中通过叙述者讲到“种族歧视已被太多的形态掩饰，已变得太世故和微妙了。它形色如幻，一时无所不在，一时一无所在……我们没有愤怒和仇恨的发泄渠道。我们没有具体的敌对面。周围的白面孔千篇一律在微笑，那笑怎么都比追打进化许多。于是我们如此迷失。”¹²⁴面对这样的处境，“严歌苓用了两个词来形容自己试图融入西方的过程：‘徒劳’和‘痛苦’。”¹²⁵

在严歌苓看来，自己得不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种族歧视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种族歧视成了她笔下表现的一个主题。小说《扶桑》描述了第一代华人移民在美国备受种族歧视和欺辱，种族歧视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是完全看得见的，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代华人移民们的态度如此，“他们不声不响，缓缓漫上海岸，沉默无语地看着你；你挡住他右边的路，他便从你左边通过，你把路全挡完，他便低下头，耐心温和地等待你走开。如此的耐心和温和，使你最终会走开。他们如此柔缓，绵延不断地蔓延，睁着一双平直温和的黑眼睛。”¹²⁶在严歌苓看来他们显然是为活着而活着。“现代中国文学发生之始，即以‘人的文学’的理论倡导来反对旧文学，实践新文学。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又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人’的发

¹²² 严歌苓著，《花儿与少年》，--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1，《错位归属》，第194到195页。

¹²³ 《严歌苓：“寄居”在文学深处》，2009年04月09日，中国新闻网

¹²⁴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125-126页。

¹²⁵ 《严歌苓：“寄居”在文学深处》，2009年04月09日，中国新闻网

¹²⁶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45页。

现，一方面是肯定人自身所内含的欲望、要求、权利；另一方面则是探求和确立人生存的‘意义’。也就是说，人为什么活着，成了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找到并且去实践活着的‘意义’。这个问题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下，甚至发展出这样严厉的判断：没有‘意义’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是不值得过的。”¹²⁷

严歌苓是一个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作家，当她亲身置身西方，在那个强烈的一切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的一切为评判标准的环境下，第一代华人移民的这种“为活着而活着”的生活态度，无疑深深刺痛了她。她在《主流与边缘—写在长篇小说《扶桑》获奖之后》中说到“这是两种文化谁吞没谁、谁消化谁的特定环境。任何人物、任何故事放进这个环境中绝不可能仅仅是故事本身。由于差异，由于对差异的意识，我们最早踏上这块国土的先辈不可能不产生一种奇特的自我知觉：别人没有辫子，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辫子始终有着敏锐、脆弱的感知。在美国人以剪辫子作为欺凌、侮辱方式时，他们感到的疼痛是超乎肉体的。再有，美国警察在逮捕中国人后总以革去辫子来给予精神上的惩罚。这种象征性的惩罚使被捕的人甚至不能彻底回归于自己的同类。因此，辫子简直就成了露于肉体之外的，最先感知冷暖、痛痒的一束赤裸裸的神经！在如此的敏感程度下，人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客观，不可能正常。任何事物在他们心理上激起的反应，不可能不被夸大、变形。人的那些原本会永远沉睡的本性不可能不被惊动，从而给人们一些超常的、难以理喻的行为。”¹²⁸

中国自古就有蓄发的习俗，即使第一代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大概也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辫子而感到同洋人的差异，感受到心灵上的不舒服，而且他们都是群聚而居。他们不过是将生活的环境搬到了美国，他们的衣食起居，甚至交流的语言都是自己的乡音，自己的周围是跟自己一样的亲戚朋友，他们不会想到去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而是希望挣了钱到死之前能够回乡返回故里。“1876-1901年间，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出国的移民大约有480万，其中约有400万回国了。这一数据虽然是就大量移民东南亚地区的中国侨民而言，但同样适用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美国华人的基本心态，即以旅居者的身份而非定居者的姿态来到异邦。故对于周围的社会环境，美国人对他们的反应友善与否并不重要，若不威胁其生存，彼此可以相安无事，大有‘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安然。他们是消极的、被动的、无意识的纯朴的乡村农民，且不怀有任何非分的企图，自然也就与资本主义的城市经济形态格格不入。这样，由共同的语言、风俗习惯、思想信仰所结合而成的血缘、亲缘、地缘共同体也自然形成于唐人街社会中，他们视唐人街为自己的保护地，一如生活在家乡，愉快而自在。凭

¹²⁷ 张新颖，《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南方文坛》，2011.6，第6页。

¹²⁸ 严歌苓著，《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第118页。

借与生俱来的文化亲和力，华人社会因在异域自觉地发挥文化遗产的功能，而被美国种族主义分子找到攻击诋毁的口实。19世纪70年代以后，华人就成为被排斥和攻击的主要对象。此中无法回避的因素之一，便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与对立--由对中国人行为举止、生活习惯的嘲笑发展到歧视与驱逐。”¹²⁹

十九世纪之前的中国老百姓他们接受的仍然是中国传统思想，他们知足、懂得忍耐、过着逆来顺受的生活。严歌苓在现代教育环境中长大，到了美国，又受西方文化影响，自然容易以西方文化作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现代教育其实就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物的教育，西方人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等，认为它们是一个人活着应该追求且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第一代华人移民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思维意识，显然是不为严歌苓赞同的。严歌苓曾说“中国人那段移民的历史是辉煌的、有趣的，是被中国人忘掉了的，是不为中国大陆人所知的。现在中国人对外国人一会儿是狂妄的，一会儿是谦卑的，从来没有拿正过一个态度，仇恨起来也特别莫名其妙。在这种状况下，我写出《扶桑》，希望中国人看到自己在一个阶段、在人类当中被摆在什么样的位置，希望中国人能够记住这样一段历史，像犹太人一样，能够自强。”¹³⁰正如有研究者讲到“严歌苓不无悲哀地发现以‘辫子’为表征的国民性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所起的作用--它引起的是西方对东方的东方主义的想象和歧视并刺激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于是，她让黄阿贤剪掉了辫子以表示对人的尊严的觉醒，又在《扶桑》中塑造了一个令西方人敬畏的、神勇的、梳着一条美丽的辫子的大勇，这都显现了严歌苓改造国民性的美好愿望。”¹³¹

在这种意识指引下，严歌苓在小说《扶桑》中塑造了一个大勇。大勇是领导第一代华人移民反抗种族歧视的领袖和英雄。大勇看到了被白人打死的老伙夫后，用马车拉着老伙夫的尸首把这尸首送到了正要上工的中国苦力们的面前。

有人终于认出尸首，咬耳朵说：是老厨子！昨天下午挑茶到工场，抄近路……

好好看看，看看头发怎么给剪秃了，脑壳怎么给打开了。好好看看嘞。大勇货郎般吆喝。

有人往尸体的脸前凑一会儿，说：我的亲妈，老厨子的牙全给打掉了。

就是啊，大勇说，老人家往后吃饭都不香了。

这时人群外的几个人在慢慢散圈子，大勇问：你们去哪里？

¹²⁹ 吴前进著，《美国华侨、华人文化变迁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1998年10月第1版，第71到72页。

¹³⁰ 雅非，《在海外写作：作家严歌苓访谈录》

¹³¹ 解孝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旅外作家与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2页。

上工。要迟了。

大勇笑咪咪看着他们，看了好一会儿。

那些人被他看得没地方搁脸地东张西望。

大勇说：这两个妞儿我请客啦。人人有份，镇上见。

大勇把尸首卸下车，又将两个窑姐一一抱上车，在众人的大眼小眼中往坡下的小镇走去。

从那天起，工地上不再见中国苦力。

却没人知道这次罢工的真正操纵者是在镇上吃喝嫖赌的大勇。

五千中国苦力全面停工了。¹³²

这是中国苦力第一次罢工，大勇是整个罢工事件的背后操控者。大勇只是把老厨子的尸首带到了众苦力面前，让大家看看老苦力死得怎样惨，并且说要请大家泡妞，只这么两句话，就让五千中国苦力全面停工，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可能是之前没有洋人把中国苦力打死，也可能是就算打死了，也没有人注意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信念让他们对一切麻木不仁，而大勇的仗义震惊了中国苦力的灵魂，从没有人肯如此为别人出头露面，打抱不平。对于中国苦力来说，他们唯一的乐子就是逛窑子，大勇肯请大家逛窑子，这一慷慨感动了大家。正式罢工开始后，雇主们开始跟中国苦力谈判，他们发现了站了个好地势的大勇，要求大勇把他的那个位置让给他们，大勇跟他们讲价钱，说一个人要付两块钱，两个人四块。大勇的这一举动让雇主代表很吃惊，但他们还是付了钱，并且要求大勇给他们翻译。

那是另一桩交易？你们付多少？

他们说：狗婊子养的白鬼新通过一个法案，要把中国人从这个国家排除出去；他们还说，长着臭胳膊窝的、猴毛没蜕尽的、婊子养的大鼻子白鬼……

你不用翻译这么仔细。

一块钱值这么多，我不能让你亏本。他们说，新法案把中国人作为唯一被排斥的异民，这是地道的种族压迫。他们还说，铁路老板们把铁路成功归到德国人的严谨，英国人的持恒，爱尔兰人的乐天精神，从来不提一个字的苦力，从来就把中国人当驴。

代表们深深地点头：你接下去讲啊。

他们说：一天没有公平，就罢一天的工……

怎么停了？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一块钱就值这么多。

¹³²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66到67页。

代表们朝这个衣饰璀璨的中国汉字瞠目。却见他面孔憨厚得连狗都逊色。¹³³

大勇显然在耍这两个代表，前面部分的内容，是借着翻译这一手段，变相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耻笑侮辱他们，可笑的是这两个代表却丝毫没有生气，只是让大勇不用翻译得这么仔细，他们难道听不出来这是在当面辱骂他们吗？后面部分的内容，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竟跟代表谈起了美国铁路的发展中国苦力功不可没，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提一个字，不肯给中国苦力一句公道话。一些忍气吞声苟活着的苦力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雄辩呢？如此具有平等意识呢？小说曾描写过大勇一帮人在船上和洋人大打出手的场面。这场架因扶桑吹箫而起，洋人不愿意听，愤怒地让扶桑停下，这时大勇说“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弄中国音乐？”¹³⁴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大勇身上有着强烈的现代意识。“中国”是现代国家概念生成之后，才出现的名词。大勇生活的那个时代现代国家及民族意识很难会有那么强烈，会因为洋人不让弄自己的中国音乐而同他们大打出手。所以说大勇是作者严歌苓在亲身体验到东西方文化冲突之后有意识创作出来的产物，以此来反抗西方，抚慰自己因为认同产生的内心上的不平衡。

文化的混种、混杂本是后殖民理论中衍生出来的用语，但同样适用于流散者身上。流散者同时受自己母国文化影响，同时又受所居国文化影响，他们身上文化的混种性很强，很自然也会产生文化身份认同焦虑。后殖民批评家霍米·巴巴由此提出了“第三度空间”。“这个第三度空间的生产能力具有一种殖民或后殖民源头，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心甘情愿地走进我所指出的那片八荒之地，那就可能表明从理论上承认了发布行为的分裂空间，进而构建国际文化概念。当然国际文化的基础并不是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崇洋求异思想，而是对文化的杂交性的刻写和表达。为此我们应该记住，正是一个‘际’字表达出谈判和转译的切割线，表达出一种‘居中的空间’，承载了文化意义的重负。这样就才可能开始设想民族的、反民族主义的‘人民’历史。通过探索这个第三度空间，我们有可能排除那种两极对立政治，有可能作为我们自己的他者而出现。”¹³⁵

巴巴提出这个“第三度空间”理论同他自身的经历有很大关系，“霍米·巴巴自己的文化身份十分尴尬，他既非印度人，却成长在深受西方影响的印度；他通过努力得以跻身中产阶级之列，但却是个被一般印度人看不起的波斯人。这种杂糅的文化、阶级和经济的身份使他很难将自己整合为一个单纯而统一的个体，使他时时处于自身身份的怀疑之中，这无疑构成了霍米·巴巴对文化殖民、文化霸权质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¹³³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69到70页。

¹³⁴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133页。

¹³⁵ 霍米·巴巴，《献身理论》，马海良译，《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朱立元，李钧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7（2003重印），第555页。

化的前提。”¹³⁶他是从自身出发，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他却受到了批判，杨乃桥说“在当下后现代和后殖民的讨论空间中，有一类学者是缺少学术道德感的”。他们是定居在第一世界宗主国的第三世界学者，并持有宗主国护照在宗主国高校享有教职，他们每天都浸润在第一世界宗主国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后现代抚摸中，享受西方后工业文明对他们生活带来的快适，但在学术上又拒斥西方的文化传统与后工业文明对他们原住国落后的启蒙；他们自己在宗主国高校获取博士学位，在知识结构上完全跌落于西方化的教育中，操着一口地道的宗主国语言写作或言说，但是，他们还要居高临下地教诲自己的同胞或本土博士不要被西化—殖民化或后殖民化，时时告诫自己贫穷的祖国要恒持本土的旧日风情，不要在与西方文化与文明的接轨中“文而化之”。杨乃桥继续骂道，赛义德、斯皮瓦克及巴巴等后殖民批评者的文化身份非常含糊不清。其实，他们在骨子里既不属于第一世界，又不属于第三世界，他们绝对不愿返归第三世界那方贫穷的故土定居，如果回去做短期讲学，他们在知识结构及学术身份上所倚仗的是西方，他们是受聘于宗主国的西方教授，在本土大学开设学术讲座时颇显一种傲慢之得意，把自己佯装为第一世界的代言人。“支撑他们傲慢的可能不是他们自身的学术功底，而是他们在西方宗主国的文化霸权、经济实力下获取的一点优越感”。

137

杨乃乔的观点难免有些偏激，正如他所说后殖民批评者的文化身份是含糊不清的，但正基于此他们才有了切身的感受，从自己的实感经验出发来面对这一切。因为当世界发展到今天，流散可能是每一个都会有的经历，他们的问题也可能是每一个都会面对的问题。只是那些后殖民批评者们的文化身份问题属于典型事例而已。既然流散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就有责任去关注并且提出解决这一现象带来的种种问题的方法。正如杨乃乔所说“他们在骨子里既不属于第一世界，又不属于第三世界”，面对这一尴尬，巴巴提出了“第三度空间”，企图寻找一个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而“巴巴本人在近期也对他自己提出的像‘第三度空间’和‘介乎两者间’这些词的有效性表示了怀疑。在《后殖民与后现代》一文中他反思道：‘整个事情不就是把任何形式的政治批评降为一场白日梦的理论幻想吗？’”¹³⁸他起初提出来的建立在解决自身问题上的“第三度空间”等理论并不能最终解决自身面对的问题。

通过阅读严歌苓的作品，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流散者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即并

¹³⁶ 《巴巴》，何佩群，《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朱立元，李钧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7（2003重印），第541页。

¹³⁷ 转引自《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东方社会》，张其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6，第242-243页。文中引用文参见杨乃乔：《译者序：从殖民主义到后殖民批评的学缘谱系追溯》，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6页，第39页。

¹³⁸ 《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东方社会》，张其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6，第256页。

不是所有的流散者都有认同困惑。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¹³⁹身份不过是一个外在的标志而已，真正决定自己存在状态的还是内在心灵的选择决定的。

同是犹太人的杰克布身上就很少出现认同危机心理，到哪里都能够吃得开，“杰克布到了上海，很快就用上海方式玩耍”¹⁴⁰，他喝黄酒，并且用上海话叫“煮花生和茴香豆”当下酒菜，“他的上海话土头土脑，浦东味十足，并且懂得了土头土脑的小菜”¹⁴¹，叙述者玫也觉得很奇怪，“这个除了席梦思没睡过其他床的杰克布，居然能在这里读书、工作、安寝”¹⁴²。另一个犹太人罗恩伯格主动请求玫带他去个好吃而便宜的中国餐馆，“我们吃的是上海最便宜的馆子，罗恩伯格也不讲究了，鸡也好，鸭也好，不按犹太教规宰法，他都只管吃。”¹⁴³一个人如果心里认为自己是不属于一个地方的，认为自己孤独的，那么到哪里都不会幸福，都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相反，如果心里根本不把这一切当回事，就会入乡随俗。杰克布和罗恩伯格开始像中国人一样生活在上海，他们身上几乎看不到关于认同的困惑，尽管小说中也提到关于杰克布的流散心态。“杰克布记下‘May’这个穿淡紫长裙的伴娘，不属于唐人街的一群女子，更不属于婚礼上寥寥可数的白种人。一个没着没落的年轻女子，一个和他一样的寄居者……”¹⁴⁴可是，这是叙述者翻杰克布用德文写的日记时，她自己的猜测。叙述者看不懂德文，只能说是以自己的心态去定位杰克布的心态。

《第九个寡妇》里的朴同志是个作家，也不是中国人，但实际上除了王葡萄谁都以为他是中国人。四清时，插队到史屯住在王葡萄家。朴同志告诉王葡萄“他是个孤儿，也不是中国人。他的父母从外国到中国来抗日时把他养在中国老乡家的。后来他父母都打仗打死了。”¹⁴⁵他写了一本书，“他母亲把他丢在老乡家是偷偷丢的，喂了他最后一次奶，留了几块光洋，趁他睡着了把他留在最富足的一个老乡的大门廊里。母亲想，这个老乡该有足够的米汤来喂大她的儿子。那个富有的老乡真是有足够的粮，把他喂到十四岁。母亲和父亲的部队找回他，把他带走了。他听说那个养他的老乡被分了地；分了牲口，成了那个村最穷的一户老乡。然后他长成一个小伙子，穿上军装，

¹³⁹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第208页。

¹⁴⁰ 严歌苓著，《寄居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8，第192页。

¹⁴¹ 严歌苓著，《寄居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8，第230页。

¹⁴² 严歌苓著，《寄居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8，第233页。

¹⁴³ 严歌苓著，《寄居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8，第227页。

¹⁴⁴ 严歌苓著，《寄居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8，第182页。

¹⁴⁵ 严歌苓著，《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207到208页。

去分富老乡的地给穷老乡。”¹⁴⁶表面上看朴同志书的内容是那个时代关于土改题材的小说，然而“他的书真正的故事，只有葡萄看懂了。他抱住了葡萄，恨不得藏到她身体里去。”¹⁴⁷王葡萄是拿心去读朴同志的书的，书成了他们心灵沟通的工具。王葡萄没有因为知道朴同志是外国人，就觉得不可靠，相反，不识多少字的她却从朴同志的书里看出了朴同志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王葡萄便将自已藏着土改时被当成地主枪毙却没死的公爹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了朴同志。

小说中并没有写到朴同志认同方面的困惑，而是他对生命的感悟。文化大革命时，朴同志被红卫兵们斗，“红卫兵们变着词儿喊口号，喊朴同志‘臭文人’、‘黑笔杆’、‘反党大流氓’、‘地主干儿子’。开始他们喊一句，他就在板凳上矮一点儿，后来见葡萄抬头看天，他跟着抬头，见一个人字形雁阵从北边飞过来。葡萄眼睛看雁也专心地发直，嘴唇半开，完全忘了正给锁在一个人体筑的小炮楼子里。他慢慢也把几层人脸人头拳头胳膊给忘了，一下一下地扯着风箱。火烧得好着呢，他眼前脑子里只剩下稳稳烧着的金黄的火。过一会儿，他一张嘴，一个哈欠出来了。他抬起头，见一个喊口号的红卫兵也跟着打了个哈欠。又是一会儿，好几个红卫兵都打起哈欠来，只不过打得很贼，把鼻孔撑大，叫哈欠出来，不耽误嘴里喊口号。”¹⁴⁸按说，朴同志是一个有着外国人身份的人，在那个时代，这种身份是非常危险的，一旦他的真实身份曝光，搞不好会有一个间谍身份，这对本已经是批斗对象的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可是，朴同志没有这么想，反而受王葡萄感染，慢慢地忘了自己的处境，进入了无我的状态，周边的人和事跟他没关系似的。

阿尔都塞认为“我们是依赖于教育我们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的社会身份，来成为一个主体，我们对自我的看法不是由我们自己产生的，而是由文化富裕的。因而我们是文化的‘主体’，但却不是它的创造者。在英文中，subject 一词本身就含有‘主体’和‘屈从体’两种意思，这里的‘主体’显然也应当从这两方面来理解，即所谓主体并不是独立自持的，而是由文化建构的。”¹⁴⁹这一点在老朴身上非常明显。有一次老朴去集上想买点年货，看见了一个大汉卖锅那么大的鳖，老朴就决定买下来。

两人低下头来搬鳖时，老朴失声叫出来。鳖正伸出它苍老的头。那是个黑里带绿的头，头上有一些绒毛般的苔藓，头颅又大又圆，一条条深深的抬头纹下面，一双阴冷悲凉的眼睛。老朴叫，就因为被这双眼瞄上了。谁被这双眼瞄上也怕。

¹⁴⁶ 严歌苓著，《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215页。

¹⁴⁷ 严歌苓著，《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215页。

¹⁴⁸ 严歌苓著，《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219页。

¹⁴⁹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第12页。

老朴说什么也不买那只鳖了。

汉子在街上追老朴，嘴里直喊“六块，六块！”鳖看着这两个追来追去的雄性人类成员，觉着没什么看头，又把它那颗古老的头脸缩了回去。

汉子说：“你要我给你跪下不？”

老朴站下来。老朴这时想到了葡萄的公爹。他也不知道什么让他莫名地悲哀成那样。他去给穷农户分富农户的田地、浮财时，末了还是让他看见这样的穷农户。穷农户还是让他满心酸涨。他自己的浮财也叫人分了，满世界还是这种让他惨不忍睹的穷农户。¹⁵⁰

老朴的想法根本就是一个中国式的知识分子的思考。他当年年轻气盛，满怀着理想，跟一个普通的有理想的中国青年一样，以为把地主、恶霸的田地、浮财分了，老百姓就能够过上好日子了，可是几十年过去了，还是有让他惨不忍睹的穷农户。而富农如孙怀清之类的人，他们并没有干伤天害理的事，他们的财产是他们勤劳治家，辛辛苦苦挣出来的，结果被人分了自己勤劳攒下的家产，有的还付出了性命，幸运如孙怀清者只能过着不见天日的日子。

朴同志到了晚年的想法更是对人生的觉悟。“活得透彻的老朴这时已搞清了许多事：娶妻子那种女人是为别人娶的，和妻子的郎才女貌的幸福生活也是给别人看的。光把日子过给人看的男人又傻又苦，和葡萄这样的女人闷头乐自己的，才是真的幸福生活。可人只要一点儿得势得意，马上就要把日子过给别人看。”¹⁵¹朴同志身上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他关于认同方面的困惑，有的只是他作为一个人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朴同志是一个有着外国人身份的流散者，但实际上朴同志不过是有着一个外国出生的身份而已，他骨子里都是中国人，从他身上看不到任何流散者身上有的身份认同或文化认同的困惑，他是从生命的角度思考人生。可见认同同一个人的心态连在一起。虽然多鹤也出生在中国，但她有着十六年的代浪村日本人生活的记忆，这一记忆让她在中国活着，却从不曾想做一个中国人，代浪村成了链接多鹤和日本的精神纽带。十六岁不过刚进入青春期，如果多鹤想融入自己在中国的家，想融入中国人的生活，那不是没有可能的。尽管起初张俭一家怕多鹤逃跑，不肯让她学说中国话，但是后来情形所迫，只要多鹤愿意，她完全可以把中国话学好，但是她宁肯跟自己的孩子讲日语，以维系自己跟故国之间的源自想象的情感关系，这背后还有一种文化优越感潜藏在里面。

多鹤回到了日本，可日本对多鹤来说，一直以来不过是她想象的祖国，这个祖国真实的面貌同多鹤记忆中的代浪村完全不同，多鹤到了日本也不过是半个残废，如果

¹⁵⁰ 严歌苓著，《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225页。

¹⁵¹ 严歌苓著，《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226页。

没有久美的帮助，多鹤很难适应日本的生活。回到日本后的多鹤反倒时刻思念生活在中国的小环，连做梦都又回到了那个他们的家，尽管她没有明说，小环实际上就是自己的亲人，比有血缘关系的自己的儿女还亲。小环多年来真心实意照顾多鹤，多鹤从来没有对小环说过谢谢之类的话，反而由于张俭的关系和自己在这个家里暧昧的关系心里面多少怨恨着小环。人真是奇怪，得到的东西不知道珍惜，当不再拥有了的时候，反而怀念。如果多鹤能够放下一切，打开自己的心扉，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或许就会完全不同。并不是多鹤的异国身份让她的精神层面处于无所归属的状态，而是多鹤内心里对自己故国的想象才让她处于那种郁闷的生存状态，不仅如此，孩子们也深受影响。她的一生是可悲的，这悲剧不仅跟客观的大的时代环境有关，同多鹤自身的主观选择也有很大的关系。不仅多鹤的一生是个悲剧，就是她最疼爱的女儿张春美的人生也是可悲的。多鹤倔强地保留着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这可以理解，但是她固执地跟自己的孩子们讲日语。如果她不那么想把自己的孩子都变成代浪村的，或许这些孩子的悲剧就不会发生。春美如果不是因为她梦中讲日语，她的未来或许会完全两样。多鹤心理有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在支撑着她，使得即使她生活在中国这个主流社会，她却不想也不屑于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可回到日本也得不到自己国民的认同，使得多鹤只可能变成一个精神上无所归属的流散者。

多鹤是日本人，朴同志是高丽人。日本人，高丽人从生理上来说，跟中国人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尽管《小姨多鹤》中一直提到多鹤相貌同中国人的差别，但哪怕差别再大，也都是黄皮肤黑眼睛，只要自己愿意，是可以像一个中国人那样生活在中国的，如同老朴那样。这是一个人的心理决定的问题。《金陵十三钗》中的法比是一个有着西人面孔的中国人，他走到哪里，只要一看，别人就知道他是一个西方人。然而法比在内心深处认同中国文化，宁愿选择做一个有着西人面孔的中国人。“法比之所以是扬州法比，因为他常常在暗地做彻头彻尾的中国农夫。跟了英格曼神甫二十多年，还是喝不惯西洋人的红酒、白酒、白兰地、威士忌，夜晚时分，关上房门，他总是回归到村子里的生活中去：呷两口烫热的大曲、佐酒下菜也是中国市井小民的口味：几块兰花豆腐干、半个咸鸭蛋，或一对板鸭翅膀”¹⁵²只要自己看开了，别人的看法根本无关紧要。人总是在意别人的看法，把自己搞得很累。法比倒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人活着，自己开心就行。

可见，国籍种族问题可能让一个人陷入认同危机里，产生认同焦虑，但重要的还是一个人的心态问题。之所以会有认同困惑，是因为站在二元对立立场看问题才如此。霍米·巴巴在《献身理论》中开篇部分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难道我们只有分成两极才

¹⁵² 严歌苓著，《金陵十三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9，第141页。

能展开论战吗？我们陷进了一种斗争政治，难道只有采取理论和政治的二元形式才能再现社会对抗和历史矛盾？知识自由的目标难道仅仅是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中心和边缘、否定形象和肯定形象简单颠倒过来吗？走出这种二元论的惟一途径是支持一种不可消弭的对立性，还是发明一种原创性的至纯至净的反神话（countermyth）。¹⁵³

我们要注意巴巴提出这些疑问时所用的字眼“两极”、“理论和政治的二元形式”、“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中心和边缘、否定形象和肯定形象”等等，巴巴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二元对立论，他想走出建立在这一二元对立论基础上的怪圈，但是却又不自觉地陷入了二元对立论。他提出的“第三度空间”企图从两极对立中走出，但是却又制造了一个“自己的他者”这样的二元对立关系，使得一切变得更为复杂。认同问题是二元对立思维下的产物，因为存在着“自我”和“他者”，所以才会想得到对方的承认。而实际上，只要自己在内心给自己定位了，别人认不认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处境。

¹⁵³ 霍米·巴巴，《献身理论》，马海良译，《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朱立元，李钧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7（2003重印），第541页。

第二节 混种、自我与认同

流散者身上的文化混种性让我想到了也斯《后殖民事物与爱情》这部小说里收录的一篇名叫《艾布尔的夜宴》，讲到西班牙的艾布尔餐厅体验分子美食。

第一道菜就先声夺人。几位年轻的厨师推出一辆小车，告诉我们这头盆是「琴酒汤力-黄瓜」(gin-tonic-cucumber)，只见黑衣人好像做实验一样，把盆子里的材料揉弄，把盛器摇晃，然后「蓬」的一下，冒出一团白色的烟雾，烟雾萦绕，钢碗里一堆白色的东西，缀着黄花，递到我们的面前来。

随着飘渺的烟雾，白衣白裙的史和觅出现在我们桌前，终于来了，加入我们的盛宴。云里雾里还有第二道橄榄，看来是亮溜溜的青橄榄，却不是人间的橄榄，是天上的橄榄，放进口里香滑有橄榄的香味，却没有橄榄的纤维和硬核，一下子在你口里溶化了。

芒果叶、金盏花：长长的金叶上的小红花；芙蓉和桉树纸：紫色透明的蝴蝶在你的碟上振翅欲飞！不，不是蝴蝶，一尾尾大头的金鱼，身体却是蝉的翅膀那么单薄，正栖止在一张碟子上展翅欲飞。C 伸出手，伊莎贝伸出手，每个人都伸出手去，想要捕捉自己心中所见那飞行的形状。

「野兽」来了？是几款酥脆的饼样的点心！

「橘子精华」tangerine essence，真是从橘子里提炼出的精华？

一道一道的上来，每一道有每一道的新奇。吃了十多道头盘，慢慢忖摸出一些道理来。厨师在弄魔术：他们把物的形状改变了，琴酒汤力应该是饮料，却变成固体；ceoquette 应该是炸得香脆的，却以液体形态出现；味道和常见的制作方法改变了：鳀鱼是地中海的咸咸的鱼，却说是鳀鱼油鱼子酱 anchovy oil caviar，又好像带着植物的味道；brioche 是法式的，却用泰国的做法。橄榄和橘子改变了形貌，却又寻回它们的味道：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是山。但我想更贴切的说法或许是：厨师在实验室里，把它们抽取出来，再加以重新组织。厨师是祭师？还是上帝？也许他不完全是上帝，但却是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他观察万物，抽取各自的特色，再把它们搓揉，重新编织，试验不同的口感、嗅觉、味道、颜色、像画家画一幅画，小说家写一篇小说。¹⁵⁴

分子美食英语 (Molecular gastronomy) 又称为分子料理，人造美食，所谓分子美食是指把葡萄糖，维生素 c, 柠檬酸钠，麦芽糖醇等可以食用的化学物质进行组合，改变食材的分子结构，重新组合，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可以食用的食物，比如，把固体的

¹⁵⁴ 也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China)Ltd, 2009年，第201到202页。

食材变成液体甚至气体食用，抑或使一种食材的味道和外表酷似另一种食材。从分子的角度制造出无限多的食物，不再受地理、气候、产量等因素的局限。如：泡沫状的马铃薯，用蔬菜制作的鱼子酱等，用液氮把固态新鲜水果制作成微小冰晶颗粒的分子冰淇淋。这一概念最早于 1988 年由匈牙利物理学家 Nicholas Kurti 及法籍化学家 Herve This 提出。¹⁵⁵ 分子美食改变了人类对食物认知的常识，面对这种饮食，也斯在小说中说到“我逐渐摸出窍门来了，当它宣称是汤你不要期望是液体，当它说饭你不要以为一定是米造的。物料像从肖像画的具体形象变成了抽象画的笔触，它要传神，你要意会。”¹⁵⁶

食物改变了其分子排列，让它以不同的状态出现，被认为是为饮食开创了新的领域。“艾布尔真的不欺场：鹤鹑、羊脑、螃蟹都由它幻变出来了，只是未必以原来的形状出现罢了！大音无声。大象无形。当然艾布尔不是道家炼丹的丹炉，它是借重科学的精确，调弄色香味各种份子，为我们开发感官的新领域，重绘饮食的地图。”¹⁵⁷ 饮食改变其分子排列可以以另外的存在方式或者状态存在，被认为是在开发一种新的领域。而人呢？同时体验两种文化的流散者，他们会因为自己实际的生活经历而不知不觉地改变自己的思维，同自己母国所属群体不同，同样又跟所居国的主流社会成员不同。“香蕉人”就是典型的说明。思维意识变了，说明是一种新型人类出现了。可为什么这种新型人类被自己母国和所居国看成是异己，出现了认同上的焦虑，而同是改变了分子排列的新型饮食的分子美食却受到好评呢？

流散者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选择离开自己的故国生活在异国，然而异国的生活又充满了种种的不如意。即便物质生活极其丰富，进入中产阶级，但是其精神上却是孤寂的，甚至要面对因认同引起的众多问题。查尔斯·泰勒在《自我之源》中写道：“认同问题经常同时被人们用这样的句子表达：我是谁？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一定不能只是给出名字和家系。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东西的理解。知道我是谁就是了解我立于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承诺（Commitment）和自我确认（identification）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景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或反对的。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视界，在其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¹⁵⁸

¹⁵⁵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BR7z_7qGFYAd_ynKijygaXbbTMOj4nW3v70Le1i1vCYP4lCrHDo5OG_zxWaR48Tyqo7gQq3lIalHjtGal-hVq，分子饮食，2016年2月19号检索

¹⁵⁶ 也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China)Ltd，2009年，第204页。

¹⁵⁷ 也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China)Ltd，2009年，第206页。

¹⁵⁸ 汪晖，《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实际上流散者的经验把人拉回了原点，就是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上来了。“我是谁？”、“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等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探讨的问题，现在变成了一个人活着必须面对且要思考的问题。

严歌苓曾坦言“写作就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¹⁵⁹，高行健则在《灵山》中，将其作为一个讨论的主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观察过自我这古怪的东西，往往越看越不像，越看越不是”，“你只要凝神注视自己，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自我逐渐脱离你熟识的样子，繁衍滋生出许多令你都诧异的面貌。所以，我要概要表述一下我自己，我只能惶恐不已。我不知道那众多的面貌哪一个更代表我自己，而且越是审视，变化就越加显著，最后就只剩下诧异。”¹⁶⁰当人审视自己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在不同的场合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自我，而它们又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严歌苓曾说“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所有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其本质的窥口。所有人物的行为都只是一条了解此人物的秘径，而条条秘径都该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秘密。谁都弄不清自己的人格中容纳了多少未知的素质--秘密的素质，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苏醒，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正因为人在非常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¹⁶¹

严歌苓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来探讨人性自我。“我通常一不留神就撒谎，多半是没恶意的，往往是为别人和自己行个方便。因为一旦说开真话难免触到自己或别人的痛处，难免让自己把别人看得太透，难免费许多力气、口舌才能最终说到究竟上，最终说出个是非来。像我这样没时间、没精力因而对事情的究竟早已不计较，对绝对的是与非就失去信心因而在大小是非上都变得马虎的人，说谎早已不存在任何动机：说谎在于我是自然而质朴的，那就是对于省事、省力、省时的贪图。”¹⁶²可见严歌苓对体现出来的这种自我是呈肯定态度的。人世间的是与非、善与恶都是相对而言的，尽管说谎并不是一种好的品质，但它也并非就是不好的。“没有一分真实是绝对的，有时谎言是善良而美好的，正如真实有时相当凶残。在我发现母亲跟关押父亲的军代表之间有了层暧昧关系时我疯狂地渴望了解真实。而在这位军代表对父亲开恩，父亲突然获释的那天，我开始懂得谎言的美好。”¹⁶³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自我“它长着长着，往往并不按照你的愿望去变，而且多半相反，成为个怪胎，让你无法接受，而它毕竟又还从那个自我脱胎出来，还不能不接受。”¹⁶⁴

¹⁵⁹ 《严歌苓：“寄居”在文学深处》，2009年04月09日，中国新闻网

¹⁶⁰ 高行健著，《灵山》，--台北市：联经，2001年11月初版第十六刷，第150页、151页。

¹⁶¹ 严歌苓著，《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第117页。

¹⁶² 严歌苓著，《无出路咖啡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第235页。

¹⁶³ 严歌苓著，《无出路咖啡馆》，--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1，第235页。

¹⁶⁴ 高行健著，《灵山》，--台北市：联经，2001年11月初版第十六刷，第151页。

对于自我的探讨，高行健有更深入的意识。“在我观察别人的时候，我发现那无所不在的讨厌的自我也渗透进去，不容有一副面貌不受到干涉，这实在是非常糟糕的事，当我注视别人的时候，也还在注视我自己。我找寻喜欢的相貌，或是我能接受的表情，那打动不了我，我找不到认同的众人从我面前过去，我就视而不见，不管在何处，在候车室火车车厢里或轮船的甲板上，饭铺和公园里，乃至我在街上散步，也总是捕捉近似于我熟悉的面貌和身影，或是去找寻某种暗示，能勾引起潜在的记忆。我观察别人的时候，也总把他人作为我内视自己的镜子，这种观察都取决于我当时的心境。哪怕看一个姑娘，也是用我的感官来揣摩，用我的经验加以想象，然后才做出判断，我对于他人的了解其实又肤浅又武断，也包括对于女人。我眼中的女人无非是我自己制造的幻象，再用以迷惑我自己，这就是我的悲哀。因此，我同女人的关系最终总失败。反之，这个我如果是女人，同男人相处，也同样烦恼。”¹⁶⁵

这里高行健是用第一人称单数来表述的，但实际上，这个第一人称是一个复数化了的第一人称，是包括男女在内的对人类的统称。从高行健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人总是站在自我的立场上去评判一切，“用我的感官来揣摩，用我的经验加以想象，然后才作出判断”，这种“经验”包括自己的直接经验，也包括道听途说的间接经验。而这种判断又取决于个体自我主观意志，如果符合自己的主观意志就觉得对方不错，有亲切感，反之，则不同。而这一切却“是我自己制造的幻象，再用以迷惑我自己”。在高行健看来“问题就出在内心里这个自我的醒觉，这个折磨得我不安宁的怪物。人自恋，自残，矜持，傲慢，得意和忧愁，嫉妒和憎恨都来源于他，自我其实是人类不幸的根源。”¹⁶⁶高行健认为因为有了“自我”这一意识的存在才产生了众多矛盾。

严歌苓曾说“我对我丈夫的所有陌生行为和语言，以及形象上的差异，怀有浓厚的兴趣，有了解他的强烈欲望。与他的接近，我从来未能摆脱轻微的心悸。这心悸很不具体，它有时是由于我们沟通的稍许错位，有时是由于彼此的所得非所期。这轻微的心悸使我们敏感，尤其使我的自觉意识始终处于相当的高度。这或许不是一个幸福婚姻的要素。”¹⁶⁷自我意识强烈的话，自然会处于一种相当敏感的状态，自我同外界的对立也更加强烈。高行健认为“自我是人类不幸的根源”是有一定道理的。

高行健讲的这一切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个他者，自我是相对于他者而存在的，如果没有他者的存在，人就不会有各种建立在他者基础上的诸如矜持、傲慢、嫉妒和憎恨，甚至包括认同的问题。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自我，而在于把自我和他者对立起来的二元思维意识。主流与边缘，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西方与东方等等无不建

¹⁶⁵ 高行健著，《灵山》，--台北市：联经，2001年11月初版第十六刷，第152页。

¹⁶⁶ 高行健著，《灵山》，--台北市：联经，2001年11月初版第十六刷，第152页。

¹⁶⁷ 严歌苓著，《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第111页。

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这思维的载体正是自我这一存在，即问题出在自我的二元对立思维意识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高行健对从佛法中得到了启示，“这种不幸的解决又是否得扼杀这个醒觉了的他？于是，佛告诉菩提：万相皆虚妄，无相也虚妄。”¹⁶⁸高行健也许意在告诉我们人活着不要执着。但这其实是一个消极处世的办法，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¹⁶⁹老子短短几句话就明确指出了这个时空宇宙诞生的过程。时空宇宙的根本组成元素是阴阳，它从“一”中产生，这“一”是阴阳合一的混沌状态，“一生二”，就意味着阴阳分离，成了主客对立的状态。阴阳相生相克，万物万象得以形成，即“三生万物”。阴阳二元对立形成了时空宇宙，世间一切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二元对立思维。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母国文化和所居国文化等等这些都是一种二元对立关系，流散者面对的诸如文化身份认同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主客对立的二元对立思维。实际上并非流散者如此，人同万物之间的矛盾，就源于二元对立思维，只是由于流散的原因，才导致各种矛盾更加白热化而已。

生命本是宇宙性的存在，庄子在《齐物论》中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说的就是这种状态。只是由于二元对立思维的问题，总是从分离的观点甚至对立的观点看问题，认为生命和宇宙处于分离状态，继而不断地分离下去，结果人同一切都处于一种分离对立的关系。所以说，不是外部的的问题，而是人自身思维的问题。改变二元对立思维，站在生命的立场上，从合一的观点看问题，人同万物是同一的，同宇宙是同一的，那么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人执着的这个自我，其实是一个假我，并非是生命本身。知道了问题的根源所在，再回过头来看认同问题，会发现认同危机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困惑。只要改变自己的思维，认同危机就会自然消失。

¹⁶⁸ 高行健著，《灵山》，--台北市：联经，2001年11月初版第十六刷，第152页。

¹⁶⁹ 《老子》，（汉）河上公注、严遵指归、（三国）王弼注；刘思禾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2，第96页。

第四章 严歌苓流散作品中人物的思维意识

一个作家的作品要做到受到大众的欢迎，或许并不是很难，可要同时既受读者的喜爱，又被研究界重视，那么这个作家就可以说是相当优秀的了。严歌苓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原因很多，如严歌苓丰富的人生经历，善于讲故事及技巧的运用等方面。严歌苓曾这样评价她的文学，“我称自己为‘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之一员……所谓‘游牧’无非是指我们从地理到心理的社会位置：既游离于母语主流，又处于别族文化的边缘。游牧部落自古以来是从不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因此也从不被异种文化彻底同化。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和演变，以求得最适当的生存形式。这里生存形式决定我们在文学中的表达风格，决定我们的语言——带有异国风情的中国语言。”¹⁷⁰流散给严歌苓带来了有心灵上的创伤，但同时给了她的文学注入了活力。

陈瑞林在《冷静的忧伤》中谈到西方文化对严歌苓的影响，“1990年，严歌苓走进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文学写作硕士学位。在那里，与其说严歌苓在接受严谨的英文写作训练，不如说她开始诚恳地吸收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对‘人’的价值观透视，同时也包括西方社会看待‘东方人类’的历史文化视点。这是这些精神上的源流主导了严歌苓海外创作的小说总是充满了对‘人性’本色的深层关注。”¹⁷¹陈瑞林的这段评论也许并不失公正，但含有强烈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严歌苓作品对人性的关注是众多研究者的共识，“严歌苓的‘局外人’的文化身份，使她在叙述关于中国的故事时，总是能够挖掘出其他华文作家不曾关注到的审美内涵；西方文化中的‘人学’思想与自身‘血缘’红某些文化印记的相互交融，使她在书写母国的历史时，善于发现人性中感动人心的真善美元素。因此，在她的‘中国记忆’小说中，无论是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书写，还是对一个个女性生命的塑造，都体现了她回归生命本真和追寻真善美的理想情怀。这正是她的‘中国记忆’小说所独具的意蕴，也是她跨文化选择的意义所在。”¹⁷²

西方文化为严歌苓的创作注入了活力，但除此之外，我认为对严歌苓流散之后的创作起重要作用的还有她对生命的另类体验。这让严歌苓无意识中对生命有了深刻的认识，使得她作品中的人物是那样的不同寻常，让人喜爱同时又让人费解。饶芈子曾说“文学创作需要经历和经验的积累、强烈情感的激发，但更需要不断地去挖掘及开拓，将个人的情感升华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对自我的故事筑成‘寓言’，如果能摆脱

¹⁷⁰ 严歌苓著，《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第80页。

¹⁷¹ 陈瑞林，《冷静的忧伤》，《华文文学》，2003.5（总第58期），第36页。

¹⁷² 周春云、李侠云，《回望母国的独特意蕴》，《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5期，2011年9月，第135页。

自我感情、经历等因素的纠缠，处理得寓言一些、哲学一些，无疑是史诗般的‘新奥德赛’；如何通过精神意义上的‘漂泊’和个人的自觉，把对文学的探索作为人类精神探索的一部分，将是海外华文文学女作家在创作中必须面对并解答的一道‘难题’。”¹⁷³相对于严歌苓流散之后早期的移民题材作品而言，严歌苓流散之后创作出来的“回望故国”系列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显然已经超越了严歌苓个人情感，升华为对生命存在的理解。本章试图从严歌苓对生命的另类体验入手，解读严歌苓作品中的人物的思维意识。

严歌苓是一个对生命存在的本质有着深刻体验的人，这一点她在散文《打坐杂说》中说得很明白。她曾有过长期打坐的经历，她说“我最开始学打坐是因为失眠。据说半个小时入定顶上四小时睡眠对人精神的滋养，我想这倒也经济合算。我们家当时住在旧金山城对面一个岛上，二楼的三间卧室中间，有一条走廊，走廊上方，一孔天窗又大又亮，把整个房子照得白白的，跟摩门教庙宇似的。我天天就坐在天窗下打坐。”¹⁷⁴严歌苓有失眠症，尤其到了美国之后，更厉害了。她的小说也有写失眠人的故事，如《一个失眠人的艳遇》，除此以外，在她的散文集《波西米亚楼》里，也有许多文字跟失眠有关，比如《丹尼斯医生》说的就是严歌苓看失眠医生的事。她也因为失眠去看过心理医生，《人寰》这部小说就是源于此而来的，“在我花了三个月的诊费后，我偶然想到，这个‘Talk Out’疗法，难道不能成为一个小说的形式吗？当我的心理大夫从头到尾阅读那厚厚一本笔记时，大概也会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用断裂的、时而又用词不当的英文讲述的有关我个人的故事。”¹⁷⁵严歌苓从中得到了启示，创作出了《人寰》这部小说。

她说自己属于那种一打坐就进入入定状态的人。“我的感觉是有一种‘空’，灌顶而来，渐渐把精神里所有淤塞冲了出去。……‘空’是半透明的白色，自我的脑门灌入，把我变成一口井，越来越深，白色是探入深井的光亮，渐渐变成一根虚虚的光柱。肉体的存在在此时显得有点靠不住，让位给了另一种非实体的存在，或是实体与非实体之间的存在。那一道徐徐输进来的‘空’晕染开来，混入血液——为了各种欲望而一次次沸腾的红色液体，再向皮肉、脏器进一步渗入。这是一种佳境，能清晰地感到‘空’怎样涤荡漂洗着生命的实体和非实体；一股一股的‘空’灌入，污浊淤塞被冲了出去，渐渐地，浊流被稀释了，最后，浊流成了清流。‘空’仍然不停地灌入，

¹⁷³ 饶芃子：《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的理论透视》，《海外华文文学的新视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¹⁷⁴ 严歌苓著，《打坐杂谈》，《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第249页。

¹⁷⁵ 严歌苓著，《打坐杂谈》，《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第122到123页。

了不得了！它让你空的没了形状，没了分量——原来你身体里，念头是最重的东西。这时候，你飘飘荡荡，随时要腾空而起。”¹⁷⁶

前面说过时空宇宙由阴阳组成，它们是宇宙中一切的基本构成元素，人类肉眼无法看到它们。阴阳是用任何尖端的高科技设备都无法探知到的最微观的元素。时空宇宙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人类五官感知到的这个物质世界，它是由分子构成，位于时空宇宙的最底层，哪怕人类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个时空再怎么浩瀚无边，它其实不过占时空宇宙极小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人类的五官可以感知到的，因而可以称之为感觉时空宇宙。在这个感觉时空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人类五官感知不到的庞大浩瀚的宇宙，它占时空宇宙的绝大部分，称为不觉时空宇宙。不觉时空宇宙里按照存在次元的不同，又可被分为无数层次，每一层次里面都存在着无数的生命，他们都以光粒子状态存在。

严歌苓通过打坐进入入定状态时感受到了白光，也感觉肉身让位给了“非实体”存在的光。这说明严歌苓通过打坐，进入了不觉时空状态，或者说她唤醒了存在于她潜意识里的生命，此时，她的思维意识有了很大的变化，“它可以延续四个多小时。我从地上站起来，两脚踏云地走到马路上，正看见轮渡船带来的一舱一舱下班的人们。他们步履匆匆，形色仓皇，每一双眼睛后面，都是一个塞了比莎士比亚多一千多倍的信息的脑子。我似乎是个隐形的局外人，以我缓慢而深邃的呼吸和缺乏目的的步伐逆着他们走，或绕着他们走。奇怪呀，他们急什么呢？愁什么呢？激动什么呢？高兴什么呢？无非是急着回家吃晚饭看电视，无非是股票跌了或涨了，无非是情人失而复得或得而复失。一切离我都远得滑稽，一切都让我善意地偷着乐，一切在于此时的我看，都不值得在乎。我在一种无人能进入的自我里，享受无知无畏、无忧无虑、心满意足，像是昨天在月亮上才出生的一个人。这个时候，我会想，人其实只需要那么少的一点点，就能满足。而满足就是快乐。”¹⁷⁷

严歌苓这种状态下的思维是局外的、容易满足的、且洋溢着生命活力的，这同她笔下人物的处世态度不无相似之处。“局外人”视角是严歌苓写作的一个特色，有很多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她游走于中西两种文化之间，所以才有了边缘人的视角。我相信她笔下的人物就是严歌苓在这种超越了感觉时空意识状态下创作出来的，而严歌苓在《打坐杂说》的结尾部分也说“有时候我写作写得忘乎所以，突然发现自己呼吸很深，常常疼痛的背部舒缓了，偶然出局的脑筋也潜在最深处，万一此刻有人打电话来，我会喑哑失语，侥幸答上话，也是不知今昔何年，我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入定般的境界。或许通往那个境界不止一条路。”¹⁷⁸“创作大作品跟打坐入定有相似之处，那就是精

¹⁷⁶ 严歌苓著，《打坐杂谈》，《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第250页。

¹⁷⁷ 严歌苓著，《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第250页。

¹⁷⁸ 严歌苓著，《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第250页。

神的单纯、沉潜”。¹⁷⁹对于严歌苓来说，除了打坐之外，写作也同样可以把她带入到不觉时空宇宙里，或者说潜意识状态。

荣格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中提到“因为一部艺术作品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某种超越个人的东西。它是某种东西而不是某种人格，因此不能用人格的标准来衡量。的确，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特殊意义正在于：它避免了个人的局限并且超越于作者个人的考虑之外。……艺术作品中的意义和个性特征也是与生俱来的而不取决于外来的因素。人们几乎可以把它描绘成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物，它把人仅仅用作一种营养媒介，按照自身的法则雇佣人的才能，自我形成直到它自身的创造性目的得以完全实现。”¹⁸⁰荣格的这段话说得非常哲理，也很到位。但是荣格并没有把根本的东西解释清楚。他讲的我认为就是人进入不觉时空宇宙（潜意识状态）之后，他自己体内的生命开始觉醒，他（作家）开始站在更高的次元上，观察这个物质时空宇宙里发生的一切。因而好的作品是超越个人情感的，超越国家民族的。

荣格讲到“这些作品专横地把自己强加给作者：他的手被捉住了，他的笔写的是他惊奇地沉浸于其中的事情；这些作品有着自己与生俱来的形式，他想要增加的任何东西都遭到拒绝，而他自己想要拒绝的东西却再次被强加给他。在他的自觉精神面对这一现象处于惊奇和闲置状态的同时，他被洪水一般涌来的思想和意象所淹没，而这些思想和意象是他从未打算创造，也绝不可能由他自己的意志来加以实现的。尽管如此，他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他自己的自我表白，是他自己的内在天性在自我昭示，在表达那些他任何时候都不会主动说出的事情。”¹⁸¹严歌苓对自己的创作也做过类似的解释，“我觉得写作的乐趣就在于给我多大的刺激，仿佛一个探险的过程，不需要铺垫，人物自然会照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们的对话自然会出现，并相互之间有机的联系起来。这是我完全未知的，不能控制的过程。”¹⁸²

荣格和严歌苓两个人说的，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作家完全沉浸在写作中时，他们觉得有另外一种力量在支配着他们写作。前面说过，人本是宇宙性的存在，宇宙是由无数层次构成，每一次元都存在着无数的生命，生命所在的次元不同，其思维意识也有很大的不同。生活在感觉时空里的人，是非善恶伦理道德观念非常强烈，可是高次元生命并非如此。严歌苓作品中人物思维意识别具一格，原因也在此。他们是严歌苓进入潜意识状态之后，严歌苓体内的高次元生命苏醒的结果。人物自身

¹⁷⁹ 严歌苓著，《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第249页。

¹⁸⁰ 《心理学与文学》，（瑞士）荣格（Jung,C.G.）著，《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9，第76页。

¹⁸¹ 《心理学与文学》，（瑞士）荣格（Jung,C.G.）著，《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9，第76页。

¹⁸² 记者陈晓旻，《小说创作需要想象力和“共感力”——旅美女作家严歌苓访谈》，《宁波晚报》，2010年6月5号。

的这种浑然天成的存在，使得严歌苓在小说创作中缺少了对人物心理及精神更深层次的开掘，从而丧失了对生命哲学上的探讨。因此有的研究者提出“我们可以把严歌苓小说这种故事性特征看做是其‘快感式叙事’的体现。……这种快感在创作和阅读之间形成双向互动，一方面表现为作品酣畅明快的叙事和快捷而紧迫的节奏。另一方面，则是读者痛快的阅读体验，对于读者而言，阅读成了一种享乐的行为。而这种阅读享乐主义如无形之手‘操纵’着严歌苓的叙事方法和故事形态，虽然使严歌苓失去了对作品人物的命运和心理及精神作更深层次的开掘以及对历史宏观而深刻的把握，但在大众文化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一个小说家不能不考虑如何迎合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阅读心理，这也是作为文字的小说在当下所面对的现实处境。”¹⁸³

严歌苓的作品确实有该研究者讲的不足，但是严歌苓作品中人物自身具有的性格上的魅力，间接地体现了他们思维意识的次元。那么严歌苓流散之后作品中人物的思维意识到底具体体现在哪里呢？下面的几节将逐步分析。

¹⁸³ 葛娟，〈论严歌苓小说的大众化艺术倾向〉，《北方论丛》，2010年第5期，第34页。

第一节 开放的性意识

读严歌苓的小说，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人物有一种开放的性意识。严歌苓曾在《性与文学——为芝加哥华人写作协会所做的一场演讲》里谈到性与文学的关系。“二十世纪——从 20 年代到 60 年代，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学大致处于爱情饥渴和性爱泛滥的时代，文学作品中的爱情也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一跃而转为对人本的认识。此前的文学中的爱情主要是精神活动，Henry Miller 之类的作家便抽去了这一层审美价值而使之转化成肉体的生命本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革命和进步。……就我本人来说，我是认真对待写‘性’的。性关系在我的理解中时常更为广义、更为形而上。有时我甚至认为，性包含的一对对立统一体，能够解释宇宙间的所有的对称或对立、和谐或矛盾的关系。”¹⁸⁴严歌苓笔下主人公的性爱并不是丑陋的，并不单单只是满足生理欲望。《少女小渔》中的小渔第一次跟男人上床是一个病人。

小渔慢慢说：“一个病人，快死的。他喜欢了我一年多。”

“他喜欢你你就让了？”江伟像从发梢一下紧到脚趾。小渔还从他眼里读到：你就那么欠男人？那么不值什么？她手带着心事去摩挲他一身运足力的青蛙肉，“他跟渴急了似的，样子真痛苦、真可怜。”她说。她拿眼读剩下的半句话：你刚才不也是吗？像受毒刑：像我有饭却饿着你。¹⁸⁵

作为女性，小渔丝毫没有诱惑别人的意思。在小渔眼中，也许性爱意味着对男性的拯救。处于对那个病人的可怜之心，小渔才把自己的童真交给了那个病人，这是一种胆量，更是一种爱的情怀。小渔同江伟第一次见面是在江伟哥们为他举行的饯行会上。“小渔是被人带去的，和谁也不熟，但谁邀她跳舞她都跳。把她贴近她就近，把她推远她就远，笑得都一样。江伟的手在她腰上不老实了一下，她笑笑，也认了。江伟又近一步，她抬起脸问：‘你干嘛呀？’好像就她一个不懂男人都有无聊混蛋的时候。”¹⁸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小渔的单纯与纯洁。小渔没有主动跟别人跳舞，而是别人邀请她跳她就跳，别人让她怎样她就怎样，没有一种僵硬的、固定的伦理思维牵制着她。小渔能够受别人喜欢，也是因为她的真实坦诚和单纯，是这种单纯纯洁的心性香气吸引人。

对于江伟而言，小渔以性为基础的母性般的胸怀，在异国他乡时抚慰着江伟看似

¹⁸⁴ 严歌苓著，《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第86页。

¹⁸⁵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5页。

¹⁸⁶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5页。

坚强强悍其实懦弱易受伤的内心。“小渔想：他明明看见桌上有餐纸。她没挣扎，她生怕一挣扎他心里那点憋屈会发泄不净。她想哭，但见他伏在她肩上，不自恃地饮泣，她觉得他伤痛得更狠更深，把哭的机会给他吧。不然俩人都哭，谁来哄呢。她用力扛着他的哭泣，他烫人的颤抖，他冲天的委屈。”¹⁸⁷然而小渔的这种思维并不得到江伟的认可。同小渔结婚的对象老头都六十多岁了，江伟并不因为老头的年龄问题而对男女关系稍有懈怠，时刻警惕着老头。

“老东西要犯坏，你就跳窗子，往我这儿跑，一共三条街，他撵上你也跑到了。”小渔笑着说：“不会的。”江伟说凭什么不会？听见这么年轻女人洗澡，瘫子都起来了！¹⁸⁸

小渔住在老头家，本是情非得已。因为小渔同老头是假结婚，移民局的人会不时来调查，为了不使这场骗局露馅，小渔才搬到了老头家。江伟却因此而同小渔生分了。说话总是找茬刺小渔，可是小渔总是忍耐着，并用自己女性的温存来承受着这一切。“他那劲会过去的，只要让他享受她全部的温存。什么都不会耽误他享受她，痛苦、恼怒都不会。他可以一边发发脾气一边享受她。‘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他在她身上痉挛着问。”¹⁸⁹性在严歌苓的笔下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而是协调男女关系的一把钥匙。

《青柠檬色的鸟》中的老单身汉洼曾经想同住在楼上的中国女人香豆住在一起，被香豆拒绝了。洼空等了香豆一生，香豆死后，洼靠着一个八岁的墨西哥男孩为他读“成年读物”滋润日子。对于一个老单身汉来说，这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快乐。尽管这种快乐是靠洼发挥臆想来实现的，毕竟对于一个离乡背井地孤独了一辈子的老单身汉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小姨多鹤》里，张俭曾把多鹤带出去扔掉了，多日之后多鹤历尽艰辛回到了家里。回来后，疯了似的打张俭。“多鹤抄起地上的锅铲朝张俭砍去，张俭一尙身，锅铲砍在了墙上。这时要跟他你死我活的不是多鹤，是代浪村人。他们那特有的地狱一样的怒气，恰恰产生于长时间的沉默和平静。代浪村人在多鹤身上附了体，锅铲成了她挥舞的武士刀。”¹⁹⁰当集体无意识里的愤怒被一个人发泄出来的时候，这种愤怒并不是打几下就了事的，心灵的孤寂和悲哀怎么可能消散呢？张俭也想跟多鹤和解，但是一切道歉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并不能把一个人死了的心复燃。小环对自己的丈夫说“多鹤是日本女人，没错，赌一条东海烟她也早把命化在她的男人身上了。喜爱不喜爱

¹⁸⁷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8页。

¹⁸⁸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10页。

¹⁸⁹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17页。

¹⁹⁰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79页。

她的男人，另说，也无所谓，想从这男人命里掰出自己的命，她办不到。想跟多鹤和解，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跟她肌肤之亲去。女人表面上都会推的，说不定还打两拳、踢一脚，但那都是假的。她可不知道自己在作假；她以为她真在推拒、在出气、发泄委屈，实际上她已经跟你和解：你要她，比什么‘对不起’、‘抱歉’都管事。”¹⁹¹朱小环告诉张俭只有通过性爱才能化解多鹤的委屈，只有通过性爱张俭才能够得到多鹤的真心宽恕。张俭照着小环的话去做，“不知怎么，张俭已经将她抱在怀里。小环说得对，这是最好的讲和。多鹤的委屈总爆发了，他一抱，她就哭成一个无声的泪人。小环说，你要她，比什么都能安慰她。他一连几次地要她。”此次之后，张俭和多鹤开始真心相爱、相恋起来，过了一段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小说《扶桑》女主人公扶桑被拐到金山后，被卖到妓院做妓女，在最初的日子里，扶桑没有叫客人，因为这不是她自愿的，她自然是不叫的。扶桑跟人贩子上船的目的是为了到金山跟自己的丈夫相会，做妓女是迫不得已的。小说中关于扶桑性爱场面的描写是通过白人男孩克里斯的眼睛描述出来的。

她和身体在接受一个男人。那身体细腻；一层微汗使它细腻得不可思议。那身体没有抵触，没有他预期的抗拒，有的全是迎合。像沙滩迎合海潮。没有动，静止的，却是全面的迎合。

……

他以为该有挣扎，该有痛苦的痕迹。而他看到的却是和谐。不管那男人拖一条发辫，蜡黄的刺满青色兽样文身的脊梁如何令他憎恶，但那和谐是美丽的。

她的肉体是这和谐的基础，她主宰支配着伸缩、进退。……因为他看见她眼睛晕晕然竟是快乐。那最低下最不受精神干涉的欢乐。

欢乐在一点点往高处爬。

那欢乐不仅存在于她，它被她波动震荡的肉体播入了那个男人，又随着她的目光播向克里斯。¹⁹²

透过克里斯的描述，扶桑对性爱的态度实在让人惊讶。她本是被迫当了妓女，可在这一性爱场面中，竟然处于主导地位，那场面是一种由扶桑主导的“和谐”，扶桑在这一过程中享受的是性爱带来的快乐，那是一种“最低下最不受精神干涉的欢乐”，“她已整个化在刚才的欢乐中”¹⁹³。对于克里斯来说，扶桑是一个穷尽自己终生都难以

¹⁹¹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85页。

¹⁹²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49到50页。

¹⁹³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51页。

解答出来的谜，尤其是扶桑对性爱的态度。

六十岁的克里斯叨着烟斗，一动不动。就像他十四岁一动不动看着窗内。看着她怎样敞开自己，给人去毁去践踏。十多个人。还有更多。在她被毁尽的一瞬间，她直瞪瞪朝向他的眼里有什么在怒放。

她的本性怒放了，倏然从
被毁灭的自己、被践踏成土的自己
跃然腾空
整场的毁灭带来的竟是这刹那间脱缰奔放的
奔放的
自由！
她竟借助那场毁灭在那一瞬间释放了自己！¹⁹⁴

同样的性爱过程，在克里斯看来是扶桑在受难，可是扶桑却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享受了性爱带来的快乐，还感受到了奔放的自由。严歌苓用的是诗体形式表达出来的，以表达其激烈的情感。克里斯认为“这是个最自由的身体，因为灵魂没有统治它。灵魂和肉体的平等使许多概念，比如羞辱和受难，失去了亘古的定义。”¹⁹⁵性爱是生命原始的生理需求，对性爱的一系列伦理道德的束缚，都是人为加上去的。扶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她对性爱的态度是完全开放的，性爱在她那里没有好恶之分，她在洋人洗劫唐人街时，被群体强奸过。

你那时不仅没有叫喊你柔顺得如同无形无状的雾。你只是迎合上去，迎合在狂野和疼痛上。他们像是在拿你报复着什么。可报复什么呢？

你那时在想与生俱有的所有疼痛都像雾一样裂了又聚，升起又退去。你像雾一样包容着每一个戳向你的人。那戳刺渐渐不再尖利，不再让你碎裂。你一次又一次弥合、完整。

你渐渐分不出偶然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件事和天天发生的那件事有什么区别。你分不出出卖肉体 and 轮奸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甚至，你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出卖自己，因为你只是接受男人们，那样平等地在被糟蹋的同时享受，在给予的同时索取。你本能地把这个买卖过程变成了肉体自行沟通。你肉体的友善使你没有领悟到你需要兜售它。肉体间的相互交流是生命自身的发言与切磋。

¹⁹⁴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85页。

¹⁹⁵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85页。

这就再次使我质疑：扶桑你或许是从很远古的年代来的。¹⁹⁶

在被强奸的过程中，扶桑也能够享受到性爱带来的快乐，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在描写扶桑这个人物时，时常感到她身上体现了一种只有古老东方才有的雌性，是‘后土’式的雌性，不可能被任何文明和文化所‘化’的雌性。”¹⁹⁷可见，作者扶桑开放的性意识不是作者赋予的，而是扶桑作为一个高次元生命本身就有的性意识。

小说《第九个寡妇》中的女主人公王葡萄是个寡妇，她和好几个男人都发生过性爱关系。自从自己的丈夫铁脑半夜被人打死之后，王葡萄就成了寡妇。可是王葡萄并不是水性杨花。铁脑死后，王葡萄的第一个男人是琴师朱梅。朱梅有肺病，可就是这一点王葡萄更真心疼爱朱梅，也想跟朱梅过一辈子，可惜他们这段姻缘没有成。王葡萄的第二个男人是她丈夫的二哥孙少勇。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王葡萄是孙少勇的弟妹，可是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性关系，王葡萄从小就爱上了少勇，并且也有了少勇的孩子。按照传统观念，王葡萄这种行为是乱伦，应该受到唾骂的，可是葡萄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一点，甚至连作者严歌苓也没有从道德上谴责她，就是他公公孙怀清对此也没有说什么，不仅如此，二大甚至为了要让王葡萄好好嫁个男人，不惜冒着危险，离开地窖，到一个不认识他的地方去打杂工，“葡萄知道二大为她愁坏了，比自己养个闺女老在了家里还愁哩”¹⁹⁸，不仅如此还主动撮合王葡萄和朴同志，劝王葡萄主动抓住朴同志这个好人。

对于男人来说，王葡萄是个尤物，“这手真通人性啊，马上就把那秘密的舒服给了他，给了他全身，给到他命根子上。他想不远了，很快她能让他享福享个够。恐怕是没个够的”。¹⁹⁹王葡萄和孙少勇发生关系之前，孙少勇就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期待。对于王葡萄来说，性爱成了一种力量的源泉。“她有了冬喜后才明白，再累的一天都有盼头，只要晚上能和冬喜好上一回。闹上饥荒，人走路都费气，她天天盼着天黑，和冬喜往床上一倒，就不饿了。”²⁰⁰

然而王葡萄却不是个荡妇。尽管作者严歌苓在葡萄的人生中安排了众多的男人，但她并非同时和这些男人有着暧昧关系，不仅如此，她对谁都是有情有义。“葡萄的心有一瓣是少勇的，有一瓣是琴师的，有一瓣老是留给铁脑，最大一瓣上有他冬喜和她的挺。”²⁰¹尽管王葡萄一生和好几个男人发生了性关系，但并不是在同一阶段和这

¹⁹⁶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180到181页。

¹⁹⁷ 严歌苓著，《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86页。

¹⁹⁸ 严歌苓著，《第九个寡妇》，一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116页。

¹⁹⁹ 严歌苓著，《第九个寡妇》，一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58页。

²⁰⁰ 严歌苓著，《第九个寡妇》，一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135页。

²⁰¹ 严歌苓著，《第九个寡妇》，一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142页。

些人交往，而且是拿自己的心去爱这些男人的。朴同志离开史屯以后，孙怀清瞎了，王葡萄让孙少勇来给他看病，孙少勇把葡萄抱在怀里，可是葡萄柔柔地说等等。“她身子还是等的意思。他不知道，她是想等她把一个叫老朴的人忘淡一些。她这时吃惊了，她心上怎么能一下子放下这么多男人？个个的都叫她疼？只是两处疼不能擦一块儿。”因此王葡萄并不是一个水性杨花式的淫荡女子，而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女子。

王葡萄第一次跟史春喜发生关系，是在史春喜强迫下发生的，“不多久他以一场猛烈的快活报了仇。他想，连个愚钝女子我都治不住，我还治五十个村呢！不过等他完事时他又觉得懊恼；她瘫软地挺在床上，嘴里发出又深又长的叹气声，像小孩子馋什么东西，等吃到嘴了，煞下头一阵馋之后呼出的气。他回过头去细嚼滋味，办事中她好像还哼唧了几声，怎么弄她她怎么带劲，吭吭唧唧到最后打起挺来。他越想越懊恼；这不成伺候她舒服了？”²⁰²按照人类的伦理道德来说，如果不是自愿发生的关系，那么王葡萄则是被春喜强奸了，可是从春喜的回想中却可以看到，王葡萄根本没有这一想法，反而在这一过程中享受性爱带来的欢乐。正如史春喜说的那样“他发现自己决不是在糟蹋她。她是惟一个女人，让他觉着这桩事美着呢，享福着呢。她是惟一个女人不把自己当成一个被男人糟蹋的东西。她不管他，只管她自己动她的，快活她的。可她快活自己他就狂起来。最后他只想让她给毁掉。他觉着他碎在她肉里了。”²⁰³无论是小渔还是扶桑或王葡萄，她们对待性的态度，完全是开放的，性在她们那里不是龌龊的，见不得人的，而是正常的生理需求。

严歌苓曾评价作家 D.H.Lawrence，说“读者能从他的‘性’中读到肉体与精神的互动关系，还能读到‘性’中的阶级关系，甚至政治关系，‘性’使‘爱’更丰富，更可信。爱情是平面的，而有了‘性’意识的爱情则是立体的。”²⁰⁴显然，严歌苓也受到了启示，在她的作品中，也可看到“性”的政治关系。王葡萄一直把自己的公爹孙怀清藏起来的事情终于被别人知道了。首先知道的是史五合，五合以此要挟葡萄满足他个人的性欲，葡萄为了孙怀清不得已而从之，后来利用机会，通过侏儒群体的力量把五合除掉了，才让这个天大的秘密没有被揭发出来。

在王葡萄所有的男人中，她唯一没有拿出自己的真心对待的就是史春喜。“黑灯瞎火可真美，她管他是谁，她身子喜欢就行”²⁰⁵“她葡萄和他不一样，动的不是心，是身子”²⁰⁶。春喜当年跟孙少勇在葡萄家打架时掉下了旧军衣，葡萄给留了下来，发现里面有写给她的信，还标上了日期，不知为什么葡萄觉得该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将

²⁰² 严歌苓著，《第九个寡妇》，一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160页。

²⁰³ 严歌苓著，《第九个寡妇》，一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250页。

²⁰⁴ 严歌苓著，《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84页。

²⁰⁵ 严歌苓著，《第九个寡妇》，一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188页。

²⁰⁶ 严歌苓著，《第九个寡妇》，一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197页。

来好以防万一。人世间不可能有永久的秘密，王葡萄知道孙怀清被她藏起来的这件事，村里知情的人越来越多，只是大家都不挑明。自从史春喜和孙少勇在王葡萄院子里大打出手之后，王葡萄就没有再给春喜好脸色看，更不用说别的了。为了能够让那个天大的秘密能够变成永远的秘密，王葡萄开始主动让春喜到她家去取当年落下的旧军衣，但不过是以此为饵而已，春喜来了以后，他们又快活了一场，葡萄并没有把军衣给他，并明告诉他要诡他。当史春喜也知道了王葡萄的秘密之后，他告诉葡萄说要让民兵把孙怀清带出来审审，调查实情。王葡萄知道他不会这么做。

他扭头就走。他这才明白葡萄为什么把他的旧军衣藏起来，明告诉他要诡他。

他走得很快，知道葡萄还扇着大草帽在看他。知道她不知怕的眼睛看他步子全乱了，像个落在蜘蛛网里的苍蝇那样胡乱蹬脚划手。要是葡萄院子里的白毛老头儿真是二十多年前前死刑里逃生的孙怀清，事情大得他不知怎样收场。那会是一个全省大案，弄不好是全国大案。可村里人并不认真想弄清白毛老头儿到底是谁。心里清楚的人嘴上也都把它当鬼神传说，就像传说黄大仙变了个女人，拖一根大辫子，在史老舅的二孩家窗口等他。二孩病了一年多，眼看快不中了，史老舅终于下夹子捉住了那黄大仙，把它打死，二孩第二天就起床了。

春喜没想到葡萄成了他的黄大仙，用符咒罩住了他，叫他身不由己地做了她的帮凶。他走到史屯街上，坐在吉普车上已经决定，只要没有人向他正式举报“白毛老头儿”，他就当它是史屯人编的另一个黄大仙传说，让他们自己逗闷子的。²⁰⁷

王葡萄是非常有智慧的，如果不是她利用自己跟春喜的关系，并且春喜在她手里留下了把柄，按照春喜的性格他大概真会马上带民兵去葡萄家把这件事查清楚。王葡萄留下的一手，让春喜能够冷静地从全局考虑，最终他也站到了王葡萄这边，帮助她守住了这个秘密。

《陆焉识》里冯婉喻得知陆焉识要被判死刑时，就开始多方面想办法，企图救出陆焉识。冯婉喻是一个大家闺秀式的女人，却放下一切，通过利用她同市委的戴同志之间的性关系，救出陆焉识。“她在初次见面后的第二天，就做了戴同志的情妇。她做戴同志的情妇的时间加在一块是六个小时多一点：每次戴同志爱她都不超过半小时。她做戴同志的情妇是要他出高价的：背叛组织原则，把她死到临头的爱人陆焉识救下断头台。她一点也不难为情地提醒压在她身上的戴同志：‘陆焉识的事情你要快点想办法。’有几次他调情地跟她抬杠：‘就不想办法！’她不吭声，是那种阴沉威逼的沉默。戴同志半真半假地说：‘让他死去，死了你就是我的了！’婉喻此生连鸡都没

²⁰⁷ 严歌苓著，《第九个寡妇》，一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252-253页。

杀过，这时候真想杀了戴同志：被他劈开的两条腿正好是绞索，套住戴同志的脖子上，把她三十多年长出的力气全部投入，锁死绞索，再那么一拧。戴同志还是个好同志，起码从事情的表象看他没有白白糟蹋她婉瑜。不久她得到监狱方面的消息，陆焉识的徒刑降级了，降成了死缓。”²⁰⁸

即使严歌苓受到启示，表现了性的政治关系，它却是建立在拯救另一生命基础上的。冯婉瑜就算是为了救出陆焉识而同戴同志发生了性关系，也是冯婉瑜甘愿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叙述者没有说明，但通过戴同志的态度可以看出冯婉瑜在性上让他相当满足，他才会半开玩笑地说要是陆焉识死了就好了，那么冯婉瑜就是他的了。可见，冯婉瑜也在这一过程中享受着性爱带来的快乐。没有她的配合，戴同志也不会那么尽兴的。

透过严歌苓笔下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对待性的态度极其开放。性爱不再受伦理道德的束缚，有时只是肉体的欢乐和自由，不受任何精神束缚的干涉，但却不是淫乱的、猥亵的；有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已出卖自己的肉体，性被附加了政治关系，但却是为了救出另外的生命，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享受性爱带来的欢乐；有时通过性爱慰藉孤寂委屈的心灵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她们超越了伦理道德的束缚，有着开放的性意识。

²⁰⁸ 严歌苓著，《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第397页。

第二节 自由意识

陈凯歌曾评价严歌苓的小说“她的小说中潜在的，或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引人注目，我觉得，那就是个人自由。”²⁰⁹读严歌苓的小说，会感到小说中有一种强烈的自由意识。这一意识不是严歌苓从理论上强加给人物的，而是人物自身的状态就是一种不受束缚的、自由的状态。从《少女小渔》中的女主人公小渔开始，一直到扶桑、王葡萄、朱小环等人物，她们身上都有着自由意识这一共同的特征。应该说这种自由意识在小渔那里还不是很明显，在扶桑那里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严歌苓在影片《少女小渔》获奖之际的演讲《弱者的宣言》里说，“男人就不去说了，他们生来就是为政治、战争。竞技场上的争夺，要他们善良，就等于不给他们事做。他们只要正直，正直本身所包含的善良成分就已足够。而女人应该善良，女人的善良是对男人们在争夺中毁坏的世界的弥补。每个女人，在我想象，她内心深处都沉睡着一一条温柔、善良、自我牺牲的小人鱼。不同的是，那沉睡的小人鱼在一小部分女人身心里常常醒来，而在绝大部分女人那儿，只偶尔醒那么几回。但无论如何，小人鱼的本质或多或少地感染着女人的本性。”²¹⁰无论男女，都应该善良，善良是生命的本质，是人的本性。人只有先善良，才会得到心灵的自由。只有心灵处于自由状态，才不会被眼前看到的事物的表象迷惑。

《少女小渔》中小渔的善良除了体现在对江伟的态度之外，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她对意大利老头的态度。一个周末，江伟开车带小渔到海边去看手工艺展卖，在那里看到了意大利老头在拉琴卖艺，碰巧下了阵大雨，小渔被江伟拉到一个冰淇淋摊子的大伞下，小渔看到老头后，叫老头来跟他们一起避雨，可是老头没听见。

忙乱中的老头帽子跌到了地上。去拾帽子，琴盒的按钮开了，琴又摔出来。他捡了琴，捧婴儿一样看它伤了哪儿。一股乱风从琴盒里卷了老头的钞票就跑。老头这才把心神从琴上收回，去撵钞票回来。

雨渐大，路奇怪地空寂，只剩了老头，在手舞足蹈地捕蜂捕蝶一样捕捉风里的钞票。

小渔刚一动就被按住：“你不许去！”江伟说：“少丢我人。人还以为你和这老叫花子有什么关系呢！”她还是挣掉了他。她一张张追逐着老头一天辛苦换来的钞票。在老头看见她，认出浑身透湿的她时，摔倒下去。他半蹲半跪在那里，仰视她，似乎那些钱不是她捡了还他的，而是赐他的。她架起他，一边回头去寻江伟，发现江伟待过的地方空荡了。

²⁰⁹ 《严歌苓：只在文字的世界里“紧张”》，《新民周刊》

²¹⁰ 严歌苓著，《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94页。

可以想象当时老头一个人在风雨中是多么的可怜，即使是不认识的人，大概也会过去帮他一把，更何况是善良如小渔呢？老头当时摔的那一跤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后果，中风了。如果小渔当时没有去帮老头追钱，对他的事置若罔闻，等知道老头摔倒且中风，而且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相信小渔的内心一辈子都会不安的，那将会成为一片阴影永远笼罩着她的心头，她就永远丧失了心灵上的自由。可是小渔她没有，她善良的本性让她不顾江伟的反对毅然去帮助老头，并且最后我相信小渔不会置一个完全瘫在床上，且活不了多久的老人于不顾。因为她点头答应了老头的那个没有说完的“要是……”。“‘要是’是问不尽的。要是你再多住几天就好了。要是我死了你会记得我吗？要是我幸运地有个葬礼，你来参加吗？要是将来你看到任何一个孤零零的老人，你会由他想到我吗？”²¹²正因为小渔内心坦然、自由，才对这个邈邈的、自私意大利老头没有任何偏见，真心诚意待他。而她也赢得了意大利老头的心，末了，意大利老头甚至把小渔看成了自己的女儿，还给小渔办了一张火车月票，“当她接过它时，他脸上出现一种认错后的轻松。”²¹³小渔以自己的善感染着周边的人，自由在小渔那里化成了善

自由意识在扶桑这里达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在谈到扶桑这一形象时，严歌苓说“《扶桑》是看到一张大照片挂在旧金山的历史博物馆里，我想这个女人一定有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在里面，于是我作了很多史料研究，通过想象力创作出来这样一个女人。”²¹⁴这个形象的雏形是这样的：“我在一本图片册里看到一帧照片，尺寸有整个画册那么大，因此照片中的女子看去十分逼真：从神态到姿态，从发饰到衣裙质地，甚至那长裙下若隐若现的三寸金莲。这是十九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中国妓女，十分年轻美丽，也高大成熟，背景上有些驻足观赏她的男人们，而她的神情却表示了对此类关注的习惯。她微垂眼睑，紧抿嘴唇，含一丝惭愧和羞涩，还有一点儿奴仆般的温良谦卑，是那盛服掩不住的。这个端庄、凝重、面无风情的妓女形象就是我后来创作扶桑的雏形。”²¹⁵在严歌苓看来，扶桑是一个女奴，“她是一个跪着的女奴隶，但她用极其母性的胸怀原谅了所有站着的男人。”²¹⁶尽管如此，作者严歌苓并不否定扶桑身上的自由意识，“扶桑是一个强于男人的女性主义者，所以，她有的是一种现代精神：

²¹¹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16页。

²¹²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20页。

²¹³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19页。

²¹⁴ 《严歌苓 对所有传统的东西都开始质疑》，《中华合作时报2004年11月02日，第T00版》，方乐莺

²¹⁵ 严歌苓著，《波西米亚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110页。

²¹⁶ 《严歌苓 对所有传统的东西都开始质疑》，《中华合作时报2004年11月02日，第T00版》，方乐莺

崇尚自由，不愿从一，享受肉体。”²¹⁷

扶桑的自由意识具体体现在她的微笑上。大勇是在一场拍卖妓女的拍卖会上初次见到扶桑的。“他想她大约有点痴，脸上无半点担忧和惊恐，那么真心地微笑。是自己跟自己笑。一对大黑眼睛如同瞎子一样透着超脱和公正。那种任人宰割的温柔使她的微笑带一丝蠢。她脸上红润，一道鲜嫩的伤痕从她嘴角延至脖颈，是三根锋利的指甲留下的。如此的一江温柔与这伤痕严重地矛盾着。”²¹⁸一个人被当成妓女奴隶拍卖，原本应该感到愤怒和悲哀的，可是扶桑脸上却无半点担忧和惊恐，一脸的微笑。在这样的情形下，能够笑出来的必定是心无挂碍，心里一片自由，才能够做到如此坦然。

小说中描述了一段扶桑吹箫的场面。大勇曾带着一帮人把扶桑从拯救会那里劫出来，他们一帮人上了船。船隔成两等，上一等归白种人，可船开之前上来十五六个白种人，说上等舱太冷，他们只好来忍受下等舱，并且叫中国人都坐到另一边去。这一帮人和十几个白人之间开始了气势上的争斗。大勇知道如果打起来自己寡不敌众，就忍着，同扶桑闲聊，并且邀扶桑为大家吹一曲洞箫《苏武牧羊》，结果双方在扶桑的洞箫之下，大打出手。在大打出手之前，表面上大家和和气气的，实际上早已处于一种拔剑张弩的状态，扶桑吹箫这一举动其实是一个导火索。

扶桑的箫声刺痛了十几个白人的心灵深处，或者说灵魂深处的痛楚。中国音乐就是这样，让人的灵魂能够静下来好好休息一下，这同白人的文化可能相抵触，尤其是这十几个其实是流氓的白人。扶桑的举动尤其令人匪夷所思，在整个过程中，扶桑没有被他们这些人混打干扰。在他们动手之前，白人先嚷嚷着让扶桑停下来，“停下来！一个洋人喊道，将一只酒瓶在舷窗上‘咣’地一敲”，而“扶桑根本没听见这绝望透顶的喊叫，把曲调一绕，绕出另一个开头”。扶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此时吹箫这件事上，她“没有听见”白人的喊叫，继续吹她的箫，当所有的洋人都吵嚷着让扶桑停下时，“扶桑正吹到风和日丽，草青花红，自然是不愿停下的。她隔着面纱朝那些悲愤交加的白面孔看去，把他们看穿，看到很远一个地方”。随着扶桑吹的投入，洋人再也忍不住了，“将酒瓶掬在中界地板上”，并开始大骂出口。即使这样，扶桑还是没有停下来，反而“吹到溪流如网，天高云淡”。扶桑的这一态度让大勇很为佩服，用叙述者的话说是“大勇心想，她这份不为所动，实在是个极大的稀罕”。因为大勇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对洋人的挑衅开始反唇相讥，最后同洋人大打出手。此时的扶桑“吹到雁阵南飞。她眼睛千里秋水地看着怒不可遏的白面孔和黄面孔。她似乎不懂这两伙人渐渐地靠近意味什么”。按常理，在这种情况下，两伙人渐渐靠近就意味着准备大打出手，可是扶桑没有被眼前的情景所动，不仅如此，反而似乎不懂这两伙人渐渐

²¹⁷ 雅非，《在海外写作：作家严歌苓访谈录》，<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157380/>

²¹⁸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18页。

地靠近意味什么。所有的中国人都唯大勇的马首是瞻，大勇不用下令，只要他的辫子被盘到头顶上，大伙就知道要开打了。大勇最终还是把自己的辫子盘到了头上，“扶桑吹着，看那些脚、手纹到了一处。渐渐地板上有了一摊摊一汪汪的血。鞋子、头发、牙齿”。双方终于大打出手，可是扶桑还在吹着自己的萧，完全置身于外，就像活在另外的空间，不带感情地看着对方打，将近打完之时，“扶桑把曲子吹完整了。她把尾音收好，嘴唇也收好，才来看这些浑身是血的人们。一个洋人也没了。”²¹⁹

扶桑吹箫以后，洋人因为不能忍受这刺痛人类灵魂深处的弱点、人的痛楚的这种音乐，开始用话语挑衅到对方大打出手，这更个过程中，外部的一切都没有干扰到扶桑吹箫。她没有因为洋人让她停，她就停，即使洋人对其施加语言暴力，她也不为所动。扶桑心目中的那片自由让她超脱于尘世的一切。叙述者这样评论扶桑：

你活你的，为那个只有你自己知道的道理微笑和美丽。

有时，虽然你在我面前这样的近，我却疑惑你其实不是我了解的你；你那时代的服饰、发型、首饰只是个假象，实质的你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不，比那还古老。实质的你属于人类的文明发育之前，概念形成之前的天真和自由的时代。²²⁰

在白人集体袭击唐人街时，扶桑被轮奸。叙述者描述到：

你那时不仅没有叫喊你柔顺得如同无形无状的雾。你只是迎合上去，迎合在狂野和疼痛上。他们像是在拿你报复着什么。可报复什么呢？

你那时在想与生俱有的所有疼痛都像雾一样裂了又聚，升起又退去。你像雾一样包容着每一个戳向你的人。那戳刺渐渐不再尖利，不再让你碎裂。你一次又一次弥合、完整。

你渐渐分不出偶然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件事和天天发生的那件事有什么区别。你分不出出卖肉体 and 轮奸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甚至，你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出卖自己，因为你只是接受男人们，那样平等地在被糟蹋的同时享受，在给予的同时索取。你本能地把这个买卖过程变成了肉体自行沟通。你肉体的友善使你没有领悟到你需要兜售它。肉体间的相互交流是生命自身的发言与切磋。

这就再次使我质疑：扶桑你或许是从很远古的年代来的。²²¹

肉店老板娘也同扶桑有同样的遭遇，可是肉店老板娘被肉店老板杀掉了，用大勇

²¹⁹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132到134页。

²²⁰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120页。

²²¹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180到181页。

的话说就是“老板是帮老板娘杀她自己”，²²²而扶桑却在这一过程中给予同时享受。为什么同样的事件，在扶桑这里和肉店老板娘这里得到的结局完全不同呢？叙述者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答案“让我告诉你实话：你不怕强奸。我刚刚明白这一点。你没有恐惧，对于强奸的恐惧主要来源它的概念。”²²³叙述者的话是有道理的。荣格认为“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冲突仅仅表明：精神生活在最深的根源上是不可理解的‘某物’。这无疑是我们唯一的直接经验，我所经验到的一切都只是心理的东西。甚至肉体的疼痛也只是我经验到的一种心象；我的感官印象加之于我的是一个占有空间的难以把握的对象世界，而感官印象本身则不过是一些心象，并且只是这些心象才构成了我的直接经验，因为只有它们才是我的意识的直接对象。”²²⁴外部的一切事物都是内心状态的映射的结果。强奸这一概念是人类伦理道德意识下产生的概念，如果心里有这种概念那么自然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不同，如肉店老板和老板娘，因为扶桑意识里没有强奸这一概念束缚着她，她的行为证明她心里有一片自在的天地。强奸是一种道德意识很强的概念，自古以来它夺走了多少生命，一个概念难道比一个人的性命更为重要？

克里斯的意识里，一直认为扶桑是一个女奴，他企图通过各种方法拯救扶桑，想给她自由，结果却发现原来扶桑是一个比任何人都自由自在的人，而这一自由不是谁给予的。“因为她心里实际上有一片自由，绝不是解放和拯救所能给予的。绝不是任何人能收回或给予的。四十多岁的克里斯认定，正是那秘密的一片自由使跪下这姿态完全变了意味。它使那个跪着的形象美丽起来。就那样，她在那个充满敌意的异国城市给自己找到一片自由，一种远超出宿命的自由。”²²⁵扶桑的行为在克里斯看来一直都是一个谜，他几乎穷尽一生来解读扶桑。

原来宽容与跪这姿态是不冲突的！克里斯在七十岁这个失眠之夜突然悟出这一点。在跪作为一个纯生物的姿态变成概念之前，在它有一切卑屈、恭顺的意味之前，它有着与其平等的有着自由的属性。

那么就是说，扶桑的跪是跪的意味没有产生前的纯生物姿态。或许原始的人（尊卑概念形成前的初民），对于跪的理解是无成见的，或许自然到了根本不去理解。单纯和诚恳得如同原始人的扶桑，就这样把宽恕和跪融为一体了。既没有了宽恕者的居高临下，也没有了跪者的卑恭。²²⁶

²²²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177页。

²²³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181到182页。

²²⁴ （瑞士）荣格（Jung,C.G.）著，冯川，苏克译，〈分析心理学的基本假设〉，《心理学与文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9，第16页。

²²⁵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160页。

²²⁶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202页。

克里斯认为扶桑的意识是原始人的，是尊卑概念形成前的初民意识。扶桑的行为不仅在克里斯看来是个谜，就是叙述者对她也不甚了解。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叙述者将自己对扶桑的所有的推测都推翻了，“根据这么多记载，我一开始推断出你的简单、蒙昧，后来我怀疑你有些无伤大雅的低智从而不知掩饰你对肉体欢乐的兴趣。不久我又推翻了所有设想与猜测，我认为你对忠贞的看待更慎重，你的感情藏得极深，它仅仅是为那个白种男孩藏着的。而你现在的安泰以及你将对克里斯和大勇做的，使我再次陷入了对你深沉的困惑。你的笑让我怀疑我从始至终对你的无知。”²²⁷

荣格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中提到“因为一部艺术作品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某种超越个人的东西。它是某种东西而不是某种人格，因此不能用人格的标准来衡量。的确，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特殊意义正在于：它避免了个人的局限并且超越于作者个人的考虑之外。……艺术作品中的意义和个性特征也是与生俱来的而不取决于外来的因素。人们几乎可以把它描绘成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物，它把人仅仅用作一种营养媒介，按照自身的法则雇佣人的才能，自我形成直到它自身的创造性目的得以完全实现。……这些作品专横地把自己强加给作者：他的手被捉住了，他的笔写的是他惊奇地沉浸于其中的事情；这些作品有着自己与生俱来的形式，他想要增加的任何一点东西都遭到拒绝，而他自己想要拒绝的东西却再次被强加给他。在他的自觉精神面对这一现象处于惊奇和闲置状态的同时，他被洪水一般涌来的思想和意象所淹没，而这些思想和意象是他从未打算创造，也绝不可能由他自己的意志来加以实现的。尽管如此，他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他自己的自我表白，是他自己的内在天性在自我昭示，在表达那些他任何时候都不会主动说出的事情。”²²⁸ 因此，《扶桑》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严歌苓在向我们讲故事，不如说是严歌苓跟自己深层的潜意识间的对话，尽管严歌苓说“扶桑具有大量的、非常高的假设性，基本上已经超现实了，再加上，我是把她作为一个结结实实的中国农民女人写的。”²²⁹但扶桑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存在，是存在于严歌苓深层潜意识状态下的生命。

我个人认为严歌苓塑造的所有人物中，扶桑是最出色的一个，不过由于扶桑是高层次的生命存在，如果严歌苓她对生命的本质探讨得足够深并且将其诉诸于自己的作品中的话，那么她将创造出超越种族国籍，回到对生命本质的探讨的世代相传的伟大作品，可惜她的探讨仅此而已。不过难得的是，扶桑这一人物身上的自由意识却为其

²²⁷ 严歌苓著，《扶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第209页。

²²⁸ (瑞士)荣格(Jung,C.G.)著，《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9，第76页。

²²⁹ 雅非，《在海外写作：作家严歌苓访谈录》，<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157380/>

日后的创作做了铺垫，成了她作品中人物身上最闪光的东西。在王葡萄那里，自由意识则变成了一种“啥事都不是事”的生活哲学。正因为相信“啥事都不是事”，才不被眼前的表象迷惑，才不受任何框架的束缚，生命的自由也得以存在。王葡萄的“啥事都不是事”的生活哲学成了一种正思维，不仅让她在艰苦的岁月里成功地保护了他的公爹，而且这种正思维形成了一种正向的能量场，感染着周边的人。如果说自由意识在扶桑那里通过扶桑的笑体现出来的，在小说《第九个寡妇》女主人公王葡萄那里是通过她的眼睛来表达的。

作者严歌苓在作品中一开始就说“对于葡萄，天下没什么大不了的事”²³⁰，这是多么大的口气，如果不是把人世间看明白了，怎么可能说出这么有气魄的话。不仅如此，还说王葡萄“她缺点什么。却的那点东西非常非常重要。那就是惧怕。这是个天生缺乏惧怕的女子。什么人缺乏惧怕呢？疯子。”²³¹作者将王葡萄定位在“疯子”上，疯子的行为是不能够按照常人的思维去衡量的，这就给她的表述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提供了陈述上的张力，叙述者不再像对扶桑那样充满着无知、探讨和猜测，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活泼的叙事态度向我们讲述了王葡萄的故事。王葡萄的眼睛是叙述者的着眼点，不断地通过故事中的人物，来描写王葡萄的眼睛，“她回过头来，看着二大。二大心里一惊，这闺女怎么这样瞅人？二大回避了她直戳戳的眼睛，心里却懊恼：回避什么呢？我怕她？我心里亏？”²³²

外乡人买烟，给一张钞票，硬要买五支烟，剩下的爱卖给谁就卖给谁，这其实是明摆着要揩油，而此人又是中央军，如果是一般人如店里的伙计，可能会让这个老总白得支烟抽抽，甚至还会将整盒烟奉上。可是他偏偏碰到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王葡萄，葡萄说没零钱找时，那外乡人笑眯眯地说“那我没零钱，就算你老哥揩你油吧”²³³。王葡萄把那个外乡人给的钱撕下一小角，作为烟的价钱，把剩下的一多半钱给了那外乡人。外乡人的反应是

外乡人不笑眯眯了，说你这臭丫头蛋子，撕了一个角，这钱不废了？葡萄眼睛直逼逼地看着他，说那正合适，你剩下一多半钱，我剩下一多半烟卷。

外乡人一下子分了神，是葡萄的目光让他分神的。这是一双又大又黑又溜圆的眼，假如黄一些就是山猫的了。这双眼看着你，让你想到山里幼年野物，它自以为是占山为王的。它尚不知山里有虎有狮有熊，个个都比它有资格称王，它自在而威风，理直气壮，以为把

²³⁰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6：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1页。

²³¹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6：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6页。

²³²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6：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11页。

²³³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6：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14页。

世面都见了，什么都不在它话下。²³⁴

这个把世面都见了的王葡萄，一直到她中年，她的眼睛还是只有几岁的不谙世事，她做什么事都是率性而为，以一种超脱的态度对待一切。在她的影响下，她公爹的思维意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手里慢慢拨弄着高粱穗，慢慢插进线，慢慢紧线。早已不是过去那样利索快当的一双手了。他这双手现在做什么都是老和尚拨念珠，拨着拨着，他银发雪眉，满面平和。他垂下眼皮时，就像一尊佛。葡萄不懂，二大的样子是不六根清净得来的？她觉得他越来越少笑容，也去尽了愁容。有时她讲到村里的事，谁和谁又打闹了，谁又给拉上台斗争了，二大就扯开话去”“他的动作缓下来，去掉了生性中的急躁。他一下子宽了心似的，对世上的、村里的所有人和事都不图解答，不究根底，最后他连知道也不想知道了。”²³⁵原先的二大总是觉得这样躲在红薯窖里不是事，一点自由都没有，可愁着呢，又怕拖累王葡萄。为了追求自由的生活，他曾经偷偷离开史屯到西安找了份打杂的活儿。后来查身份查得紧，王葡萄去把他找了回来，此后他就躲在红薯窖里给王葡萄出谋划策，度过了艰苦的岁月，但心里总有放不下的事，就是自己被藏起来的这件事。

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和思维意识的自由。哪怕有了人身自由，心里不自在，也不会感受到自由。一旦自己的思维意识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常讲看开了就好了，同样的处境，心境不一样，态度就完全不同。二大孙怀清可以说到了暮年才真正得到了自由，而这一自由是源于心灵上的。朴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时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坐了半年监之后，被送到了史屯，此时王葡萄在猪场养猪，朴同志到了王葡萄跟前，王葡萄让朴同志给她扯风箱。“红卫兵们把灶台围成两个小炮楼，密不透风，一上来口号喊得嘹亮整齐，慢慢不齐了，有人只是抬抬手张张嘴地瞎混。葡萄该干什么干什么，添水，加柴，煮菜。红卫兵们变着词儿地喊口号，喊朴同志‘臭文人’、‘黑笔杆’、‘反党大流氓’、‘地主干儿子’。开始他们喊一句，他就在板凳上矮一点儿，后来见葡萄抬头看天，他跟着抬头，见一个人字形雁阵从北边飞过来。葡萄眼睛看雁也专心地发直，嘴唇半开，完全忘了正给锁在一个人体筑的小炮楼子里。他慢慢也把几层人脸人头拳头胳膊给忘了，一下一下地扯着风箱。火烧得好着呢，他眼前脑子里只剩下稳稳烧着的金黄的火。过一会儿，他一张嘴，一个哈欠出来了。他抬起头，见一个喊口号的红卫兵也跟着打了个哈欠。又是一会儿，好几个红卫兵都打起哈欠来，只不过打得很贼，把鼻孔撑大，叫哈欠出来，不耽误嘴里喊口号。”²³⁶

²³⁴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6：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14页。

²³⁵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6：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241页。

²³⁶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6：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219页。

同样的场面，本来朴同志被红卫兵们弄得很闹心，可是他被葡萄感染，不被眼前看到的景象牵扯住，把注意力集中到烧火上，就轻而易举地从看到的别人斗自己的相里面摆脱出来了。可见改变自己的心态，哪怕是同样的情景，处理态度完全不同。现在反而是朴同志自由了，他可以舒服地随便打哈欠，红卫兵们却因为喊口号的原因贼贼地打着哈欠。一个人的自由与否不是外部给的，而是心灵作用的结果，只要内心是自由的，不管处于什么情况，都可以泰然处之。

小说《陆犯焉识》可以说把焦点集中在了自由这个主题上。男主人公陆焉识终生追求“自由”，为了自由，他去美国留学，以摆脱恩娘，回国后，因为恩娘和婉喻之间的争吵，他开始泡书店和咖啡厅，以求能够得到片刻的自由。为了自由，他拒绝加入任何社团和阵营，包括在监狱的那些年他都不掺入任何群体，自始至终想保持着自己的自由。

年轻时的陆焉识追求精神自由，独立思考，他不愿意扯进大卫之类的以文字批判对方之类的事，“他怎么能让大卫这样的人明白，他做什么事，写什么文章，都是出于他自己的道德审美。或者说出于一种道德趣味。各人有各人的趣味，不符合他趣味的，他就会觉得不适，或者恶心。对，就是恶心。凌博士跟他观点不同，他们辩争得怎样激烈，那不妨碍他尊重凌博士的趣味。一旦要他陆焉识以大卫的形式去反对凌博士，他的道德趣味就被违反了，恶心就来了。”²³⁷陆焉识这种追求独立思考的自由意识，最终让他成了一个无期劳改犯，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他却得到了思维上的自由，他可以在心里随便想，随便盲写。当他被平反以后，曾经的盲写终于成了大卷的回忆录和书信集。“焉识在大荒草漠上盲写那些稿子时，润色已经基本完成，所以他口述起来特别酣畅淋漓，就像话剧演员朗诵背得滚瓜烂熟的台词。三部书稿的整个誊写工作进行到1986年的7月中旬圆满收尾，一共才用了七个月时间。学锋从杂志社偷运回来十几本稿纸，现在那些细小的空格里填满了字迹，摞在桌上有两尺多高。”²³⁸

陆焉识被自己的恩娘说成是“没用场的人”。叙述者这样解释的“一般此类‘没用场的人’都有一身本事，误以为本事可以让他们凌驾于人，让人们有求于他们的本事，在榨取他们本事的同时，至少可以容他们清高，容他们独立自由地过完一生。但是他们从来不懂，他们的本事孤立起来很少派得上用场，本事被榨干也没人会饶过他们，不知如何自身已陷入一堆卑琐，已经参与了勾结和纷争，失去了他们最看重的独立自由。”²³⁹陆焉识被释放后回到了自己亲人的身边，亲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父亲因为政治斗争坐了二十多年的牢，吃尽了苦头而善待父亲，而是把父亲当成跑腿打杂的，

²³⁷ 严歌苓著，《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第220页。

²³⁸ 严歌苓著，《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第411页到412页。

²³⁹ 严歌苓著，《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第413页。

并没有从心里上真正尊重他这个做父亲的，最后按照叙述者的叙述女婿一家和儿子一家成了死敌，“我祖父在两条阵线之间。两条阵线不是争夺他而是推脱他。倒不完全为了房子居住，双方都怕老阿爷那不太漂亮的政治面貌经不住邻居的横看斜瞅。”²⁴⁰最后，陆焉识选择了走，并且带着冯婉喻的骨灰走了，走到了哪里？叙述者说“我猜想是邓指的小儿子给了他启发，让他意识到，草地大得随处都是自由。”叙述者猜想陆焉识又回到了那片曾经让他吃劲苦头的大荒草漠，可是在这片草地上，他的思维却是自由的。

一个人哪怕有再多的人身自由，如果他的心灵不自在，就总会被什么束缚住。相反，如果心灵自由了，才是真正得到了大自由。陆焉识一辈子追求自由，当意识到自己对冯婉喻的爱恋无法割舍时，他选择了逃狱去见婉喻，其实这时他的心灵已经失去了自由，他的这一行为给婉喻和孩子们带来了更大的麻烦，让她们原本被逐渐淡忘的政治身份又重新浮现了出来。当陆焉识看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还有孙子时，他选择了从暗中分享这一家祖孙三代的快乐，之后回去自首了。自首之后，明白自己真正能够帮上这一家人的其实就是跟冯婉喻离婚，这样他就不会再连累他们了。做了这一选择之后的陆焉识反而从此没了牵挂，心灵自由了。由于他的逃狱，很多人都想毙了他，并且处处刁难他，因为心中少了那份对婉喻的牵挂，反而心中生慧，使得他都能够靠自己的智慧来躲过一次次人为的逼近的死亡。

在陆焉识看来，由于恩娘的原因，冯婉喻是没有自由的。为了给冯婉喻一些自由，让她暂时摆脱恩娘，对恩娘撒谎说教授要带着自己的夫人参加学术研讨会，硬把婉喻带出来，给了她两天的自由。可不巧的是，正好碰上冬雨，只能待在陌生的小店里，因此心情很是郁闷，感到无限的压力。“他们隔壁就是一对年轻男女，借着雨天烫酒下棋，楼下他们也碰到一对上海夫妇，坐在饭厅赏雨品茶，好像就因为小旅店的陌生，茶也好了雨也好了，连粗点心也比上海好了。焉识和婉喻却做不了他们，似乎就心焦焦地等着雨停，停了就要赶路去哪个好地方，或者雨停了两个人可以相互放生。”²⁴¹

同样的景致，年轻男女和上海夫妇欣赏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美。摆脱了恩娘，陆焉识和冯婉喻以为他们可以得到片刻的自由，但事实相反，非但不自由，反而彼此成了彼此心里上的负担，可见自由不是外部因素赋予的。怪的是“焉识同意当天晚上乘船回上海。这一来怪事发生了：两人都松了口气，都自在起来。雨也好了茶也好了，他们开始觉得要抓紧时间品评，抓紧时间度他们最后的几小时。甚至他们也发现了小屋的可人之处：墙上的画是真迹，手笔不俗；做橱柜的乡间木匠是有品位的，一定喜

²⁴⁰ 严歌苓著，《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第414页。

²⁴¹ 严歌苓著，《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第114页。

欢明代家具；床也是好木头好雕工，床头柜上还有旅店送的一瓶加饭酒。”²⁴²

相信小屋的可人之处并不是在两人自在以后才有的，原来就存在，只是由于他们心里不自在，没有发现而已。一旦人的心里自在了，就可以发现原本没有发现的美。他们这一自在起来，就有了从未有过的激情，“在旅店的雕花木床上，我祖父浑身大汗，我祖母娇喘嘘嘘，最后两人颓塌到一堆，好久不动，不出声。日后我祖父对这次经历想都不敢想，因为他不想对它认账。他们回到家很多天，他都不看一眼婉喻，有一点不可思议，也有一点上当的感觉。可是又不知道上了什么当，是谁给了他当上。”²⁴³让这两个人上当的，不是酒之类的外在的东西，而是发自彼此内心的自由，让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对方。这一自由的爱彼此的境界，竟引诱陆焉识多年后意识到自己的真爱是冯婉喻，为了在自己变得老得爱不动冯婉喻之前，再回去好好爱一次婉喻，好好享受一次，陆焉识选择了逃狱。

冯婉喻一辈子为别人着想，年轻时为恩娘着想，后来为孩子，一辈子都在等陆焉识，直到死，在陆焉识看来，冯婉喻最没有自由，可是晚年的冯婉喻却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人，“婉喻现在是最自由的一个人，没有城府，百无禁忌，她不愿意的事，才不会给你留情面，她会用最直接最猛烈的方式告诉你。”婉喻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她摆脱了心灵束缚，她不记得自己是谁，也忘了所有的人，她不再有顾虑。一个人一旦有顾虑，就会丧失掉自由。婉喻不但有了精神上的自由，而且她还给肉体一个大自由，不穿衣服，回到了婴孩时期。“婉喻的失忆症进入了晚期，她肉体的记忆也失去了，一贯含胸的姿态被忘了，动作行走洒脱自若。焉识看着她赤身裸体地在屋里行走，身体一派天真。似乎羞处仅仅因为人的知羞而不得见人。现在婉喻从羞耻的概念中获释，因此很大方地展臂伸腿。”²⁴⁴人类的一切伦理道德都是人类束缚给自己的，这些都成了人类心灵的枷锁。婉喻拒绝穿衣服，是在对一切加在自己身体上和心灵上的束缚的反抗，并且回归了真正的自由。只有这样，她才不会因为出卖自己的肉体救下陆焉识而羞愧。

一个人自由与否，是由其心态决定的。如果他心里有一片自由的天地，哪怕没有人身自由，也会处于一种别人无法体会到的自由状态。生命本是处于自由自在的状态的，由于二元对立思维，不断地孤立自己，使得生命的这种自由状态不复存在。严歌苓笔下的人物，他们身上的自由意识生命本来的自在状态。

²⁴² 严歌苓著，《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第114页。

²⁴³ 严歌苓著，《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第114页。

²⁴⁴ 严歌苓著，《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第391页。

第三节 敬畏生命意识

严歌苓曾经有过到前线当了几个月记者的经历，提起这段经历，严歌苓说“我其实哪算什么记者？就是当时被抓了一个急差，也不是人家抓我，是我想要这个急差，当时是一个年轻军人，很有英雄主义，受了教育，想到前线看一看，到了前线之后，也就几个月时间，我在前线和成都走了两次，不算什么”。²⁴⁵在采访中严歌苓坦言这短短的几个月的经历却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甚至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因为走过前线，严歌苓“写了一批歌颂英雄主义的东西，后来发现了人的生命价值，我就重新思考个体生命的价值，英雄主义是不是全部，生命的价值是不是应该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去，以后我就不再喜欢写战争”²⁴⁶，严歌苓自己也认为“重要的转折点，那就是我所谓当记者的几个月，还是‘特派记者’”，“对我的生活和人生观有一些影响”。²⁴⁷严歌苓人生种种经历加在一起，再加上她对生命存在的另一种体验，使得她小说中的人物生命意识尤其强烈。

正因为敬畏生命，严歌苓笔下人物善的信念占主导，小说《少女小渔》中的小渔，之所以能以宽容的胸怀对待她那孩子气的男友江伟，之所以能够善待邋遢的意大利老头，都是因为她的思维里有一种善待生命意识在。小渔在自己要离开意大利老头家时，“她开始清扫房子，想在她搬出去时留下个清爽些、人味些的居处给老头。她希望任何东西经过她手能变得好些；世上没有理应被糟蹋掉的东西，包括这个糟蹋了自己大半生的老头。”²⁴⁸意大利老头在小渔的影响下，开始慢慢地改变了自己，“老头像变了个人。没了她所熟悉的那点淡淡的无耻。尽管他还赤膊，龌龊邋遢，但气质里的龌龊邋遢却不见了。”²⁴⁹

《第九个寡妇》中，土改时期，孙怀清被认为地主恶霸，村里的人都上台批斗他，包括孙怀清曾善待过的每一个人，最后被自己的儿子孙少勇主动请求政府枪毙他，以显示自己进步，可是孙怀清大难不死，被王葡萄冒着风险救了下来，藏到红薯窖里，一藏就是二十多年，最后，孙怀清寿终正寝。正因为王葡萄潜意识里有着敬畏生命善待生命这一意识，才让她这么做。王葡萄不仅对自己的公爹有情有义，对有困难的人也如此。瘸老虎真名陈金玉，因贪污，给打成了“老虎”。“老虎和人相处长了，人

²⁴⁵ 严歌苓：中国作家写作不亚于西方

http://news.163.com/09/1202/13/5PHI92TO0001218K_2.html

²⁴⁶ 严歌苓：中国作家写作不亚于西方

http://news.163.com/09/1202/13/5PHI92TO0001218K_2.html

²⁴⁷ 严歌苓：中国作家写作不亚于西方

http://news.163.com/09/1202/13/5PHI92TO0001218K_2.html

²⁴⁸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17页。

²⁴⁹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第17页。

人都觉得他老实，容易处，和他的‘老虎’威名不相符。”²⁵⁰，可是瘸老虎刚到史屯时，村里的人都不搭理瘸老虎，除了王葡萄见他去挑水，跟他拉家常似的说话。因为瘸老虎本残废，走起来一只脚深一只脚浅，挑起水来更费劲，葡萄看着心里不忍，还主动要帮他挑水。瘸老虎想“她可不是有点不省世事人情？通人情的人现在该对他白眼。”²⁵¹这体现了王葡萄站在生命的立场对另一个生命的关怀之情。瘸老虎后来因为偷村里的玉米被发现，被毒打了一顿之后，那条本已残废的腿更残了，不仅如此，又罚他游街，瘸老虎难以忍受这种耻辱，留下了几个幼子和自己的媳妇投河自杀了。王葡萄在那段多事的岁月里始终明里暗中照顾着他们一家。

王葡萄不仅对人有情有义，就是对动物也是如此。比如她对自己家的驴，活了三十一岁，“它和女主人相处了十几年，她只到它腿高的时候就喂它。后来它上了岁数，她把草铡得细细的，料拌得匀匀的。再后来它不咋拉得动车了，她就只让它拉拉磨。”²⁵²老驴到了最后一刻快不行了的时候，“她怕老驴夜里死了，就披上被单坐在它旁边。老驴卧在她脚边，耳朵一抖一抖。”²⁵³当二大说要趁着老驴活着杀了，还能卖点肉钱时，葡萄手摸着老驴的长脸，说“爹，不差这一会儿。明儿一早杀吧。”²⁵⁴虽然葡萄嘴上答应第二天一早杀驴，但是她心里却有一百个舍不得。就算杀了能卖点肉钱，但是要动手杀这个自小陪自己长大的伙伴，葡萄怎么忍心下得了手。早上四点左右，老驴最后撑起最后一口气，到了磨棚。“她见老驴正慢慢围着磨道走。三十几年，它记得最熟的路是这没头没尾的路，是它给蒙上眼走的路。它走得可慢，就想她知道它不是一堆驴肉，它还知道自己该干啥活，别把它杀了给驴肉店送去。她和这老牲口处了十六年，它的心思她可清楚，就像她的心思它清楚一样：在她答应天亮杀它的时候，它明白它再没人护着它了。”²⁵⁵

老驴这么做，其实是在乞求葡萄不要杀它，葡萄看到这一幕，“一声不吱地抱住老驴的脖子。老驴觉着她热乎乎的眼泪流进它的毛皮里。它低着头，呼呼地撑大鼻孔喘气。”²⁵⁶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幕。对葡萄来说，老驴相伴了她十六年，尽管老驴是一个牲畜，但王葡萄没有把它当成牲畜，而是看成自己的亲人，从心里爱惜老驴。哪怕是牲畜，它们也是生命，是生命就是平等的，生命会以各种形象存在，一花一草，一虫一鸟，甚至山河等无不是生命。把一切看成生命，从生命的立场上看这个世界，这

²⁵⁰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6：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125页。

²⁵¹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6：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94页。

²⁵²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6：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91页。

²⁵³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6：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92页。

²⁵⁴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6：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92页。

²⁵⁵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6：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92到93页。

²⁵⁶ 严歌苓著，《严歌苓作品集6：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第93页。

个世界就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小姨多鹤》小说一开始，当多鹤亲眼看到崎户村的村长和元老把全村连老带小一共五百一十三个村民，以“是日本人，就和日本人一块尊严地去死”²⁵⁷这一罩上了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名义，不管村民的个人意志，将其集体杀害。当多鹤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村子之后，村长决定服从崎户村村长和元老们的决定，也照着他们的样式去做。多鹤知道了村子的决定之后，开始脱离他们的视线，狂奔起来。

多鹤不是要自己逃跑，而是要赶在村长他们回来之前，把这个消息告诉村民，让大家逃跑。为了这个目的，多鹤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多鹤要跑十多里路，要冒险穿过苏联人出没的铁道，跑回村里去告诉母亲，村长要替大伙当什么样的家。她必须以她不善跑的两腿和村长赛跑，赶在他前面，告诉她看见的那颗全家人的血凝结的血球，以及老神枪手对着苍天的半个颅腔，他七十多年的记忆、智慧、秘密念头白里透红地飞溅在树干上。她得告诉村邻们这些，让他们在‘好死’之前多一些选择。”²⁵⁸

此时多鹤十六岁，任何一个人，只要感到生命有被扼杀的危险，相信都会选择逃生。而崎户村五百多口人竟然选择了，当然大部分被迫却也情愿选择了集体被杀，只是不愿背上“背叛全村”这一名声。名声如此重要，竟然让人放弃自己的性命。当“每个家庭都以老人为中心聚拢起来”，准备集体自杀，女孩多鹤选择“此刻决不要这种天伦相依”，她没有站到她外祖母旁边陪她死。十六岁，应该说还是一个孩子，但是多鹤选择了“背叛”，选择了逃生，不仅自己逃生，还要让更多无辜的人逃生。国家民族和“好死”怎么能比生命更重要呢？

多鹤起初是被张家当成生养工具买回来的，当张俭终于找到机会，甩下了多鹤，他其实心里是一百个不情愿。“张俭哭起来。从十来岁到三十来岁，他没有哭过，连小环肚里的孩子死了，他都酸酸鼻子过来了。他哭多鹤从不出门，从未花过一毛钱，第一次出门，第一次身上装了五块钱就被人丢了。她知道怎样去花钱买吃的吗？她能让人家不把她当个傻子或者哑巴或者身心不健全的人吗？人家会听懂她那一口音调古怪、乱七八糟的话吗？她不会告诉人们她是日本人的，她晓得厉害。她真晓得吗？张俭哭从此没亲妈的孩子们，大孩二孩半岁，一下子断了他们吃惯的口粮。不过孩子们会比他好得多，毕竟是孩子，忘得快。但愿他也忘得快些，等水泥地不再干净得发蓝，衣服上不再有掺花露水的米浆香气和刀切一般的熨烫褶皱，他就能把多鹤忘得淡一些。”²⁵⁹

从这段话里面，可以看出张俭对多鹤的感情是复杂的，怕多鹤不会懂得照顾自己，

²⁵⁷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4页。

²⁵⁸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7页。

²⁵⁹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68-69页。

这是父母般的亲情。又为没了亲妈的孩子们哭，这其实是在承认多鹤母亲的地位。想着多鹤诸般的好，又是作为一个爱人来爱多鹤的，但归根结底，他早已经在心里将多鹤看成了一家人。“如果什么都能解开重来，如果没有一场战争和日本人在中国畜生了那么多年，张俭会娶多鹤的。他不会在意她是哪国人。”²⁶⁰在国家民族之先，把对方作为一个同等的生命去爱，这种情怀是令人感动的。

朱小环因为日本兵而堕胎，从此不能生育，是日本兵夺走了自己未出世的儿子的性命，而张家却买来了一个日本女人为他们家传宗接代。按照常理，这是任何一个女人都不能接受的。小环起初也没有接受，她气得跑回了自己的娘家，但是那不是因为小环怀着对日本人的仇恨才这么做，她不过在试探张俭的心而已。当张俭把多鹤买回来后，冒着大雪去接小环，小环的气马上消了，跟张俭回去了。在后来同多鹤的生活中，朱小环嘴上厉害，但心里比谁都疼多鹤，从各方面照顾多鹤。首先是生活上，做衣服时，“扯布顺便也给多鹤扯一身。碰上商店处理零碎布头，她会一次买下十多块，给丫头和两个男孩做一身。”²⁶¹小说中不止一次提到多鹤是为了给自己增添亲人才生孩子的，是为多鹤自己生的，但是小环却把这几个孩子看成是自己生养的孩子，打心眼里疼爱他们。

当小环知道张俭丢下多鹤之后，夫妻间发生了争吵。张俭认为多鹤在这个家呆得不合适，不舒坦，说让她出去过舒坦的日子。小环说“咱家不舒坦也是个家。再不合适也是她家。她出了这个家活得了吗？到处抓美蒋特务、日本间谍、反动派！我们饭店就常常有公安局的便衣，大半夜冒出来各屋查，厕所茅坑都查，你让她上哪儿去？”²⁶²那是一个非常时代，尽管多鹤有着跟中国人差不多的面孔，但是多鹤基本上还是保持着日本人的生活礼节，并且语言上也很容易让人发现她的不同。小环真心担忧多鹤的安危，哪怕在这个家里，多鹤的身份地位再怎么暧昧，但至少给了她一个安全的容身之处，还有什么比人活着更为重要呢？小环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早就把多鹤当成自己的妹妹看待，把多鹤看成是自己的一家人了。

情感上，小环容忍自己的丈夫和多鹤发生性关系，甚至鼓动丈夫主动跟多鹤发生关系，以此来慰藉多鹤孤独的心灵。多鹤走失回来后，她先是把自己干瘪了的乳头给两个孩子啣，但都被拒绝。孩子不会吸吮干瘪的奶头，这多鹤也不是不知道。多鹤大概在通过这一行为，以安慰自己不安的心灵，至少还有两个孩子需要自己，是自己的亲人。然而孩子们的拒绝让多鹤把气一下子都出在了张俭身上，歇斯底里地野兽一般地同张俭厮打，这是她怨恨和孤单无助心理的外在行为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小环对

²⁶⁰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66-67页。

²⁶¹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65页。

²⁶²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73页。

张俭谈起了女人的心态，“她不着边际地说起女人都是很贱的，跟一个男人有了肌肤之亲，就把自己的命化在男人的命里，这女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何况不止肌肤之亲，还生了一窝他的孩子！她不承认她把命给了你也没用，那是她自己哄自己呢！”

²⁶³多鹤也是女人，“多鹤是日本女人，没错，赌一条东海烟她也早把命化在她的男人身上了。喜爱不喜爱她的男人，另说，也无所谓，想从这男人命里掰出自己的命，她办不到。想跟多鹤和解，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跟她肌肤之亲去。女人表面上都会推的，说不定还打两拳、踢一脚，但那都是假的。她可不知道自己在作假；她以为她真在推拒、在出气、发泄委屈，实际上她已经跟你和解：你要她，比什么‘对不起’、‘抱歉’都管事。”²⁶⁴为了抚慰多鹤受伤的心灵，小环主动让张俭把多鹤当成一个女人去爱，而不是当成一个日本人去看。试问天下有哪个女人能有这样的胸怀？她不是站在女人的立场上看问题，而是站在生命的立场上对另一个生命情感上的关怀。

当多鹤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家里，见到了自己的孩子，她本想同孩子们同归于尽，可是小环对她的体贴和照顾，感动了她，小环给她洗澡，并且跟她拉家常，讲的都是多鹤孩子们的日常。

多鹤脱口插话，说她自己小时候就爱吃外婆做的干虾米。

她很意外，自己怎么跟小环搭起话来了：她明明在做和孩子们同归于尽的打算呀！这时小环把她从水里扯起来，抬起木盆一头，把脏水倒出来，让水冲在厕所地面上，一面咂咂嘴，又笑道：“可惜了啦，这水能肥二亩田呢！”

多鹤看看厕所地面上一层灰色的体垢，不自觉地也笑了。她真的太意外了，怎么竟笑了呢？她不是正在想怎样让三个孩子毫不疼痛、毫不害怕地和她一块走，去做好样的代浪村村民吗？²⁶⁵

小环对多鹤的真情感动了多鹤，并且唤醒了她作为母亲的母性之爱，才没有导致悲剧的发生。小环把多鹤感动之后，多鹤开始慢慢地把小环及张俭看成是自己的亲人，当多鹤再次流产时，多鹤将自己的身世讲给了小环听。“小环觉得心里那股难受特别奇怪：这故事的惨烈可怕不像是人间的。日本人怎么那么热爱死这桩事呢？一个村长能替全村人当家去死？一个母亲可以替孩子们当家去死？”²⁶⁶对于小环这样以生命为本，满心充满了对生命敬重的人来说，她怎么能够理解，怎么能消化得了多鹤的经历呢？因为小环有敬畏生命这一意识，同多鹤生活的这么多年中，风风雨雨，小环总是

²⁶³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85页。

²⁶⁴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85页。

²⁶⁵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101页。

²⁶⁶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108页。

不惜一切，照顾多鹤。当一切成为往事，多鹤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由“敌人”变成了要回到自己的母国日本的日本友人，小环自然心里有百般的舍不得，但是去坦荡荡。而多鹤周边的人，包括她的亲生儿子就不一样了。

“居委会女干部们都站在旁边，都觉得民政厅弄来一件让她们为难的事。原来竹内多鹤是敌人，现在政治面目模糊了，今后谁冲厕所？”

张铁也认为自己面临一道难题：这些年他习惯了非白即黑的事物，看看省民政厅干部对多鹤的态度，不黑不白，他以后拿什么脸子面对小姨多鹤？”²⁶⁷

是是非非不过是一时的情境而已，人世间哪里有绝对的大是大非，严歌苓小说中的人物向读者传达了这一信息：待人还是以生命为本。有了生命的敬畏意识，就会生出一种平等待人之心。《小姨多鹤》中张俭入狱后，小环交了一帮“下流朋友”，并且成了这些下九流的朋友竞相巴结的对象，小环为了见入狱的张俭，通过其中的一个女阿飞认识了监狱的赵司务长，可后来“她和赵司务长已经是‘嫂子’‘兄弟’了。赵司务长开始还受小环的礼，慢慢就给小环送起礼来。他也跟小环所有的下九流朋友一样，觉得小环有种说不出的神通，很乐意被她利用利用，小环在他这样的人身上有利可图，是他的福分。每次来小环家，劳改农场干部食堂的小磨香油、腊肠、木耳金针粉丝也都陆陆续续跟着来了。他早忘了他跟小环接近的初衷是为了接近女阿飞小唐”²⁶⁸。

小环从未曾看低这些阿飞，这些“阿飞”们并不是真心想当阿飞，他们的阿飞命运是时代造成的，跟他们的本意无关。“这些抗拒学校、居委会、家庭的压力，坚决赖在城里的年轻人起初被社会看成阿飞，后来自己也就没有选择地做起阿飞来。小环看见二孩张钢的手生满冻疮，手指头红肿透亮如玛瑙，心想：做阿飞就做阿飞吧。”小环潜意识里有着强烈的生命为本意识，她眼中生命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看到二孩的手变成那个样子，不用说二孩在外面吃的苦不少，成了没妈的孩子，与其如此，不如就让二孩待在自己身边，哪怕做阿飞也无所谓，起码自己还能够分享二孩的冷暖。可这些当年的阿飞后来完全变了样，“阿飞们也不再做阿飞了。他们的父母退了休，让出了位置，他们顶了上去。他们剃了大鬓角、小胡子、飞机头，换掉了拉链衫、瘦腿裤、宽腿裤，穿上了白色帆布夹克，一个个提着父母的铝饭盒，原来也不是天生流里流气。他们都没忘小环阿姨，下班后路过她的摊子，还常常站下喝一杯日本茶，带给她新的时装样子。上海人、南京人现在时兴在裙子的哪个部位装一道边，绣哪样的

²⁶⁷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301-302页。

²⁶⁸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297页。

花，等等。”²⁶⁹ 小环待人的真心，换得了真心的回报。

平等的生命观在《陆犯焉识》里的老几即陆焉识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他发现邓指也不过跟一般人一样，“原来邓指这样的高干家里也用拖拉机漏下的废柴油点灯，跟监号里一样”，“饥荒使人们珍稀的笑容显得多牙多皱，原来邓指也不例外。”²⁷⁰ 生命是平等的，职位哪怕再高，在相同的客观环境下，他们的生存环境都是一样的。人职位的高低，不过是人自己划分出来的，自然环境不会因为某人的社会地位高就偏爱谁，“严寒和缺氧的大荒草漠，自由和不自由都一样，零下三十多度对管教干部和家属们也不予赦免。”²⁷¹ “1960年春天的一夜，冰雹加雪，又来了七八级大风。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上百顶扎在雪里的单薄帐篷活像上百条裙子。管教干部轮流值班，一小时到监号帐篷里来一次，命令犯人们报数。……又一个数字卡了壳。突然地，管教干部用鼓舞人心的高嗓音说：‘大家醒醒啊！睡着容易挨冻！都醒醒！咱们大声报数！’”²⁷² 这一小段叙述语气明显地表达了管教干部敬畏生命之心。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天寒地冻的，这样的天气谁都不想出去，可是管教干部轮流值班，一小时到监号帐篷来一次，并且以鼓舞人心的语气让犯人们报数，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保持精神清醒，否则就容易被冻死。如果不是出于作者对生命的热爱和敬畏之心，是不会有这样的叙述语气和安排的。

《寄居者》里的杰克布首次到上海，在海关因为跟日本人开玩笑，被日本人打了两记耳光，加上犹太人的遭遇，他当时就思考了迫害这个问题，“他企图想出一个理由，为什么一些人认为他天生有权利迫害另一些人。为什么只有对他人迫害了，他才觉得自己高大、有力量、正义。推演下去，也就是，越是对他人进行迫害，他越觉得自己高大、有力量、正义。”²⁷³ 迫害不仅发生在民族之间，也发生在个人身上。杰克布和罗恩伯格“通过秘密途径得知‘终极解决方案’已经进入具体部署，两万多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将会在‘移民满洲’的谎言掩护下被驱赶上船。当下的争执焦点是这些将在公海沉没的船只由谁来投资”²⁷⁴。“终极解决方案”无疑是对犹太人更大的迫害，犹太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都想尽快逃离上海，可是杰克布和罗恩伯格却不顾他们自己的性命安危，投入了抗日队伍。为此，杰克布被日本宪兵抓了起来，严刑拷打，叙述者通过各种渠道才救出了他。然而杰克布非但没有害怕，反而认为“我感到最严重的恐惧我都经过了，对恐惧基本上免疫了。”²⁷⁵ 从此反而更加义无反顾地在中国投入

²⁶⁹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299页。

²⁷⁰ 严歌苓著，《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第6页。

²⁷¹ 严歌苓著，《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第9页。

²⁷² 严歌苓著，《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第9页。

²⁷³ 严歌苓著，《寄居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8，第115页。

²⁷⁴ 严歌苓著，《寄居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8，第179页。

²⁷⁵ 严歌苓著，《寄居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8，第199页。

了热火朝天的抗日里面去，秘密为中国的抗日开地下抗日兵工厂。杰克布从自己民族的被迫害，延伸到中国人的被迫害，作为同等的生命，自己有必要超越个体和国家种族界限，从生命的平等与可贵出发，无反顾地在中国投入了抗日战争队伍。

对生命的敬畏意识，必然让人产生一种正向的积极向上的乐观的生活态度。哪怕面对同样的事情，其心态是不一样的。小说《小姨多鹤》中丫头张春美在军校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重新编造了一个假身份，后被部队查出，以军法处置，被学校开除了。张春美觉得没脸回家见邻居，就被张俭送回了东北老家。对这件事，小环的态度是“丫头和张俭都是什么见识？那么怕人家咬耳朵、戳胳膊肘。让他们咬去、戳去，什么羞耻都长不了，别人会很快出新的事，就会有新的羞耻。一有新的羞耻，旧的就复好如初，什么都没发生过。”²⁷⁶小环的这种生活态度同《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的“天下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管遇到什么事，小环总是报以肯定的生活态度对之。“路总不该走绝吧？连多鹤那个村子的人逃难逃得东南西北全是绝路了，还不是活出个多鹤来吗？”²⁷⁷“人们遇到灾祸时都觉得过不下去了，可过了一阵发现，也就那么回事，还得往下过。”²⁷⁸生活的一切都不过是表象，只要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就会产生生活下去的智慧和勇气。

乐观的生活态度背后，是一种强烈的正向思维在支撑着人。《小姨多鹤》中的张俭在公审之后，被判处“死缓”，小环去菜场买了一条肥鱼熬鱼汤要庆祝一下。“这是多凄惨的庆祝。她破费花这笔钱，也是用鱼头汤哄大家高兴，哄大家相信死缓的两年有七百三十天，天天都有二十四小时，时时都有改判的转机。她得哄她的儿子张钢她的妹子多鹤，想开些，怎么样都得把日子往下过，往下过该吃鱼头汤还得吃鱼头汤。哪怕张俭今天真从公审会去了法场，他知道这家人没了他还吃得上鱼头汤，难道不是给他最大的安慰吗？”²⁷⁹张俭是家长，一直以来靠他工作，养活一家人，这种时候，对于一般人来说，等于天塌下来了，肯定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小环却能以这种态度积极面对，实在难得。所谓“境随心转，相由心生”，正因为小环的这种正向思维，让她产生无穷智慧，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能应对自如，在艰苦卓越的岁月里，保护了多鹤和自己一家人，最终也救出了张俭。

《陆犯焉识》里冯婉喻是典型的小家碧玉，可是当她得知陆焉识被判死刑的噩耗，一人撑起了这个家，“婉喻从来不跟她的孩子说她怎样含辛茹苦。孩子们只看见她一夜抽出多少烟头来，为了读俄语。学校缺俄语老师，会了俄语可以从代课老师转正。她在用一年零八个月通过俄语资格考试时，陆焉识再次被减刑。减过的刑叫做‘无

²⁷⁶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235页。

²⁷⁷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258页。

²⁷⁸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267页。

²⁷⁹ 严歌苓著，《小姨多鹤》，--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2（2012.4重印），第273页。

期’，她对孩子们解释。婉喻为了这个‘无期’带着孩子们庆贺一晚上。‘无期’有无数好处呢！‘无期’也可以理解为不定期，不定期就说不定是明天。明天可能就是焉识的释放日，为什么不可能呢？可焉识被‘无期’带到几千里外的大荒草漠上去了，那也是好的，不必缩在又潮湿又阴暗的监房里，夜里翻身必须喊‘报告’；‘无期’意味着动作的自由。大得没边的大荒草漠，总是够你动作的。”²⁸⁰

一句“‘无期’有无数好处呢”就是极度乐观高度肯定的生活态度。哪怕生活条件再恶劣，也比缩在又潮湿又阴暗的没有自由的监房里好。陆焉识在狱中的时候，冯婉喻给他写信，一月一封，从陆焉识的叙述中可以知道冯婉喻的乐观的生活态度让她时刻感受到的是同陆焉识一起生活的美好，这同陆焉识的想法成对比。“看信的时候，陆焉识发现冯婉喻总是记住事情美好的那一半，或者说，同时发生于他们的事情，可以给看得美好，也可以给看得庸常。婉喻在她信里跟他重新过一遍那些日子，把它们过成了好日子。”²⁸¹婉喻的这种生活态度促使陆焉识选择了逃亡，叙述者说道“也许他的逃亡就为了这个目的：要当面告诉婉喻，他什么都记得，正因为记得，他现在知道那么多年他自己误了自己，也误了婉喻。他要婉喻原谅，他最好的年华没有给她。他一定要婉喻原谅他对她的心不在焉，在她身边的他仅仅是一份面带微笑的在场。”²⁸²

生命是平等的，没有贵贱高低之分，有了这层敬畏生命意识，就会超越个人、种族和国家界限，从热爱生命本身出发，平等地对待生命中的一切。万物皆有灵性，只是生命存在的状态不同而已。进入潜意识状态后的严歌苓，明白了生命存在的深刻意义。因而她笔下的人物大多有一种敬畏生命意识。这种敬畏生命意识让他们具有了站在生命立场看问题的正向思维，这种正向思维会产生强大的生命能量场，因而她笔下人物总会逢凶化吉，且充满无限生机和活力。

²⁸⁰ 严歌苓著，《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第79页。

²⁸¹ 严歌苓著，《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第99页。

²⁸² 严歌苓著，《陆犯焉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0，第100页。

第五章 结语

流散者指同时直接或间接经历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人，他们大多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或者有更美好的前程，选择主动流散。本文通过对严歌苓旅美后作品的文本细读，发现了严歌苓作品中有不同类型的流散者，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结婚移民、劳工出国者、陪读者等，他们到了异国，大多生活在华人圈里，他们周边要么是比自己早移民来的，要么是跟自己同时期移民来的，可以说他们的生活环境变成了异国而已，实际上跟所居国主流社会成员很少有直接性的接触，基本上还是保留着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在情感上，大多比较孤寂。移民来的女子，在物质生活上大多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可由于不是真心爱对方而同对方结婚，使得她们在情感上大多更加依赖自己的子女，甚至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导致子女跟他们继父间的关系比较紧张，同时由于子女无法承受母亲在情感上给自己的心理压力，他们开始慢慢疏远自己的母亲，使得原本在情感上就已经很孤寂的母亲们，因此更加孤独。究其原因，不是因为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不好，而是主客二元对立思维让她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丈夫亏待自己的孩子，这一主客二元对立思维让她们无法体会到丈夫对自己的好。其实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心态，她们就能感受到自己的丈夫对自己的好，尽管有时候这些大多都是通过物质表达出来的，物质是对方的爱意表示。

一类是跟所居国主流社会成员有实际性的接触，想融入主流社会，但往往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导致融入主流失败。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文化的载体。文化上的差异首先体现在语言表达上，从而导致沟通上的错位对话。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之所以产生这种错位对话是因为各自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以自己的文化观点理解对方的意思，从而引起了对话上的冲突。人往往由个体变成了整个族群的代表，个性成了整个族群的共性。人类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的理解几乎都是通过各种媒介综合得出的想象出来的文化群体，这一想象跟该文化或族群本有的实体没有多大关系，往往是从负向思维角度出发来想象对方文化的，是一种建立在文化差异之上的想象，由此更加拉大了两种文化间的距离。

还有一类流散者是生活在中国境域内的外籍人士。如果说生活在美国的流散者有强烈的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感受的话，生活在中国境域内的外籍人士情况却多种多样。有在中国出生长大的，由于自小生活在自己的族群中，后又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的，如《小姨多鹤》中的多鹤，她是在中国满洲国的代浪村出生的日本人，自小就在代浪村同自己的族群一起生活，她对自己的身份非常清楚，就是日本人。可是当她回到日本反而找不着自己的位置，有了认同上的困惑。也有出生在中国，跟着中国人长大的外籍人士，如《第九个寡妇》里的朴同志和《金陵十三钗》中的法比，他们具体的情

况又不一样。法比是一个完全接受了中国文化的西人，是一个有着西人面孔的“中国少爷”，他在文化上认同中国文化，或者具体说认同他的中国家乡扬州文化，可由于他的西人面孔，接触时难免给人一种外族人的感觉。可是，由于他骨子里接受的是中国文化，他不认同西方文化，这使得在别人看来，他成了异己。朴同志是高丽人，自小跟着中国养父母长大，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但他已完全融入到了中国人里面，无论是他自身，还是他周边的人，没有人把他看成是外国人，心态决定归属。

严歌苓作为流散群体中的一员，在她看来，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哪里都找不到位置，有认同危机感。她的这一想法对其笔下的流散者有着很大的影响。她笔下的流散者大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出现认同危机。流散者之所以会产生认同上的困惑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同时体验两种文化，他们身上不可避免会出现文化的混杂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分子饮食，它打破了人类对饮食的固有思维意识，饭不一定是固体的，汤不一定是液体的，由于它的独创性而备受关注 and 青睐。长着异族人的面孔体现的是所居国的文化，这其实是打破了人类固有思维。食物可以通过改变其分子排列，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即使是同一种食物，也可以改变其分子排列，让它以不同的状态出现，从而为饮食开创了新的领域。而人呢？同时体验两种文化的流散者，他们会因为自己实际的生活经历而不知不觉地改变自己的思维，同自己母国所属群体不同，同样又跟所居国的主流社会成员不同。“香蕉人”就是典型的说明。

流散者的经历让他们开始面对自己自身，思考人生，思考自我，思考生命。实际上流散把人拉回了原点，就是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上来了。“我是谁？”、“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等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探讨的问题，现在变成了一个人活着必须面对且要思考的问题。

严歌苓认为写作就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高行健认为一切矛盾的根源就在于自我，他讲的自我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一个他者，自我是相对于他者而存在的，如果没有他者的存在，人就不会有各种建立在他者基础上的诸如矜持、傲慢、嫉妒和憎恨，甚至包括认同是的问题。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自我，而在于把自我和他者对立起来的二元思维意识。主流与边缘，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西方与东方等等无不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这思维的载体正是自我这一存在，即问题出在自我的二元对立思维意识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高行健从佛法中得到启示，告诉我们人活着不要执着。然而即使我们不执着，外在的环境本身就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环境。人本是宇宙性的存在，可因为总是站在分离的立场上看问题，才使得人跟一切都对立，完全处于孤立状态。这不是人的错，而是宇宙整体的思维意识导致如此。《道德经》中老子短短几句话就明确指出了这个时空宇宙诞生的过程，阴阳是时空宇宙基本的组成元素，万物万

象因阴阳相生相克生成，世间一切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二元对立思维，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母国文化和所居国文化等等这些都是一种二元对立关系，流散者面对的诸如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主客对立的二元对立思维。

实际上并非流散者如此，人同万物之间的矛盾，就源于二元对立思维，只是由于流散的原因，才导致各种矛盾更加白热化而已。生命本是宇宙性的存在，庄子在《齐物论》中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说的就是这种状态。只是由于二元对立思维的问题，总是从分离的观点甚至对立的观点看问题，认为生命和宇宙处于分离状态，继而不断地分离下去，结果人同一切都处于一种分离对立的关系。所以说，不是外部的的问题，而是人自身思维的问题。改变二元对立思维，站在生命的立场上，从合一的观点看问题，人同万物是同一的，同宇宙是同一的，那么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人执着的这个自我，其实是一个假我，并非是生命本身。

流散给严歌苓带来了有心灵上的创伤，但同时给了她一种双重文化视角，让她从跨文化的角度看待问题，这一点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但是我认为除此之外严歌苓打坐入定的经历使她对生命有着另类体验，唤醒了存在于她潜意识里的高次元的生命。人本是宇宙性的存在，宇宙是由无数层次构成，每一次元都存在着无数的生命，生命所在的次元不同，其思维意识也有很大的不同。生活在感觉时空里的人，是非善恶伦理道德观念非常强烈，可是高次元生命并非如此。严歌苓作品中人物思维意识别具一格，原因也在此。他们是严歌苓进入潜意识状态之后，严歌苓体内的高次元生命苏醒的结果。人物自身的这种浑然天成的存在，使得严歌苓在小说创作中缺少了对人物心理及精神更深层次的开掘，从而丧失了对生命哲学上的探讨。这是严歌苓小说的不足之处，但是严歌苓作品中人物自身具有的性格上的魅力，间接地体现了他们思维意识的次元。

透过严歌苓笔下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对待性的态度极其开放。性爱不再受伦理道德的束缚，有时只是肉体的欢乐和自由，不受任何精神束缚的干涉，但却不是淫乱的、猥亵的；有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已出卖自己的肉体，性被附加了政治关系，但却是为了救出另外的生命，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享受性爱带来的欢乐；有时通过性爱慰藉孤寂委屈的心灵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她们超越了伦理道德的束缚，有着开放的性意识。

严歌苓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种强烈的自由意识。这一意识不是严歌苓从理论上强加给人物的，而是人物自身的存在状态就是一种不受束缚的、自由的状态。一个人自由与否，是由其心态决定的。如果他心里有一片自由的天地，哪怕没有人身自由，也会处于一种别人无法体会到的自由状态。这种自由状态不是谁给予的，而是生命本来存在的状态。

严歌苓笔下的人物还有着敬畏生命的意识，在他们看来，生命是平等的。有了生命平等、敬畏生命意识，就会超越个人、种族和国家界限，以生命为本，从热爱生命本身出发，平等地对待一切生命。万物皆有灵性，只是生命存在的状态不同而已。懂得尊重生命，就会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的生活态度，这是一种正思维，有了它做基础，就会形成强大的正向能量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能心中生慧，智慧地解决问题。

严歌苓作为流散群体中的一员，同时又是一名优秀的作家，她的笔下描绘了不同层次流散者的生存状态，这其中又不乏她自己对流散的感受及思考。流散给她带来了心灵上的创伤，同时又让她对生命有了更深的体会和觉悟，使得她的作品有着别样的新鲜感和震撼力。通过对严歌苓作品的研究，可看出流散这一现象引起的种种问题其根源在于二元对立思维，这种思维是时空宇宙的主导思维，时空里的一切受其控制。由于二元对立思维的原因，总是从分离观点看问题，人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和自由，并且产生了诸如认同上的焦虑。更重要的是流散引起的种种矛盾实际上将人拉回了“我是谁”及“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的原点。严歌苓通过自己生命的觉醒，凭借着小说创作，向读者展示了更高次元生命的思维意识，这是严歌苓超越了个人情感，为文学、为人类做的贡献。

人（生命）本是宇宙性的存在，是全知全能的创作主，由于二元对立思维，让人总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上看问题，使得自己总是处于孤立状态。改变自己的二元对立思维意识，站在生命的立场看问题，才能认知到生命的本质，恢复生命原本的自由自在的宇宙性的存在状态。在我看来，流散带来的并不是认同危机等负面影响，而是改变人类二元对立思维，走向绝对正思维一元论道路的契机，回归生命本身，从生命立场看问题，意义极其重大。

参考文献

作品

- [1] 严歌苓.《严歌苓作品集 1: 天浴》[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 (2011. 8 重印):
- [2] 严歌苓.《幸福来敲门》[M].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1. 1 :
- [3] 严歌苓.《严歌苓作品集 8: 吴川是个黄女孩》[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
- [4]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0. 9:
- [5] 严歌苓.《花儿与少年》[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4. 1:
- [6] 严歌苓.《扶桑》(严歌苓文集)[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 2:
- [7] 严歌苓.《霜降》(严歌苓作品集)[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0. 11:
- [8] 严歌苓.《穗子物语》[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4:
- [9] 严歌苓.《心理医生在吗》(严歌苓文集)[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 6:
- [10] 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严歌苓长篇精品)[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0. 4 (2012. 4 重印):
- [11] 严歌苓.《严歌苓作品集 2: 少女小渔》[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
- [12] 严歌苓.《严歌苓作品集 6: 第九个寡妇》[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9:
- [13] 严歌苓.《小姨多鹤》(严歌苓长篇精品)[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0. 2 (2012. 4 重印):
- [14] 严歌苓.《寄居者》(严歌苓作品集)[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1. 8:
- [15] 严歌苓.《波希米亚楼》[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8:
- [16] 严歌苓.《雌性的草地》[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17] 聂华苓.《三生三世》[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 [18] 高行健.《灵山》[M]. 台北市: 联经, 2001 年 11 月初版第十六刷:
- [19] 《严歌苓文集—访谈记述》:
- [20] 也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M]. 香港: Oxford University Press(China)Ltd,

2009年:

单行本

- [21] 빈센트 파릴로 저, 부산대학교 사회과학연구소 역. 인종과 민족 관계의 이해》[M]. 서울: 박영사, 2010:
- [22] 가야트리 차크라보르티 스피박 지음, 문학이론연구회 옮김. 경계선 넘기- 새로운 문학연구의 모색[M]. 경기: 인간사랑, 2008:
- [23] 김영희, 유희석 엮음. 세계문학론: 지구화 시대의 쟁점들[M]. 파주: 창비, 2010:
- [24] 네스토르 가르시아 칸클리니. 혼종문화: 근대성 넘나들기 전략[M]. 서울: 그린비, 2011:
- [25] 데이비드 허다트, 조만성. 호미 바바의 탈식민적 정체성[M]. 서울: 앨피, 2011:
- [26] 유선모저. 미국 소수민족 문학의 이해[M]. 서울: 신아사, 2001:
- [27] 정은경. 디아스포라 문학[M]. 서울: 이룸, 2007:
- [28] 조나단 프리드먼 지음, 오창현, 차은정 옮김. 지구화 시대의 문화정체성[M]. 서울:당대, 2009:
- [29] 李贵苍. 文化的重量: 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30] 许焯光. 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 [31] 吴前进. 美国华人华侨文化变迁论[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32] (美)周敏著. 郭南审译. 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
- [33] 叶舒宪. 文学与人类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
- [34] 胡亚敏. 叙事学[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35] (美)爱德华·W·萨以德著. 王宇根译. 东方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36] 倪立秋. 新移民小说研究[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 [37] 陈涵平. 北美新华文文学[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12:
- [38] 格非. 小说叙事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 [39] (美)詹姆斯·费伦著. 陈永国译. 作为修辞的叙事: 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5:
- [40] 陈贤茂等. 海外华文文学史[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9. 8:
- [41] 黄万华. 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10:

- [42] 黄万华. 美国华文文学论[M].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 5:
- [43] 刘俊. 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 [44] 饶芃子. 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3:
- [45] 饶芃子. 流散与回望[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
- [46] 李亚萍. 故国回望: 20 世纪中后期美国华文文学主题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 [47] 庄园编. 文化的华文文学[M].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6:
-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走向 21 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49] 陈定家. 全球化与身份危机[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 [50] 范玉春. 移民与中国文化[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51] 查建英主编. 八十年代访谈录[M]. 三联书店, 2006:
- [52] (瑞士)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著. 张敦福、赵蕾译. 未发现的自我[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0. 3:
- [53] (英国) 罗伯特·扬著. 容新芳译. 《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 [54] 庄孔韶主编. 人类学经典导读[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55] 张其学著. 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东方社会[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6:
- [56] 罗钢, 刘象愚主编. 文化研究读本[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9:
- [57] 朱立元, 李钧主编.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7 (2003 重印):
- [58] 汪晖. 《汪晖自选集》[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 [59] 饶芃子. 海外华文文学的新视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 [60] (瑞士) 荣格 (Jung, C. G.) 著. 冯川, 苏克译. 心理学与文学[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9:
- [61] (汉) 河上公注、严遵指归、(三国) 王弼注; 刘思禾校点. 老子[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2:

期刊

- [62] 김용규. 포스트 민족 시대 혼종과 틈새의 정치학: 호미 바바 읽기[J]. 비평과 이론. 서울: 한국비평이론학회, 2005 , Vol. 10. No. 1:29-57.

- [63] 김혜준. 화인화문문학 연구를 위한 시론[J]. 중국어문논총, 2011, Vol. 50:77-116.
- [64] 박인찬. 중심인가 주변인가: 지구화 시대의 아시아계 미국소설[J]. 안과 밖, 2005, 19 호:261-279.
- [65] 신용하. ‘민족’의 사회학적설명과 ‘상상의 공동체론’ 비판[J]. 한국사회학, 2006, 제 40 집 1 호:32-58.
- [66] 이육연. 중국인 디아스포라 와 高行健의 문학[J]. 中國語文學誌, 2003, Vol. 14. :383-402.
- [67] 陈思和. 自己的书架: 严歌苓的 <第九个寡妇> [J]. 名作欣赏, 2008, (03):102-104.
- [68] 饶芃子、姚晓南、陈涵平.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2003, 4:179-182.
- [69] 葛娟. 论严歌苓小说的大众化艺术倾向[J]. 北方论丛, 2010, 5:33-37.
- [70] 王谦. 严歌苓 & 《第九个寡妇》[J]. 出版广角, 2006, (08):34-36.
- [71] 周春宇、李侠云. 流散语境中的回望--美国华文女作家严歌苓的“中国记忆”小说研究(一)[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33(2):95-98.
- [72] 张栋辉. 生命的移植-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思想资源[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01):67-72.
- [73] 黄彦博. 严歌苓早期生平研究[J]. 华文文学, 2013:31-51.
- [74] 滕威. 怀想中国的方式-试析严歌苓旅美后小说创作[J]. 华文文学, 2002, (51):63-69.
- [75] 李伯勇. 《陆犯焉识》的“头轻脚重”问题[J]. 小说评论, 2013:172-177.
- [76] 冯晓莉. 《陆犯焉识》主题探析[J]. 小说评论, 2013:178-181.
- [77] 白杨、刘红英. 《第九个寡妇》: 原型意象与讲述方式[J]. 文艺争鸣, 2013:67-70.
- [78] 高红梅. 《金陵十三钗》的女性话语与历史阐释[J]. 创作与评论, 2013(167):41-45.
- [79] 李欧梵、季进、宋洋. 身处中国话语的边缘: 边缘文化意义的个人思考[J]. 当代作家评论, 2008(01):132-141.
- [80] 周春宇、李侠云. 回望母国的独特意蕴-美国华文女作家严歌苓的“中国记忆”小说研究(二)[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33(5):135-140.
- [81] 赵毅衡. 无根者之梦: 海外小说中的漂泊主题[J]. 上海文学, 2005(06):92-98.

- [82] 龚自强、丛治辰、马征、陈晓明.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史-严歌苓《陆犯焉识》讨论[J]. 小说评论, 2012(4):117-132.
- [83] 龚自强. “后伤痕”书写的复杂性-论历史与人性深度交织的《陆犯焉识》[J]. 当代作家评论, 2013(2):178-187.
- [84] 刘艳. 美国华文女性写作的历史嬗变-以於梨华和严歌苓为例[J]. 中国文学研究, 2009(4):114-119.
- [85] 周春宇、李侠云. 回望母国的文化守望-美国华文女作家严歌苓的“中国记忆”小说研究(三)[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34(2):80-86.
- [86] 庄伟杰. 海外华文文学有别于中国文学的特质-以海外新移民文学为例[J]. 中国文学研究, 2012(2):49-54.
- [87] 葛娟. 论严歌苓小说的大众化艺术倾向[J]. 北方论丛, 2010(5):33-37.
- [88] 张新颖. 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J]. 南方文坛, 2011(6):5-11.

博士论文

- [89] 고희림. 북미 화인화문문학에 나타난 디아스포라문학적 특징 - 白先勇、於梨华、张系国、聂华苓을 중심으로 [D]. 釜山: 韩国国立釜山大学, 2013:
- [90] 丰云. 论华人新移民作家的飞散写作[D]. 济南: 山东大学, 2007:
- [91] 张栋辉. 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跨域书写[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1:
- [92] 宋晓英. 精神追寻与生存突围[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06:
- [93] 周颖菁. 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0:
- [94] 邢楠. 严歌苓小说研究[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 [95] 李燕. 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研究[D]. 广州: 暨南大学, 2008:
- [96] 蒲若茜. 族裔经验与文化想像[D]. 广州: 暨南大学, 2005:
- [97] 刘红英. 严歌苓小说论[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4:

报纸

- [98] 穆肃. 我是一个乐观的寄居者[N]. 东莞日报(数字报纸), 2009, 3(22):
- [99] 陈晓旻. 小说创作需要想象力和“共感力”——旅美女作家严歌苓访谈[N]. 宁波

晚报, 2010, 6(5):

[100] 方乐莺. 严歌苓 对所有传统的东西都开始质疑 [N]. 中华合作时报, 2004, 11(02):T00 版.

网络资料

[101] 在海外写作: 作家严歌苓访谈录 (转载) 2008. 5. 10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157380/>

[102] 严歌苓:我追求写作的“浓后之淡”

http://www.gmw.cn/content/2008-07/01/content_794371.htm

[103] 分子食物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jokoT6XvCyjd8dFpjqhHUFdz07TdhKqE6d-Fp6zjCjvkGHRC-GSeszltxcD5qRZakdU3zGGgPexCHkTVmQPgbq>

[104] 访谈严歌苓: 我是很会爱的

<http://book.kanunu.org/files/chinese/201103/2010/46392.html>

[105] 小说创作需要想象力和“共感力”——旅美女作家严歌苓访谈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10-06/05/content_198812.htm

[106] 严歌苓: “寄居”在文学深处 <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04-09/1639268.shtml>

[107] 严歌苓: 我可以在我的小说里再活一遍

http://www.china.com.cn/book/txt/2006-07/20/content_7016448.htm

[108] 严歌苓 给好莱坞编剧的中国女人

http://bjqn.yinet.com/3.1/0402/08/446013_2.html

[109] 严歌苓: 中国作家写作不亚于西方

http://bjqn.yinet.com/3.1/0402/08/446013_2.html

[110] 严歌苓: 只在文字的世界里“紧张”

<http://news.sina.com.cn/c/2010-03-05/1440197>

后记

经过近四年时间的奋斗，终于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想起刚入复旦的那一刻，还恍惚犹如昨日。回想四年的读博时光，真是百感交集。

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张新颖老师的悉心教导，甚为感激。感谢刘志荣老师。刘志荣老师跟我谈论文写作构思的那一天，正好赶上系里面试研究生，刘老师早上七点就从家里出来，一直忙到下午六点，本已是疲惫不堪，却依然帮我整理论文思路，给了我很多灵感，直到今天，想起那天的那一幕，我依然感动不已。特此表示感谢。

尤其要感谢的是查屏球老师，是查老师介绍我到复旦求学的，在复旦学习的过程中，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学术上，都给我很大的帮助，不断地鼓劲我，我才支持到今天，才有今天的成果。

另外还要感谢我的同学李慧源，她在生活上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也感谢同学郭君臣，在学业上帮我扶我。

另外感谢我的家人，论文进入最后的写作时，我基本上无法分心照顾他们。尤其是我六岁的女儿，她要妈妈跟她玩，我说“宝贝女儿，请再给妈妈两天的时间，好吗？过了今天和明天，妈妈就不会这么忙，就能陪你玩了。”女儿想了想，说“好吧。过了今天和明天，我就不再容忍你了。”看着可爱的女儿，她的懂事给我力量的同时，难免心里有些不忍。由于忙于写论文，没有时间给孩子们做饭，十一岁的儿子开始掌厨，给我和女儿做饭，感谢我懂事的宝贝儿子。也感谢老公对我的支持。

复旦大学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论文中除特别标注的内容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毕文秀 日期： 2016.5.30

复旦大学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复旦大学有关收藏和利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收藏、使用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本；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涉密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 毕文秀 导师签名： 张华 日期： 2016.5.30